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者的意外之擊

Accidental punch to an
anarchosyndicalist

指導教授：黃德北

研究生：陳慧嫻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謝誌

這篇論文花費了很久的時間，主要的原因是在研究的過程中經歷了工會分裂，使我遲遲無法提筆記錄下這段過程，這個分裂不只使我的研究設定受到影響，它更深刻的影響了我的生命，我對安那其主義的認識。我認為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反省這個經歷，也需要更長的時間與經驗來解答我在過程中所提出來的問題，畢竟「實踐」這個課題不是可以花三年就完成的。所以，我希望在謝誌的部分先跟讀者與幫助我在論文寫作的人們致歉，這篇論文可能還不夠成熟到足以將這段過程跟經驗發展成一個完整的實踐反省，然而我還是盡力將我過去所對安那其認識的一切整理出來，並且展現給大家我這三年在西班牙經歷過的理論實踐過程。另外一方面也因為做為一個論文總是要有個確切清楚的題目與方向，我選擇拋棄與削減很多的訊息與精彩的片段與對話，在理論概念上的介紹也盡量精簡對題，主要是希望針對論文的方向做討論。這使得我在西班牙經歷許多寶貴的經驗與很多從安那其方面來思考組織運動的思想辯證都無法在論文中呈現出來，其中也包括直接行動的計畫、行動方法與行動記錄還有許多在安那其主義思想上歧異與矛盾的問題討論，你們絕對無法想像這些討論之中所包含的內容是多麼的廣泛，從生活細節到組織行動，安那其主義的可能是無所不在的。這份論文最終還是完成了，即使我還是一直無奈於它的不夠完整、成熟，若是可以我請你們將它作為一個行動過程中的小結，而不要將實踐的這個概念停在文章的結尾。

而說到要感謝的人為數實在很多，首先就是感謝指導教授黃德北老師在這個過程中的幫忙，他在這個過程中不只在實質生活上幫助我，也常常耐心的聽我講述一堆在西班牙發生的工會內部問題，當我在遇到工會分裂時期曾經一度放棄安那其工團主義做為行動可能的想法，甚至在當時我認為我連論文都無法繼續完成，阿北老師不斷的提醒我必須要回到運動的起點來做思考，而不是陷入在內部鬥爭的問題之中打轉，在這個過程中我甚至都忘記了我們在政治思想上的歧異點，因

為阿北老師很少將他的政治立場投射到他給我的論文建議之中，而讓我可以全然的從我的政治立場去談我的參與與對安那其主義實踐上的批判與反省。除此之外，我還要感謝所有 CNT 內部的會員與朋友，即使很多人在工會分裂之後成了我現實生活中的「敵人」。經過這段分裂的過程，我想我在安那其主義的實踐與認識上更加的深刻。特別要感謝 Alejandro G.C. 他陪我做了很多的工會訪談，還有充當我在很多會議與談話中的翻譯，除此之外，我們也常常在日常生活中爭論安那其主義在實踐上的可能與問題；Alejandro D., Borja D. Josune, Inma, Miriam, Millie W. 等許多人在這個過程中和我站在一起面對工會發生的問題，我們也走過很極端的時刻，這讓我對於所謂「同志」間的政治問題與理解有更深刻的認識。

除了指導教授外的兩位口試委員也對我的論文提出了很多提供思考的問題，在台灣很少有機會能做這樣安那其题目的思辨對談，若不透過論文考試的機會我想我永遠都無法有機會去嚴謹的與人們談論我認識的安那其主義，與接受人們對我思想的挑戰。

我的家人在我所有的工會、社運參與行動中一直都是缺席的，但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很費心的幫忙我。除此之外，還必須要感謝那些不直接與我論文發生關係的人們，他們是我認識的各國、台灣的行動者，在與他們的談話中我常常學習到寶貴的知識，即使我們許多人在政治立場上是不一致的，但在相交往的過程之中他們仍然給與我很多的政治與實踐上的啟發。

中文摘要

安那其主義的行動在過去的台灣社會中很少被記憶，僅有的除了一個由主流媒體建立出來的一套歐洲青年黑衣投石客的形像，就是停留在那些浪漫文學主義、或是既不左也不右的不修邊幅的藝術家身上，它很少被真正的作為一個存有政治意識的運動來看待。的確，安那其主義中充滿著對革命運動的「浪漫情懷」，但是對於徹底的「社會革命」、還有「直接民主」、「直接行動」的政治原則才是安那其主義中最重要的核心。「浪漫」因為對於信念的堅持，而唯有行動的實踐才使得安那其主義者存在。

本文作者於 2009-2011 年間在西班牙參與有著百年老字號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的運動中，即是在找尋安那其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能，這個尋找不只對於作者是自身的一種實踐「醒悟」與政治「認識」，這個經驗也反應過去歷史中安那其主義在實踐與理論中內部的深刻矛盾，然而矛盾並不是只能將運動導向毀滅與終點，即使它在本文的經驗中像極了一記痛擊般對所有的當事人無情的擊去。然而，作者花了大半篇幅的時間在重新琢磨檢視安那其主義的原始思想時，就是在期待矛盾可以從「自我」中解開，只有從「安那其主義」的最初，我們可以與「內部的問題」和解，從作為一個「解放的個體」而成就解放的行動，推進解放的社會。

關鍵字：工會、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安那其主義、安那其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直接行動、直接民主、巴枯寧主義、安那其共產主義。

英文摘要

Anarchist movement has left a blank page in the social movement of Taiwan, the only idea people had about anarchist is probably the "Black Bloc" youth image from TV, as how the western mainstream media referred as "the terrorist", or people would call a romantic, utopian artist as an anarchist without a specific political conscious. Anarchism is seldom recognized as an existing political movement nowadays because it doesn't attract much media exposure (coverage), however it had existed and acted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blooming labor movemen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core principles such as "direct democracy" and "direct actions" are both leading the movement into a total social revolution.

The author had traveled to Spain between 2009 and 2011 and joined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hundred-year-old anarcho-sindicalist union - CNT. CNT as an union follows the foot step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the idea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ers must be achieved by the workers themselves', the union, which based their main principles with anarcho-sindicalism and consulted the union structur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CGT,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of 1911, through out th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with spanish civil war, Franco's regime, transition until this day, they had never stopped taking actions. With 3 year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union's activity the author had experienced a very different way of practice on theories.

Keyword: Union,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Anarchism, Anarcho-Syndicalism, direct action, Direct democracy, Anarchist communism.

目 錄

第一部 一擊.....	1
一、 分散四處的同志.....	1
二、 個人背景.....	2
三、 認識 CNT 口中的 CNT，與研究目標.....	5
第二部 安那其主義.....	9
四、 從安那其開始談起.....	9
五、 安那其主義與共產主義.....	11
六、 安那其與組織.....	16
七、 對安那其個人主義的誤解.....	18
八、 個人的解放.....	20
九、 自我解放在現實的實踐.....	22
十、 安那其工團主義的最初，革命工團主義.....	23
十一、 從革命工團進入安那其工團.....	27
十二、 安那其工團主義發展情況.....	30
第三部 實踐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與不實踐的安那其主義.....	37
十三、 西班牙 CNT.....	37
之一、 工會的建立.....	37
之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 CNT.....	38
之三、 CNT 走向安那其工團主義.....	39
之四、 西班牙革命.....	42
之五、 自我的叛變 – 反法西斯聯合陣線.....	43
之六、 CNT 加入政府.....	46
之七、 失敗.....	48
十四、 CNT 現在.....	49
之一、 CNT 現在與過去.....	50
之二、 面對社會的改變.....	52
之三、 分裂.....	53
之四、 修正的必要性.....	54
之五、 派系.....	55
之六、 怎麼辦.....	60
十五、 以《受壓迫者教育學》做為教戰指導參考書.....	62
第四部 介入.....	65
十六、 CNT 初探.....	65
之一、 2009 年初.....	67
之二、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70

之三、 雖然民主.....	71
之四、 我的觀點.....	75
十七、 故事的開端.....	84
之一、 環境介紹.....	84
之二、 潛藏的危機 – 「邊緣分子」「流氓」.....	88
之三、 電話銷售員爭議案.....	91
之四、 無法被瓜分的權力.....	94
第五部 終曲.....	98
之一、 轉換新工會，前進 2010 年百年全國大會	98
之二、 尚未結束的尾聲.....	103

圖 目 錄

圖 一、18F 總罷工當天情況	85
圖 二、賽城區的小鎮遊行.....	87
圖 三電話銷售員女孩爭議案中的三位女孩.....	91
圖 四、卡城工會在五一勞動節放假日在各個周邊小鎮的公共空間講述節日歷史	99

表 格 目 錄

表 一、工團主義工會會員人數 1910-12 (總數 600,000 人).....	30
表 二、工團主義工會 1930 年代初期會員人數 (總人數 850,000 人)	31
表 三、工團主義工會 1987 年會員人數 (總人數 82.000 人).....	35
表 四、CNT 第三屆大會，1931 年 7 月 11-16 日，馬德里	81
表 五、CNT 第五屆大會，1979 年 12 月 8-16 日，馬德里	81
表 六、CNT 第十屆大會，2001 年 12 月 4-8 日，科爾多瓦	82

第一部 一擊

一、分散四處的同志

我第一次離開西班牙之後，在賽城的地方聯盟分裂成三個團體，或是要更精確的說是五個團體：第一個是原來賽城的地方聯盟，之中包括幾個不同產業的地方工會¹；第二個是大部分從賽城 SOV 工會解散之後出來的一群人，這些人在一開始算是最多人數的團體，他們在離開 CNT 之後很快的登記成為一個獨立工會，並沿用 SOV(Sindicato de oficios varios de 賽城)的簡稱²，在之後改名為 AM；第三個是我後加入的卡城工會(之後稱卡城 SOV)，這個工會的人大部分來自於賽城地方聯盟中的公務員工會(Sindicato del Servicio Público)；若有似無的第四個團體是那些在離開之後沒有再加入任何工會的游移人士，他們其中有些人在一開始考慮加入 AM，但是自始至終都沒有正式入會，另外的一些人喊著回到 CNT 反攻奪回安那其主義的正義，但他們在之後並沒有太多的動作，比較傾向重新加入 CNT 其他的地方工會(在地緣和工會規定的情況下，除了賽城地方工會外，他們剩下的選擇只有加入卡城 SOV)的「策略」，但這些人對所有其他的 CNT 工會(包括卡城)都抱持著極不信任的矛盾態度。另外第五個團體，指的是已經放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而轉而加入其他政治路線工會的人們。

我在 2009 年的年初來到西班牙，馬上開始參與 CNT 賽城工會地方聯盟的運動，初期我並未正式入會³，直到 2009 年 10 月之後我才開始由工會的朋友幫

¹ 一個地方上可能因為人數較多而又分成幾個不同產業的地方工會。這些地方工會會共同在地方上組成一個地方聯盟。

² 這個工會原來在賽城 CNT 裡的全名是賽城 SOV，意指為賽城 CNT 工會的多產業(industry)工會(之後在本文都簡稱為 SOV 地方工會)。CNT 的所有 SOV 工會是全國在地方上不分產業別的一個工會，當一個產業達到 25 人之後就可以離開 SOV，自行成立其自屬產業別工會，如運輸工會、清潔工會等。沒有在這些產業別的工人也都一律歸到 SOV 工會中。

³ 當時因為考慮到無法負擔每個月 12 歐元的會費，所以並沒有「正式」的加入工會，但我的參

忙負擔會費正式加入工會，但在這個時間點上，工會正步向瓦解的開頭。2010年初我回到台灣，賽城地方聯盟支離破碎，權力的角力戰從工會辦公室延燒到會員的家庭生活，人們以生命互相要脅著、算計著使對方陷入背叛者之名，如同1936年西班牙內戰中的CNT再現⁴，人們無法在歷史的傷痛中學習，我們似乎只能重複著資本主義對我們的壓迫，以不同方式的暴力互相殘害。

二、個人背景

在我初到西班牙的時候，原本負責我在工會實習研究的關係人是 Paco，2008年當我寫信到 CNT 賽城工會時他身任工會的秘書長，但在 2009 年我到達西班牙之時，Paco 已經因為工作而被調到港口城，他也轉而加入港口城的地方工會聯盟。我的研究負責人因而考慮被轉交到 SOV 工會文化秘書 Issac，或是當時做為服務業工會行動秘書 Sergio 的身上。在這期間也曾考慮由 Diego 作為我的負責人，因為他與 Paco 和我個人私交上比較頻繁，在當時我們在工會活動的交集也較為密切。在 2009 的夏天前，一次與人類學者 Santos 在工會辦公室的偶遇談到我的研究，他對此也充滿興趣，便開始加入協助我在賽城地方工會對安那其工團主義的論文研究。除了工會的一般事物之外，我多次與 Santos 還有 Paco 在其他地方見面討論我的論文。作為研究安那其主義的人類學者，他們積極的對我的研究方向與探究方式提出很多的意見與「導引」⁵。這個協助在 2009 年底，在賽城工會的破裂點上結束，我再也沒有與 Paco 聯絡，Santos 斷絕了一切與工會相關人士信件與其他通訊聯繫。除此之外，失業將近一年的 Issac 也選擇離開賽城到馬德里工作，並且斷絕了與工會會員的聯繫，之後我還在馬德里見過他兩次，

與如同正式會員。

⁴ CNT 內部的爭議與派系對抗是從工會建立以來就一直存在的組織內部問題，特別是在 30 年代知名的工團「三十人派」對上 FAI 的安那其主義派造成了工會在內戰中一個嚴重的內部傷害。

⁵ Santos 在西班牙對於工會民主的研究，在安那其運動圈裡頗有名氣。

最後一次是在我離開西班牙的當天，當我與他談起工會發生的問題時，他猛搖著頭不願意接受。

我的研究在一開始定名為「安那其工團主義在安那其主義上的實踐」，這個題目主要想要探索的是，安那其主義思想在實踐上的可能⁶，而安那其工團主義作為我研究的主要核心，考量在於它有一個很確切的工會團體(主角)作為它的實踐方式與鬥爭場所。這個工會團體形式的運作方式，從 20 世紀前後，在整個美洲大陸、歐洲甚至亞非地區，都存在近百年的歷史，一方面它累積了實踐的經驗，並且也存在足夠的時間讓行動與思想都有去犯錯、修正與改變的機會，而成為一個成熟的運動。另外，我所選擇的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後稱 CNT)在學術研究資料與文獻上也算是比較充足的⁷，它不僅在它出現的 20 世紀初深刻的影響了西班牙工人運動的開端，在今日也是全球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中最活躍的一支。

另外一個最主要原因則是來自於我自身的政治傾向。大概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觸到安那其主義思想，主要起因是來自於朋友介紹的龐克音樂，那時的安那其對我來說只是一些從龐克樂中偷渡進來的「符號」，包括黑色旗幟⁸、每天鬼吼鬼叫「安那其」、圈字 A(Circle A)等。在當時我對於這些「外來文化」⁹不存在什麼樣的意識，純粹尋求的是一個受制於台灣社會青年同儕壓力之下的「標新立

⁶ Felipe I. 在 2010 年發表一篇對兩本在 2009 年出版關於安那其與工團主義相關研究書提出評論的時候，曾經談到對於安那其與工團主義兩個概念上的差別，他談到安那其主義應該做為一個思想的意識形態——一組政治和意識形態思想與價值的原則；而工團主義則是一個「策略」行動——在某個意圖下選擇最合宜的手段。人們不應該把兩者混為一談，在這個混淆的結合上對其提出分析。然而，我在此研究的範圍中選擇是兩者合併做研究的重點，就我在安那其主義實踐的經驗中發現，安那其主義對於不管是行動或是策略上的選擇是有非常緊密的關聯性，一個行動不可能只是作為事件的單純反應(純粹的策略)，不管在面對問題的認知上或是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選擇上都是與意識型態相關聯的，他的行動是一定程度的反應到他背後的意識形態。Felipe I., 2010,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ook". (<http://www.infoshop.org/page/Review-Revolutionary-Syndicalism>)

⁷ 雖然 CNT 在學術上的研究上比起其他的工團組織或安那其團體要多，但大部分仍然是著重在內戰時期的工會運動，在近代的研究上所存不過寥寥幾本書，其中以 Vadim Damier 所著的《二十一的安那其工團主義》有些許的談到 CNT 在近代的情況，但此本著作最重要的貢獻是在對安那其工團主義發展的介紹，在本文中多次引用。

⁸ 黑色旗幟(Black Flag)是一個有名的龐克硬蕊樂團的名稱，同時也意指安那其的黑色旗子。

⁹ 這些資訊當時都來自於住在外國朋友寄來的信件，對我來說他像是一個「西方文化」。

異(be different)」個人表面上的解脫。然而這個解脫無法帶來積極的覺醒。直到「動物權」這個概念第一次將我帶到一個「母體(Matrix)¹⁰」之外的世界，因而開啟我在行動實踐上的第一步——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這也讓我改變看待世界的方法。然而，直到我踏上美國之前這一切仍相當模糊與抽象，在美國的前幾個月，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交給我一本支離破碎的書¹¹，書中滿滿的記著不同語言的註解、提問、問號與想法，那位安那其朋友跟著告訴我，我必須要以自己的方法去讀安那其主義，並且在這本書中接續我的筆記。這段生活很深刻的影響著我對安那其主義的認識，當時我初到美國所識英文不多，加上文化的隔閡，我一度無法理解周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但這並不影響這些人將我完全的接受到這個安那其主義者的小社群中，他們與我這個「外人」分享一切。這個經驗讓我有機會理解做為受壓迫階級在世界中共同的命運。我當時的學習並不是靠著書本的知識，時時刻刻發生在街角、一個夏天午後的漫遊、一場行動，或拜訪拉丁美洲朋友家中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從新學習。然而，侷限在當時「外國人」的身分，在「直接行動」等的非法行動上具有較多的危險與後果考量，我的參與常常是很邊緣的；另外，語言障礙或是文化差異也造成在參與及對問題認識上存在著某些差異性。

這些問題，使我在過去從未有過足夠的時間或是經驗與能力來加以處理，對此我感到十分惋惜。因此，我對整個安那其運動抱持著一個更大的期待(那些我還尚未成就到的與見識到的)，選擇探究西班牙 CNT 在安那其主義實踐上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將自己更深入的投身到運動之中，並把這個「全然解放」的運動以論文的方式書寫出來；另外一方則是希望可以在行動參與的過程當中，加深我個人層次的解放，與對安那其主義思想上更徹底的行動實踐。但，抱著這樣的心態與想法來做研究並沒有把「我」與工會之間的關係釐清，而且在實際的行動上，我根本是抱持著如同「宗教性」的聖地朝聖心態，期待眼見到 1936 年 CNT 在西班

¹⁰ 在電影駭客任務中由電腦主機所創造出來給與人類的虛擬世界。

¹¹ 之後我才記起那是一本 Emma Goldman 的著作，當時我相當刻苦的一一查單字，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將那一本書看完，之後書又轉交給下一個人。

牙的社會革命重現，而忘記了革命是一個持續的行動，而不是一個「景觀 (spectacular)」；另外一方面，過度的期待伴隨著過度的信任，最初期我在繁忙的工會行動中自我陶醉，而忘記批判，直到當工會開始出現嚴重的破裂危機時才猛然覺醒，這個時候我已經失去了可能對工會破裂有效介入的時間點，而且，我甚至無自覺的介入了分裂的加深¹²。

三、認識 CNT 口中的 CNT，與研究目標

面對 CNT，一個工會形式的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團體，或是應該要更政治正確的解釋 CNT 並不是一個嚴謹的安那其工團主義「思想」團體，而是一個以安那其與革命工團主義原則所架構出來的工會組織，或是更確的說「聯合會 (sindicato)」的工人組織。在 CNT 章程中自己作為安那其工團主義的界定來自於工會出版的宣傳小冊《什麼是 CNT(¿Qué es la CNT?)¹³》：

“All of these assembly ideas are inspired by anarchist ideals. Anarchism is a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asserts that society can organize itself without power, coercion and violence. We deny the need for political specialists enabled to make decisions in the name of other persons. The alternative ideas of self-management, participation, decentralization,..., are anarchist ideas.

¹² 在 10 月份的時候我自願充當工會的會計秘書，因為這個職務在上一個秘書請辭之後許久都沒有人回應是否願意接收這個職務，而上一個秘書也已經達到限制年限。我當時抱持著好意的心態，想像即使接下的會是個「苦差事」但總能幫忙一些事情，況且秘書職只要聽命辦事，對於我這個西班牙文不太好的人來說，這樣的工作可能更適合，另外我在念技術學院時也修了 2 年的會計課程，這份工作應該可以處理的得心應手。但是，這個自願的提案卻觸發了工會某些人的「不滿」，本來與我相友好的上一屆秘書甚至在會議上攻擊我的「工會參與角色」不明，無視於我在過去 9 個月參與每個工會活動、拍照與剪輯影片的「參與」工作。

¹³ 本文取自於《Qué es la CNT》由 Licom 在 2011 年 5 月刊登在 <http://libcom.org/library/what-cnt> 的英文版本。

We want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the suppression of wage work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Our finality is Libertarian Communism**, a social-economical system that brings liberty and equality as its fundamental values. **And we think that to achieve our goals we should use methods coherent with them.**

But we also think that each State aggression should be met with a response. We don't turn the other cheek nor conform to injustice. This principle of self-defense implies a confrontation with bosses and institutions. **Due to all this the CNT is Anarcho-syndicalist.**

The confluence of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that propagates the emancipation of workers by themselves and the abolition of class society, and from anarchism, with its ideas of organization without hierarchy and authority, of coherence in means and ends, of instauration of Libertarian Communism, etc, comes anarcho-syndicalism.”

從上面引用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工會的思想概念來自於「安那其主義」的啟發，但另外一方面，在誰可參與工會(Who can belongs to the CNT)¹⁴的部分，又可以看到CNT對於會員的規定上是開放的，既然在開放的情況之下，這個全體大會的組成是由當下的會員所構成共同決定的，他是否依照安那其主義的啟發來行動，似乎並不是一個可以由 CNT 所預先設定的政治意識。

“Any worker can be affiliated to the Union, no matter its political ideas or religious beliefs. He/She **just has to accept our associative pact, and respect the decisions taken by the assembly.**”

在這樣的現實下，我們只能確定的說 CNT 在組織的章程與思想上是承接安那其思想的，但在行動與實踐上則是必須依靠工會成員來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之

¹⁴ 同前註。

下才能夠符合工會對於「由那些受到影響的人自己做決策」的「自治、自主」原則。這個部分，我認為它似乎出現了一個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落差的矛盾點。

CNT 受到安那其主義思想的影響，組織在設定上更加開放，接受了來自於各種不同政治、信仰背景的會員，工會的政治取向因而同樣的也受到了挑戰。那個所謂的「最終的目的，是自由共產主義實施」恐怕並不是工會所能在章程中先定出來的「組織最終目標」，因為從頭到尾，工會從未要求加入會員一致的認同這些思想，而只是要求會員對組織原則「接受(accept)」，而這個「接受」在現實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認定的機制」，更遑論它是否可以有效的讓會員真正的認識工會背後那個複雜的意識形態。所以在這裡要能夠有效的檢測 CNT 是否可以在行動與思想上的一致，則是要落到那些「沒有被規定出來」的日常運作與組織行動。這部分在工會的組織章程中沒有被提到該怎麼做，只有指出幾個主要的原則：直接行動、直接民主。但是這樣的政治思想要如何能夠在現實上實踐？也或，它在工會中怎麼樣的被理解跟實踐的？這個部份是我在工會中主要的研究重點。

另外，本來研究團體的設想是範圍廣大的一個西班牙自治區(CNT 的區域聯盟)¹⁵，但是最後我決定將其縮減為我活動的範圍，包括 CNT 賽城的地方聯盟中的 5 個地方工會、同一個區域聯盟中卡城 SOV 地方工會和就幾個我所參與到從地方、區域到全國層級會議的觀察。CNT 賽城地方工會的分裂造成了整個西班牙 CNT 中間嚴重的內鬥，其中混雜著很多無法簡單、輕易解讀的交叉訊息，使我選擇放棄去探究那些周邊的工會組織。另外，因為我在賽城長時間的參與也讓我可以真正的深入到組織內部的核心，聽到與接觸到最真實工會原貌。很多外部工會成員曾經提醒過我，賽城的事件不應該放大來做為一個研究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案例，但我並不認同，我在賽城所面對到的工會內部組織問題，不僅在

¹⁵ CNT 的工會在全國總共分了 3 個不同的聯盟層級，最基礎的單位是一個地方工會，包括小鎮、城市中以不同產業所分別出來的工會單位，當這些地方工會在一個城市或一個較小的區域中聯合起來就成為一個「地方聯盟」，而分部在同一個區域的地方聯盟在一起組成區域聯盟，最後區域共同完成「全國聯盟」。本文研究的範圍是賽城的地方聯盟。

CNT 自身的歷史發生過相似的情況，它也是安那其主義在實踐中所要面對的一般性問題。另外更好的解釋是在 2010 年底的全國大會會場，我與卡城 SOV 工會的秘書長在大會入席的入口與全國聯盟秘書就我們是否可列席的事有所討論，我們認為在大會的規則中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因而力圖爭取入席¹⁶，這個過程中許多的工會為此對我們惡言相向。試想，若是沒有存在衝突的話，我們就只是一個單純想進入工會大會的會員，而「入席」但沒有「投票權」的情況下，對於那些素未謀面的其它工會代表到底能有甚麼「威脅性」呢？

然而，當我們在面對到這一連串工會分裂、組織解體、背叛與挫敗之時，我們真正應做的不是去探討問題的細節，而是去面對問題長成的原因，與勇敢檢視在面對問題時所我們所採取的行動與反省，而不是一昧的將錯誤「個案化」。而在經歷這一連串的問題上，我深深的認為，一切的源頭來自於「解放」。在 1907 年的第二屆安那其國際大會上，安那其主義者們討論著安那其主義在個人與組織上的問題，在當時 Hynan Croiset 堅持的捍衛著個人的自由，他刻意誇張的強調著「我我我，然後是他人」¹⁷，也質疑組織是否會做為個人解放的反動？當時剛要成形的安那其工團主義的擁護者在最後確定了組織與個人解放是並進的，但是隨即在 1936 年的內戰之中，CNT 做為當時最大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就馬上驗證了組織與個人的政治衝突難以化解。這個思想在之後的實踐上，仍然不斷重複著個人主義在當時對於組織的告誡與擔憂。這一個題目我們解了一百年，現在仍在持續中。因此，我個人特別想把整個研究的開頭與結尾纏繞在「解放」的概念，因為由此安那其開始；也為由此，安那其發生。

¹⁶ 在 CNT 全國大會規則上說到工會成立滿 12 個月可以入席並投票，另外不滿 11 個月的工會不能發言、入席或是投票，只能列觀察席。而我們工會正處於滿 11 個月未達 12 月的處境，因而我們從 10 月份開始就爭取入席發言，但不投票。區域聯盟從頭到尾都不接受我們的說法，而最終我們決定在大會中與全國聯盟據理力爭。

¹⁷ Translated by Nestor McNab, 2007,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gress Amsterdam of 1907", p.30.

第二部 安那其主義

四、從安那其開始談起

“It is very likely, of course, that if you should then see people gorge themselves while you go hungry, you would demand a chance to eat, and you would be perfectly right in that. And so would everyone else, which means that people would not stand for any one hogging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they would want to share in them. It means further that the poor would refuse to stay poor while others wallow in luxury. It means that the worker will decline to give up his product to the boss who claims to "own" the factory and everything that is made there. It means that the farmer will not permit thousands of acres to lie idle while he has not enough soil to support himself and family. It means that no one will monopolise the land or the machinery of production. It means that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SOURCES OF LIFE will not be tolerated any more.¹⁸”

柏克曼在《安那其 ABC》中所談的安那其主義並不是甚麼複雜的哲學思想，他僅僅只是關於社會公平的基礎概念，當你在挨餓之時看到狼吞虎嚥的人，當有人拼命在浪費之時，有人正在因為飢餓而死去，我們追尋的是一個不再有這些問題的自由社會。在其中人們不會過度的佔有，或因為缺乏而死去，並且在這個社會環境中，人們有了剩餘的力氣去追尋他所調的和樂生活，可以完成人性的發展。

克魯泡特金更簡明的將安那其的概念以一句話來解釋「各盡其用、各取所需」，「…趨向完全的工作，以求在社會產生一切財富，這樣最後令他不致因為個人的

¹⁸ Alexander Berkman., 2005, *The ABC of Anarchism*, p.11.

分立，不能區分公共生產的部分；…趨向個人最圓滿之自由，已達到一切的目的，不特利己且利社會的全部。」¹⁹這個概念雖然在字面上繞著個人打轉，但其中卻是具有深刻的政治與經濟意義，它涵蓋了包括生產、生產方法、社會分配與由個人自發而加已取代的政治權力。

以柏克曼和克魯泡特金的安那其概念基礎來做起頭的目的，是要從一個日常生活基礎的概念做為出發點。在台灣的坊間書店與公共圖書館很容易可以找到幾本安那其思想概念的書籍，但是多半是就著安那其主義思想的原型打轉，獨厚理論上的理解，對於安那其主義要有更深刻的理解是困難的，並且很容易誤會這個思想最終的目的只是一個「烏托邦」概念，「因為過度理想性」的消去了權力，而聽來不切實際，像是烏托邦一樣只能想像無法實際的存在。因此在本文中，我想要脫離哲學概念似的談法來將這個研究中的理論賦予一個活生生的長相模型，讓人們可以更容易的理解一個可以被付諸實踐的安那其行動方法與思想，之後我將去對應對我在研究中所認識到的原則與實踐上的差異並不是一個必然的現實，而只是必須要再次反省思考，與修正行動來回到安那其的路徑上。最重要的，安那其主義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活的思想，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巴枯寧這個有名的安那其主義者的生命一樣，他不僅只是一個坐在書堆前的研究學者，最重要的部分發生在「街頭」、「鬥爭」、「破壞」與積極的行動上，唯有在實踐的過程中安那其才真正的存在。

在此先簡單的將安那其主義的思想原則說明，主要的包括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一方面他追求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狀態，將土地、資本和機械與工錢制度廢除，並且將所有的物質都歸回到社會上以共有共管、共治的方式加以分配與管理。政治上的基進主義，讓他們意圖廢除一切政府機構，讓人們在生活中充分的發揮自發性(initiative)和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在地方上集結成社團與生產組織

¹⁹ 克魯泡特金，天均等譯，1987，《無政府主義》，p.223。

與聯合會；不同的團體再集結成大範圍地區上至全國、國際聯盟，所有的權力集中在基礎的地方團體會議上，由個人的參與而加以完成²⁰。

五、安那其主義與共產主義

巴枯寧曾經說道：「把一個最基進的革命分子放置在統領俄國的位置上，給予他獨裁的權力…在年終之前他就會比沙皇還糟糕了。」²¹

安那其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經濟的概念是一致的，「至於經濟的概念，巴枯寧完全是一個共產黨²²」，這個問題人們常常不甚了解，主要的原因來自於第一國際時期馬克思與巴枯寧的分裂。許多的共產主義者因而誤以為安那其主義是與共產主義做為兩相對立，加上共產主義在過去不斷的強調、攻擊安那其主義是「極度個人主義的」，或是「小資產階級」²³的鰲腳左派，而造成安那其主義在左派的運動中的誣衊。

安那其主義有許多不同說法，如：自由共產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也存在不同思想派系的差異，但是它的主要原則如上一單元所述的，它的經濟系統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它與所謂「共產主義(一般被簡化成馬克思主義)」的分歧點就是在於馬克思與巴枯寧的爭論點 – 國家共產主義(State communism)與自由共產主義(libertarian communism)，還有革命方法的差異。

普魯東作為第一個在文本上自稱為安那其主義者的思想家，他在其《甚麼是私有財》一書中大大的抨擊了私有財的觀念，再提出了私有與擁有兩個不同的概

²⁰ 同前註，pp.100-101

²¹ Michael Albert, 2006, *Remembering Tomorrow*, p.321. 原文：“Take the most radical of revolutionaries and place him on the throne of all the Russias or give him dictatorial powers... and before the year is out he will be worse than the Czar himself.”

²² 克魯泡特金，天均等譯，民國 76 年，《無政府主義》，p.101

²³ 〈蒲魯東反對梯也爾的演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p.358。

念差異。這本書無疑的是一個對資本主義最大的嘲弄，因而流行在當時十九世紀的歐洲，馬克思受到本書的影響而展開了他的政治經濟學上最有重要的研究，主要的原因是要打擊普魯東所提出的**構成價值論**²⁴。之後馬克斯與普魯東在其後期的書「哲學的貧困」又有了一連串的論戰。馬克思在此對於普魯東的質疑是有其道理的，普魯東一直以來在於經濟政治上的研究不如馬克思來得透徹，他在想法與論述上也不甚成熟。人們就他在對小型企業與地主的讓步下，指控他抱有「小資本家的習氣」。而普魯東的論述事實上在安那其的理論與思想上也不是全然受到接受的，巴枯寧曾經批判普魯東的追隨者們「只有一小搓人，而這些人是自我封閉的」²⁵。最後在第一國際中，這些人被巴枯寧說服改變他們的想法，也接受以集體²⁶來取代所謂的小型商業制度。

而另外一個重要的分歧，關於巴枯寧與馬克斯在第一國際上的辯論。巴枯寧揚起的黑色的旗幟，反對「國家」，或是主張廢除任何形式上的「霸權」與「領導」。

“I detest communism²⁷ because it is the negation of liberty and I cannot conceive anything human without liberty. I am not a Communist because communism concentrates all the powers of society and absorbs them into the State, because it leads inevitably to the centralisation of property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while I want to see the State abolished. I want 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the authoritarian principle of state tutelage which has always subjected, oppressed, exploited, and depraved men

²⁴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pp.92-93。

²⁵ Daniel Gué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21.

²⁶ 在安那其主義中，巴枯寧是屬於「集體主義」的代表，而集體主義與克魯泡特金後來所提的「自由共產主義」（也是本文設定的古典安那其主義原則）是有所差別的，但是筆者不將這個部份在本文中拿出來討論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認為這個討論與我的研究核心安那其工團主義的理解與助益不大；第二、雖然說巴枯寧在當時所提的集體主義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但我認為巴枯寧意圖向這樣的方向發展，只是這個概念在當時沒有足夠的時間跟環境在巴枯寧的思想上成形。近代的安那其主義對於集體與共產主義上的爭議似乎也沒有很積極的理解與釐清他們之間的差異，因此我在此就選擇不特別的將巴枯寧的這個集體概念與共產主義的概念區別特別標示出來。

²⁷ 巴枯寧在此時所用的共產主義指的是國家共產主義。

while claiming to moralise and civilise them. I want society, and collective or social property, to be organised from the bottom up through free association and not from the top down by authority of any kind.....”²⁸

巴枯寧不只在面對馬克思的爭論之下反抗國家，同時他對於國家的對抗也是建構出安那其主義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巴枯寧與馬克思的鬥爭中同時也牽扯著個人情感和當時在第一國際中派系鬥爭的情境影響，使得這兩方的對立更加的戲劇化，兩方的批判上伴隨著惡意的偏見²⁹。但是若是我們將這個爭論拉開到近百年的歷史與經驗來看，巴枯寧對馬克思所提出的質疑或許在現今看來也不是那麼的難以理解。

“...to see any State as oppressive, but maintain that only dictatorship - their own, of course - can create freedom for the people; to which the reply is that every dictatorship must seek to last as long as possible. Instead of leaving it to the people to destroy the State, they want to “transfer it... into the hands of the benefactors, guardians, and teachers,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y see quite well that such a government, “however democratic its forms, will be a real dictatorship,” and “console themselves with the idea that it will be temporary and shortlived.” ³⁰

巴枯寧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國家消亡的這個說法，他衷心的向人們強調著“...(the state) which again begins to exploit and rule in the name of common happiness or to save the State.”³¹國家只會一味的重覆著國家的專制模式，因為做為一個集中權力的統治中心，它存在著壓迫的本質。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經濟解放與安那其主義的思想和目標是一致的，最

²⁸ Mark Leier, 2006, *Bakunin: The Creative Passion- A Biography*, p.214.

²⁹ 威爾森·艾德蒙，劉森堯譯，2002，《到芬蘭車站：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及發展》。

³⁰ Daniel Gué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12

³¹ Ibid.

急迫的階級目標是在一個沒有霸權的自由環境下，達到經濟和道德的解放，這指的並不是一個新的權力，一個以多數強迫少數的體制。安那其主義意在消除階級壓迫、經濟不平等，以一個根本的方式去追求最終目標。同樣的安那其主義反對那些與安那其思想矛盾抵觸的解放手段抗爭。因此他們拒絕去衡量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式的抗爭，縱然議會主義的目標是改善工會運動的環境，但那些已公開或未公開的知識分子霸權，必然會造成新官僚制度的手段的產生，以多數壓迫少數。而安那其主義意在廢除階級壓迫的手段，這是從個人身上直接發起的：『直接行動』，和『個人的不服從』 - 就是說積極和被動的個人，從個人和群體的方式出現，向集體的意願發展。」³²

另外在革命路線上的差異，巴枯寧提到革命「就像一個小偷一樣，在夜晚來臨。」他們是“produced by the force of events” “They are long in preparation in the depths of the instin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masses - then they explode, often precipitated by apparently trivial causes”³³ 因此對於馬克思的前鋒隊指導革命的想法，是無法認同的。

他更進一步的說到 “But, it will be said all the workers... cannot become scholars; and is it not enough that with this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here is a group of men who have mastered the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socialism as completely as is possible in our day, so that the majority... can be certain of remaining on the right road to the final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simply by faithfully obeying their directions?...”³⁴

除了難以接受知識分子在勞動階級運動所被賦予的那個帶領革命的優勢位置，巴枯寧質疑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他們甚至在領導上都無法出現輪替，

³² Translated by Nestor McNab, 2007,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gress Amsterdam of 1907”, p.59.

³³ Daniel Gué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17.

³⁴ Ibid., p.11

而由同一個人持續的在位長達數十年，為了要穩固所謂的「民主，親民的共產黨路線的一致！」並且有效的清除其他的派系。這個質疑在 60 年代由卡斯楚結束了古巴的工團主義達到證明 – 這是在 Machado³⁵或是 Batista³⁶政權都還沒有做得到的事³⁷。

巴枯寧提醒人們群眾的自發是最重要的，也是所有行動的基礎。而為了促發這些群眾的自發行動，他提出一個「自覺前鋒」的概念 “For revolution to triumph over reaction the unity of revolutionary thought and action must have an organ in the midst of the popular anarchy which will be the very life and the source of all the energy of the revolution” 由幾個人所組成的小團體，盡量的生產出 “a natural effect on the masses”³⁸。這個自覺前鋒的概念與馬克思的革命前鋒是很不相同的，「安那其主義者必須要成為群眾中『看不見的舵手』」³⁹。他們絕不能以「公開的權力」去指導他。「不！前鋒隊並不是人們的恩人或是統治領導，他們只是自我解放的助產士。他們所能達到的僅僅只有那個人性天生一致的思想。」⁴⁰其他部分必然的一定要由人們自己完成，英國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 Solidarity Federation 在之後將這個概念在他們的組織中發展，他們將其稱做為意見領袖 (Idea leader)⁴¹。巴枯寧向人們強調，革命並不該被強加在群眾身上，而是要從人們之中喚醒出來；我們要的不是他們服從組織，而是要激發他們由下而上的自治組織。他的這個概念在 1936 年的西班牙內戰中從西班牙勇敢的安那其主義者戰士 Durruti 在行動中達到最好的實踐，他所率領的 Durruti Column 裡有幾千名的戰士，她們來自各地追隨軍隊，主要的目的是受到 Durruti 的精神感召，人們以自己之名為自己而戰，找尋一片自由解放的土地。

³⁵ 古巴獨裁者，1925-1933 在位。

³⁶ 古巴獨裁者，1933-1944 與 1952-1959 在位。

³⁷ Larry Gambone, “Syndicalism in Myth and Reality”, p.6.

³⁸ Daniel Gué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17.

³⁹ Ibid., p.18

⁴⁰ Ibid.

⁴¹ Brighton Solidarity Federation, “Strategy and struggle -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libcom.org/library/strategy-struggle-anarcho-syndicalism-21st-century>

俄國的安那其主義者Voline解釋，「安那其的主要思想是這麼簡單的：沒有政黨，或是政治、意識形態團體，即使人們真誠的想要，他們只有把自己放置在群眾上面或是外邊才可以『統治或是領導』。『真正的解放只能以直接行動完成...那些想著這些事的人們，工人們自己透過他們的階級組織(生產聯合會、工廠委員和合作社等)，而不是在任何政治黨派或是意識形態團體的旗幟下...』。人們的解放必須要在自發行動和自管(self-management)做為基礎之下，由革命分子⁴²參與其中而發生，但是這個參與絕對不是由上而下的控制，**這是一個推動的工作**，而不是控制。...安那其的思想和真正的解放革命絕不可能在安那其主義者自己的成就上實現，而必須且唯一的可能是在群眾普遍的參與下...，安那其主義者，或是其他的革命分子，只需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指導或是幫助他們。」⁴³

就如同在1907年，安那其國際大會中所說的，“That as expropriation and the taking of collective possession of the instruments and produce of labour **can only be the task of the workers themselves.**”⁴⁴

六、安那其與組織

安那其主義對於組織的概念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擁護個人主義的安那其主義者捍衛著個人主義中不可侵犯的個人絕對自由，和對「組織」霸權的厭惡，而反對「組織」。而另外一群人們崇尚著組織所帶給個人的活力與解放的幫助，他們努力的對抗那些傳統組織概念上的問題，力圖在組織的過程中發展出一個「真正」的組織，而不是「組織霸權」。

⁴² 這是與 Paul 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提的革命分子身分很相似的。

⁴³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18

⁴⁴ Translated by Nestor McNab, 2007,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gress Amsterdam of 1907”, p.60, 粗字體由筆者加上。

首先，義大利的安那其主義者Malatesta向不願進入組織的安那其主義者們，指出對組織認識論上的問題：「…在威權主義的教育下影響了他們，他們想像威權是社會組織的靈魂，而拋棄了社會組織本身，為了與威權對抗…那些反對組織的安那其主義者，在基礎的認識上犯了錯，他們以為組織是不可能脫離威權的。因為接受了這個假說，他們拋棄了任何形式的組織，而不是去接受那個最小的威權…若是我們相信組織是不可能在沒有威權的情況存在的話，我們就全都成了威權主義者了，因為我們仍然會情願接受一個受到約束的權威，而因為反組織而使我們的人生灰暗，使得生命不再可能」⁴⁵

普魯東更是高呼" Anarchy is 'organized, living society,'"⁴⁶ 而Voloine又為組織辯解到：「一個錯誤 – 或是說一個刻意的錯誤 - 解釋宣稱自由主義的概念就是反對所有的組織。這是非常錯誤的：問題不是在於『組織』或是『不組織』而是兩個不同的組織原則…當然，安那其主義者說，社會必須要有組織。然而，一個新的組織…必須要自由、社交地建立，而且首要的是由下而上。組織的原則絕對不行由一個特別建立起來的組織來控制一切，並且由一個中央機構將他們的決議從上而下強加在人們身上，相反的，我們必須從各方面著手來建立出不同的協調點，…另外一方面，存在著另外的一種組織，是由壓迫和剝削的舊社會複製出來的…它們只能延續舊社會的缺點…最後它只能持續得以一個新的謊言來延續。」

47

安那其主義者一直以來都是主張組織概念的，即使傾向個人主義的安那其主義者都不全然的排斥組織，如同Voloine與Malatesta所說的，當人們想到「組織」的時候立即的反應是一個充滿負面「強制」「約束」的組織概念。但是這不是組織的必然性，而是在其中的組織參與者以反覆、無情、冰冷的組織架構造成了組織的「必然之惡」。所以，與其說安那其主義者排斥組織，不如說他排斥的是組

⁴⁵ Translated by Nestor McNab, 2007,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gress Amsterdam of 1907"

⁴⁶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20.

⁴⁷ Ibid.

織在過去所塑造的那個「強制」的概念。自安那其主義發展以來，他們就不斷的努力意圖發展另外一個組織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由「自覺的個人」建立起來的，而組織的形成必然來自個人的「自發」，並由「自由契約」的概念來完成組織。

我在本論文中的主軸也是對於安那其組織中的一支—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研究，我將在稍後以更完整的方式呈現出一個現實中存在的安那其組織的組織概念。下一個部份將要談的是安那其主義中的個人主義，這是安那其組織中的基礎，在個人主義的概念之下我們完成了個人，而後有組織。個人，是做為組織最重要的基礎元素。

七、對安那其個人主義的誤解

“Some anarchists are more individualistic than social, some more social than individualistic. However, one cannot conceive of a libertarian who is not an individualist.”⁴⁸

所有的個人主義者不一定都會是安那其主義者，但安那其主義者都會是個人主義者。過去，人們常常混淆了安那其主義者是活在自我世界中固步自封的一群理想派，他們崇尚個人自由與個人最高的發展，另外一方面卻不願負擔社會責任與義務。這是一種普遍對於安那其主義思想的錯誤認知。的確，安那其主義思想中對於個人發展與個人主義的捍衛是重要的，但這其中的個人不是與社會相抵觸的，安那其主義者相信，只有在社會中他們才能真正的達到個人的解放。

巴枯寧他極力推動「全然和完全的自由」，他表示人們有權為自己做決定，包括了對於加入社會的聯盟之中，人們都該擁有自由去選擇他甚麼時候加入與甚

⁴⁸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13

麼時候退出，當他選擇進入的時候，他對於他所選擇的聯盟自然有他的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會主動的接受聯盟的規則而在其中生活。這其中的「因為個人做了選擇而進入了一個社會聯盟中」，不存在任何的強制性。他在聯盟中的身分是一個群體也是一個被接受的個體，因為這個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是一個出自「選擇」的動作，而不是一個「因為你在某地，而你被納入這個群體。因為你在那個車間，所以你就必須加入那個車間團體服從一切」。而當人們質疑這樣的社會關係中是否縱容了「邪惡」的自由發展，因為人們似乎存在「過度」的自決權，巴枯寧這麼回應：「不道德」是一個充滿邪惡組織社會的後果，而不是一個社會的天性，我們錯誤的將「限制、規範」與「秩序(order)」劃上等號，是犯了資本主義教化的偏見。他跟著提到道德的發展是可以在自由中得到改善的。當我們強加限制在人的身上，不管是以道德的藉口或是法律的約束都只能消極的解決不道德的即刻問題，不道德產生的原因並沒有被加以理解與改善，所以不道德只會不斷的產生，而沒有辦法被消除。

Stirner⁴⁹這個有名的個人主義派安那其主義者，對於個人主義更是極度熱衷。他提出的個人主義思想雖然不免過度的極端化，但是也很重要的點出了不少有貢獻的質疑。比如說，他對於共產主義中沒有思考到「工作」背後的那個「工人」感到不滿。他認為在共產主義常常把人們主觀的當作一個生產者，而不是一個個體來做思考。他說道 “to give man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himself as an individual after he has fulfilled his task as a producer”⁵⁰。Stirner 的這個關心是很重要的，他提醒人們生產應該是在於人的需求上來做衡量，但是，要認識到需要的首要條件就是必須認識到在社會生存的個人做為一個個體的這件事，而不是關於人數數量，需求與分配的多寡，這些單純的數學的問題。社會以共產主義方式重組的目的不該只是關心需求與供給上達到平衡而已，我們更應該去審視是人這個個體他在生

⁴⁹ Max Stirner，本名 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國的哲學家、安那其個人主義者。

⁵⁰ Daniel Guérin, *Anarchism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10.

活中的滿意與快活，是否被達到。在這個情況之下，他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集體中的個體，進而將集體團體完滿的達成——這是共產主義在發展的時候忘記去思考到的問題。除此之外，集權共產主義更將所有的一切置放在國家名下，使得個人在這個系統中消逝。它像是一個極度有活力的生產與分配系統，但也僅此而已，其中的個人是沒有身分與名字的棋子，做為完成體系的一個部分。所以，他強調只有當生產與需求這一切都是被一個快活的個體充分的認知的時候，他的社會才有可能得到一個和諧，而不是控制與管理下的和諧。

八、個人的解放

安那其主義中實際上最重要的根基是解放，這個解放的最小單位就是個人。安那其主義在個人解放上面，追尋的是一個「去學習化的學習」的徹底實踐。從我們出生在世以來，我們就被放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下生活與學習它的規範與行動模式，這個教育從家庭到學校與社會上深刻的內化到我們的體內，一個行動就是一個學習，我們揹負著這一切教化活在社會之中。因而安那其主義提醒人們，我們必須要著手進行一個「去神聖化」的行動，打碎強加在我們身上的資產階級道德觀。

“Like the bourgeoisie itself, its native soil, it is still far too close to the heaven of religion, is still not free enough, and uncritically borrows bourgeois laws to transplant them to its own ground instead of working out new and independent doctrines.”⁵¹

Stirner 對於自我解放上的觀點是很尖銳的，他提到從孩童時我們就學習觀察父母的道德觀並加以內化到自身，這些道德偏見不斷的複製存續在我們的身上。「抑制我不能自我解放的內部力量」，他說「這個暴力是更嚴重的，它隨著我良

⁵¹ Ibid., p.13

心對我怒罵」⁵²，「年輕人被一群群的送進學校去，學習那個些老舊的格言，當他們在心底學會那樣的措詞思想後就被稱為已經長大了」。「上帝、良知、義務和法律都是錯的，它們被塞到我們的女思想和心中」⁵³。真正的騙子是那些傳教者和父母「他們使我們的心糊塗和使我們思想變遲鈍。」⁵⁴若是真的有甚麼是「從邪惡中而來的」⁵⁵，那就一定是這個錯誤神授的的聲音，他竄改了我們的良心。沒錯，當我們面對了自我解放最大的敵人，往往來自於自己。我們不斷的自我催眠的接受社會上的一切不公義，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勉強自己「成就」，成就那些我們以為該成就的一切。辛苦的如同殉難者一般接受一切苦難，認其為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 **Stirner** 對於社會的憤怒也常常如同那些孤獨者一般，無法受到社會接受的人對著社會抱持著矛盾的情感。但是他仍然不斷的提醒人們關於社會與個人之間的發展是一致的，他指出，只有當人們真正的可以了解他自己的「獨一性」的時候，他才可以真正的與他的夥伴發展出良好的關係。當我們一個人的時候，我們並無法真正的看清自己，只有在與他人相互交往與接觸、我們在發現與理解他人的同時，我們對自我理解有著更深刻的認識，我們必須要一致的抓緊這個過程中的兩個方向，在不斷被挑戰、侵犯與干涉之中，讓我們更清楚我們的束縛，讓我們打開束縛學習自我解放，與相互解放。

而巴枯寧也常常向人們提醒，他不僅是一個基進的社會主義者，他同樣的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持續重覆只有在個人解放的過程之中，社會才能往更高的層次上發展與進化。我們必定不能忘記社會的組成來自於個人，因而個人在其中的解放是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

⁵² Ibid., p.14

⁵³ Ibid.

⁵⁴ Ibid.

⁵⁵ Ibid.

九、自我解放在現實的實踐

自我解放在過去在安那其主義中雖然不乏文字與理論的論述，討論與辯論也是極度豐富的，在 1907 年阿姆斯特丹大會上當安那其主義者在討論組織的過程之中不斷的重申他們對於個人的重視。最後他們在討論的會議中沒有達成有效的結論，但是不管是個人派的 Malatesta 和傾向於工會組織的 Monatte，都能同意在組織中個人解放的重要性。

但回到現實上來說，除了這些在會議場上或是論述的討論外，安那其主義的自我解放實踐上確是很陰晦不明。人們幾乎很少在實際的日常中討論與挑戰自我解放這個問題，就算在組織的過程中所有參與者不管是具有安那其思想背景或是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都會被認為是自我解放的，也或這是一個個人的課題，他人無法干涉，也不該干涉，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只是一昧的談著組織的問題。但是，在很多的時分一個由沒有自我解放個體組成的組織才是最重要的組織問題。人們不去做激發與挑戰的動作，如同他們在面對社會偏見與不公義上所做的「直接行動」。最消極是，在個人沒有通過解放的過程之中常常造成不斷的重覆資本主義習氣的工作態度與方法，當面對這個問題時，人們也只是不斷的以「對立」來加以回應，「直接的」人身攻擊與惡意的咒罵常是安那其主義者交惡時出現的景況。其中沒有所謂對於解放的了解，只是不斷的以惡意的言語加深因為認同上的差異而產生的不滿。

我在近二十年來安那其主義運動參與中的個人經驗中很少與人談到個人解放的問題，更多的時候我們討論的是關於「思想原則上的實踐與背叛」。

十、安那其工團主義的最初，革命工團主義

安那其工團主義的發生背景是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當時資本主義極度發展，面對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改變，工人們被極度的剝削在追逐資本剩餘的循環跑道之中。農村的人們也不停的被迫推擠出其傳統的工作場所而被迫進入工業勞動市場之中。工人如同機械般的出賣勞動力，而由上而下的壓迫式管理中，他們沒有自己聲音。在 1864 年成立的第一國際中巴枯寧派的安那其主義者就在這個地方開始組織起來，第一國際在工人運動的脈絡下提出了以工會做為主導的運動角色，以直接行動來做鬥爭。其中的安那其主義者提出，除爭取經濟上的控制之外，他們也要求以生產者組織取代國家。他們追尋一個**工人的自主**，「由下而上」直接民主式決策，這個概念將工人放置到整個運動的核心角色，他們終於從「工人運動概念下設定出來的鬥爭核心」的理論層次，走到運動中實踐行動的主角位置，他們盡情的在工會裡發聲，高談闊論的發表他們的想法、與人爭辯，在工作場所中以直接行動，而不需要透過中介者去爭取他們的權利。直到 1872 年第一國際分裂之後，這個路線仍然朝著其方向前進，這時他們也更深入的進到了其他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就是其中之一。

在 Vadim Damier 對工團主義的研究中，他將工團主義發跡歸納為幾個原因：工人在工業生產中位置的改變，使得分工的過程分離；工人工匠身分不再，因為工業的發展導致了對工人技術需求的降低，並且工作更加的零碎化，使工人不但在失去了在其專業領域中可能發生的組織勞動、或是分配勞動工作外，更失去了技能可產生的優勢、時間的控制；而工人階級為了符合與工作的便利性與隨著工業遷徙，他們被集中放在同一個居住的區塊中，有效的強化他他們對於階級意識的認知；而新產生的工廠管理機制，目的在於有效的組織生產，與製造最高的

剩餘勞動使得工人受到更高的壓迫。這一切都導致了工人的極度不滿，工人意識快速提高。⁵⁶

20 世紀初期，最主要的工會運動仍是落在社會民主黨人的手上，他們將工會運動合併到政黨發展之中，但是勞動條件快速的降低使得工人的不滿再也無法受到社會民主黨說法的安撫。另外一方面，工會不停的在爭議當中要求工人「適時」的妥協，以「工資協議案」要求工人接受，並且放棄罷工等強硬手段。這之中的工人無法與資方直接的協調，一切都只是聽著工會的中介角色來加以交涉。這讓工人的不滿加劇，一種新的工會基進派就在這個環境下出現 - 革命工團主義。他指的是「那些以革命性的直接行動去改變工人階級群眾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這是與議會改良主義成對比的。」⁵⁷

第一個真正具有革命工團主義傾向的工會出現在法國的工人總聯盟(後簡稱 CGT)，它的原則包括：獨立於政黨之外，不參與政治鬥爭的「直接行動」，爭取不經過第三者交涉的經濟鬥爭，達到薪資與工作條件上的改善，並且著手準備總罷工作為社會革命的手段。這些原則上是與第一國際中巴枯寧提出的革命方式很相似的。在當時 CGT 是法國最大的工人組織，1912 年擁有 60 萬人會員⁵⁸，他們積極的宣揚反軍事和殖民行動，引導八小時工時的法令，並且以罷工作為最有效的鬥爭手段。但在過了幾年之後，法國的工人總聯盟中的主導分子漸漸地被改革派所取代。

用 Emile Pouget 這個法國 CGT 的領導行動者的話來解釋革命工團主義的話，他就是工人階級在近代社會不斷的抗爭中找尋自我「不期待其他人，政府，或是任何外部的權力，但是去為自己創造自己抗爭的條件，找尋自己行動的資源」

⁵⁶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i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p.6-8.

⁵⁷ Ibid., p.7.

⁵⁸ Edward Shorter, Charles Tilly,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p.388.

⁵⁹，他所指的就是「直接行動」，目的在於迫使業主在害怕或是考慮到自身利益上而讓步⁶⁰。

參與在工會中的安那其主義者，不認為工會只能做為一個改善條件的抗爭工具，他們提出以工會發起總罷工做為社會革命手段，掌握住經濟控制權，再以社會的利益來共同計畫生產和消費。1909 年，Emile Pataud 和 Emile Pouget 出版了一份計畫書「我們如何革命」⁶¹，在其中，他們設想工會在革命罷工中可以沒收資本家資產，並將其轉換成生產者協會，重新組織生產分配，再將這個重組延伸到經濟和社會生活層面。以一個工會做為基礎而發動的安那其革命罷工儼然變成了一個可能，且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可以發生的行動。這讓安那其主義者更積極的投進到了工人運動中。從發生在 1907 年阿姆斯特丹的安那其國際大會中就可反映出，許多的安那其運動者已經擁到了革命工團的路線上：一群年輕人，不斷呼籲安那其主義者加入工人運動「準備」革命；對上了「傳統派安那其主義者」，他們在另外一方面要向人們提醒，所有的發展都必須要歸依到以人為本「個人」基礎上，他們要追求的解放是包括從：經濟、政治和道德三個面向的。但是，會議中也存在著相當不同的聲音，K. Vokryzek 不滿的向人們表示，工團只能做為一個手段，而不是目標，Malatesta 一面的表達他認為安那其主義者參與工人運動的必要性，另一面他也抨擊「革命罷工可以取代社會革命」⁶²的說法，他提出人們要將工會運動帶往安那其的路，而不是安那其主義者逕自走進去的說法。工團一派的安那其主義者們如 Monatte 則相信，只要在罷工革命之後，社會馬上可以就其工業的發展調整成「各取所需，各盡其用」的社會模式，在 1906 年出現在 CGT 大會上的「Charter of Amiens」就刻劃出一個革命工團主義的長相，他們提出「在日常的抗議活動上工會追求直接、即時在勞動階級的努力成果上協調，和增進工人福祉的改善，如縮減工作時間，增加工資等，但這項任務只是工團主

⁵⁹ Emile Pouget., 2003, *Direct action*, <http://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vhhngg>

⁶⁰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23.

⁶¹ Emile Pataud, Emile Pouget, 1909, "How we shall bring about the revolution".

⁶²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31.

義的一個面向；另外一方面，它為**徹底解放**做出準備，唯一的方式就是**對資本階級的徵收**，它主張以**總罷工行動**作為**行動方法**；並認為工會是現在的抵抗組織，但在未來，將作為**生產和再分配的團體，社會重組的基礎。**」⁶³荷蘭工團主義的 Cornelissen 雖然積極的策動安那其主義者們一同加入革命工團中，但他並不接受工團一味的革命後「自給自足」的想法，他辯論在近代工業時代中，經濟體制的發展是互相依存的，革命後的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的安那其工人團體可以從 1868 年當巴枯寧派出義大利安那其主義者 Giuseppe Fanelli 到西班牙招收第一國際會員開始，到了 1870 年第一國際的西班牙區域聯盟在馬德里設立。在這之前的一年這些思想也散佈到了巴塞隆納，在 1870 年所舉辦的第一次大會達到運動高峰。然而，運動很快的受到了西班牙政府的鎮壓，在城市的情況特別嚴重，但這個時候安那其主義的思想已經散布到村莊與小鎮之中，南部的安達盧西亞農民更是受到啟發。到了 1870 年代中，政府將鎮壓的行動加強，西班牙區域聯盟更趨於瓦解的情況，安那其主義運動不得不轉入地下。直到 1900 年再建西班牙區工人聯盟的行動才再次展開，這之間大部份的工人組織本質上都是獨立行動的。面對政府仍然對新成立的組織不斷的壓迫，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所組成的組織也做了幾個不同的轉換，到了 1907 年巴塞隆納自治工人團體，成立了「工人團結(Solidaridad Obrera)」聯盟，他們主要的目標是以工人的組織來取代資本主義系統，將社會轉換進入一個工人主導的社會，而這一波的行動也很快的在不同的區域發展起來，特別是作為工業核心的加泰隆尼亞區。

1909 年聯盟在巴塞隆納領導總罷工反對摩洛哥的殖民戰爭，最後這個罷工遭到軍隊殘忍鎮壓(悲慘之週 *Semana Trágica*)⁶⁴。類似的組織開始在其他的區域發

⁶³ The Charter of Amiens, The CGT 1906.

<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france/cgt/charter-amiens.htm>

⁶⁴ 這場悲慘之週的名稱是由加泰隆尼亞的資產階級所命名，而西班牙的工人則戲謔的將其稱為「七月革命」或是「光榮之週」。發生在 1909 年 7 月 25 日，在巴塞隆納發生的一場本來是以反

展開來。受到法國 CGT 的啟發，工會的運動也開始更加的頻繁。在 1910 年 10 月到 11 月之間一場巴塞隆納的大會，創立了西班牙全國工勞動聯盟 – CNT。「以 CGT 為組織的模型架構基礎，工人的會社就變為工會(sindicatos)。而就他們決策和決議的形式中可以反映出其原始企圖 — 合併安那其主義和革命工團主義，並且在大會中，CNT 再次接續了第一國際的口號『工人的解放要由工人自己完成。』」

65

在 20 世紀的前十年中，在拉丁美洲各國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也開始快速的發展開來。阿根廷區工人聯盟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後簡稱 FORA)成立於 1905 年，成功的發起了幾場有名的大罷工，但也立即的受到國家相對的大型鎮壓。1905 年烏拉圭區工人聯盟 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Uruguay(後簡稱 FORU) 受到 FORA 的影響下成立；1906 年的巴西工人聯盟 Confederação Operária Brasileira (後簡稱 COB)也相繼成立。在這個時期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在世界各地領導參與著八小時工時的對抗、反對殖民與軍國主義的行動。他們與國家的對立面在這時是很清楚的。

十一、從革命工團進入安那其工團

俄國革命，除了帶給工人運動一個改革外的革命選擇，也為安那其主義者帶來了一個對革命新的認識。Malatesta 對此的想像是「以革命行動讓工人佔有土地、生產手段，之後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和沒有剝削和壓迫的資方。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表示著所有人的專政，因此專政就不再專制。換句話說這是一個人人皆政府的國家，他就不會再是霸權、歷史的政府，而是一個

軍國主義，和平主義做為口號的行動，最後引發起一場總罷工。人們為了阻止一艘將航向摩洛哥的後備軍船在巴塞隆納港口靠岸，這個抗議活動後轉為攻擊並燒毀宗教學校、市辦公室的行動，參與者為大概三萬人的工人階級、工匠、老師與一些中產階級分子。

⁶⁵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i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32.

實際依著公眾意向完成的國家。」⁶⁶而另外一群安那其主義者受到布爾什維克「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服，他們想像在過渡時期建立一個「安那其組織社會」做為中介(安那其布爾什維克現象)。

雖然安那其運動中仍不斷出現對布爾什維克和其專政提出尖銳的批判，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所有的政治團體都還是深刻的受到革命對自己政治思想上的影響，革命工團主義也面臨了必須在安那其和布爾什維克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刻。在 1919 年 12 月在德國產業工會自由聯盟 Free Association of German Trade Unions (後簡稱 FVdG) 的第 12 屆大會上，德國安那其主義者 Rudolf Rocker 將傳統的安那其目標和革命工團主義的方法做了一個完整的合併，他相信社會革命無法在自覺之下發動，所以人們必須要在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準備」，準備的越好之後的痛苦越少，而這個準備的工作將交由「工會(聯合會)」，而工會也同時做為革命的機構和元素。

就 Rocker 的看法，工會不該只是為了立即的改善而抗爭，也應為了革命而抗爭，他們不是「資本主義短暫的產品，而是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細胞」⁶⁷。他同時提出一個由經濟與政治並進的概念，廢除金錢和生產系統，反對私有財產的獨佔性：「去集體化土地、工具、原料和所有的社會財富；以解放主義的基礎下重新組織所有的經濟生活，例如，去國家、共產主義，你可以從以下的口號了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⁶⁸」；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集權主義，還有國有化經濟，因為它可能「導向一個更慘的剝削 – 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Rocker 向人們提醒，工團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消除權力，而不是「贏得」權力，我們要以一個由下而上的決策方式改變社會結構，將生產回歸到生產者團體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的形式使工人不再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機制的剝削，「一個有機

⁶⁶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i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64.

⁶⁷ Ibid., p.67.

⁶⁸ 一個出自馬克斯的引言，最後受到自由共產主義沿用在具體的實踐上。

經濟體的自治會員，以互助和自由協定的基礎系統性的在共同利益下維持生產和分發」。另外在談到革命的手段上，Rocker 提出的是一個「革命總罷工」的想法，在革命總罷工中將資本、企業、商家、土地從資本家的手中沒收，交由工人委員會自行操作；土地與住屋等的管理也應該交到使用者所組成的居民委員會手上。一個地區內的各個工人聯合、委員會等再一併自由結合為社群(區)聯盟。革命工團主義在 Rocker 提出的概念下正式出現，成為了安那其運動核心的新血，它不再是一個有力的鬥爭工具，它變成了一個革命的手段、新社會的基礎。⁶⁹

而在安那其主義者開始更深入的進到革命工團主義的運動中時，革命工團也開始面臨了分裂的問題，兩條不同路線的國際聯盟在這個期間出現：代表安那其主義派的安那其主義的國際工人協會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之後簡稱 IWA。西班牙全稱為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簡稱 AIT。)、與共產國際主義的「紅色國際工會(Profintern)」。國際工人協會的出現背景，事實上反映了對布爾什維克的對抗，在成立大會上它們的宣言嚴厲的批判資本主義、改革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布爾什維克的「國家社會主義」，它們強調安那其工團主義團結基礎的共同目標是自由共產主義，或說自由社會主義，而它們的共同原則和抵抗方法則是直接行動，並發起社會革命。

而且，這時期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還擁有一個重要的元素，他們不將自己限制在工作場所的行動，不管在住屋罷工行動、失業組織上都是將行動帶到工作場所之外的方法。當然，工會組織傳統中的罷工直接行動、生產點佔領和破壞都是不可少的。對於他們來說以安那其作為原則思考的目的，絕不單純的只是工作條件的改善，工會也擁有社會主義學校⁷⁰的身分。另外，他們也很重視巴枯寧所提出的工人組織建立的必要性「這不僅是個想法，他也會是未來的事實」在這個革命前的時期。這個組織必須要為工人準備好去實踐直接民主、自主行動和互助，

⁶⁹ Ibid., p.69

⁷⁰ Rudolf Rocker, *The methods of Anarcho-Syndicalism*, p.5.

要實現這樣一個社會這些都是必須要的。

十二、安那其工團主義發展情況

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原則是將工團主義的經濟方法與革命政治的安那其主義合併。這使得他們包含了一切，從最小的宣傳團體到群眾革命工會，一切都以安那其的原則來做組織，權力分散、聯盟式的。

表 一、工團主義工會會員人數 1910-12 (總數 600,000 人)⁷¹

工會	時間	會員人數
FORA 阿根廷	1911	70,000
CGT 法國	1910	360,000
IWW 加拿大	1910	9,000
USI 義大利	1912	80,000
IWW 美國	1912	18,400
CNT 西班牙	1911	50,000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安那其工團主義分成兩個派別，支持戰爭與反對戰爭，同時間工會受到戰爭的影響而不得不迫使行動停止，但這個期間拉丁美洲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卻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另外一方面，做為當時最大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法國 CGT 工會也在之後的幾十年間不斷在內部自我分裂與出現不同的「修正」路線。而到了 1920-30 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伴隨國家強烈的鎮壓，許

⁷¹ Larry Gambone. "Syndicalism in Myth and Reality", p.2.

多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又再次面臨走入地下活動的情況。而這個時期西班牙的 CNT，一方面受到 Primo de Rivera 獨裁的鎮壓，另外一方面也受到由資本家組成的槍手隊(pistoleros)⁷²突襲，慘死無數。

表 二、工團主義工會 1930 年代初期會員人數 (總人數 850,000 人) ⁷³

工會	國家	會員人數
FOR A	阿根廷	100,000
CGT-SR ⁷⁴	法國	10,000
CGT	法國	750,000
OBU(One big union)	加拿大	24,000
IWW	加拿大	4,000
IWW	美國	24,000
CNT	西班牙	500,000
FAU	德國	50,000
CGT	墨西哥	80,000
SAC	瑞典	35,000

雖然因為鎮壓而造成工會在行動上的減緩，但就 Damier 在《二十世紀的安那其工團主義》中所提到的，在 1920-30 年期間正是安那其主義和安那其工團主義在意識形態和理論討論上活躍的辯論時期。「我們知道一個擁有各國不同組織

⁷² Stuart Christie, 2008,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FAI) 1927-1937*, p.18.

⁷³ Larry Gambone, "Syndicalism in Myth and Reality", p.4.

⁷⁴ 1920 年代開始法國 CGT 逐漸走向溫和路線，其中的革命分子因而面臨被工會開除的命運。這些被開除的會員在之後成立了 CGT-U，當時這個工會內部的主控權掌握在共產主義者身上。直到後期工會裡的安那其主義者與工會內部列寧路線再次分裂，而新組成 CGT-Social Revolutionary (CGT 社會革命派，本文簡稱 CGT-SR)。

的國際協會中，是不可能達到全然的一致性的」⁷⁵Rocker 在 1925 年 IWA 第二次大會上說。「另外一方面來看，我們也考慮到對於相同問題在同一個組織或不同組織中不同意見的出現，事實上可以幫助我們精神上的發展外，也能鼓勵我們建立獨立性的批判能力。我們看到 IWA 裡正在發生這樣的事。」⁷⁶

Malatesta 從俄國的經驗中認識到「讓組織成為更廣闊的社區社會，我們必須要更基進的轉換整個經濟生活 – 生產手段、交換和消費 – 這只能一步一步慢慢來」⁷⁷雖然 Malatesta 認為在革命的初期，安那其主義者可能會是少數，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不應該將這些思想強加在他人身上。Berneri 則是提出多元接受論的說法，他將自己的情況舉為例子「所有的安那其主義者都是無神論者，但我是一個不可知者…所有的安那其主義者都是共產主義者，但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所以，我認同在合作和個人勞動和交換下的自由競爭。」⁷⁸

而另外一群安那其主義者，在理解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的勝利時，得出了向布爾什維克策略和組織上學習的結論。「Platformist」⁷⁹使用了歷史階級鬥爭的知識原則立場，建立出一個如同政黨般的強大的安那其組織，在聯合會與工會運動中作為一個力量，同時也在革命中領導一個建設性的意識形態角色。本質上，Platformists 同意革命過程存在不同的階段性任務，並且也認同聯合委員會(soviet)在其中完成政府機制的位置。很多的安那其主義者⁸⁰批判他們在運動中的操作，已經背離了反權威的原則和自由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

⁷⁵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94.

⁷⁶ Ibid.

⁷⁷ Ibid., p.95.

⁷⁸ Ibid.

⁷⁹ Platformist 是從俄國安那其主義者在俄國革命的運動經驗中發展出來的一個自由共產主義支流。一群安那其流亡者在 1926 年集結起來出版 *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自由共產主義組織綱領)的安那其刊物，在文中他們反省並理解為什麼安那其運動不能在革命之前成功的建立起來。他們的分析指出主要問題來自於當時安那其運動的混亂(disorganisation)，因而提出一個將運動更加組織化的概念，並且將階級鬥爭視為最重要的目標。最後這個支流被人們稱之為 Platform(綱領派)。

⁸⁰ 包括 Vsevolod Volin and other Russian emigrants, E. Malatesta, 和 Sebastien Faure...

不同路線的爭論、討論和革命方法的辯論持續的發生在 IWA 內部，如同一場意識形態的辯論賽。其中的討論也是與近代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相連的，如福特-泰勒階段的生產理性化，如「資本主義理性化」的問題，也在 1928 年 IWA 第三次大會第一次被討論。他們提到包括從「舊私有資本主義」轉化到「近代集體資本主義」(信託和企業聯合)，從自由競爭到統一性的全球剝削，並理解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目的是要接續資本主義利益，剝削了工人對他們身體和精神健康的自決權，他們的角色被轉變成單純服務於產業下的奴隸。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中，失去身分，也失去工作，面臨著失業還有生活條件下降的直接威脅。在 IWA 大會上的討論，安那其工團主義憂心資本主義在經濟轉化上的問題，將建構出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主義終將隨著衰亡，因此，國際工人的團結行動在面臨這些威脅下，都必須更加急迫的組織、行動起來。

到了二戰前後，安那其工團主義在現實中，也開始面臨了不少的政治與經濟困境。另外上述 IWA 在國際團體的意識形態論戰，也似乎將一些本來意圖在國際的團結中尋求「慰藉」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者打入了無盡的深淵，阿根廷 FORA 受到 IWA 在 1938 年大會上「策略的自治權」⁸¹決議的影響，決定「暫時的與 IWA 的關係中斷」⁸²，直到工會下一屆會議才再重新討論與 IWA 之間的關係問題。而 CNT 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失利與對安那其原則上的背離，更深刻的影響了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的發展，而開始出現全球性的衰退。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家變得更加的強大，不僅在西歐建立了一個所謂的「民主統合主義」(Democratic Corporatism)的社會架構，將企業、政府和工會之間結合作⁸³。東歐更是陷落到共產黨的獨裁政權之中，即使出現意圖組織

⁸¹ 這指的是在 1938 年 IWA 受到 CNT 進入政府策略行動上的壓力，進而修改了章程中對於政治同盟上的規定。這個規定在 1951 年的 IWA 第七屆大會中又重新修改回來。

⁸² Service de press. AIT., 1940, no. 16, p. 176.

⁸³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191.

工人的團體出現，也很快的被迫解散，許多的行動領導者被捕入獄，罷工被一一擊破。而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也完全癱瘓了 IWA 的行動。

西班牙 CNT 在佛朗哥的獨裁之下仍秘密的在地下行動，建立非法工會，但他們幾乎逃不過嚴厲的鎮壓與白色清洗，最後主要的集中地被迫轉移到法國。南美洲的安那其工團情況也是相似的，一方面面對獨裁政權的壓迫，還有急速銳減的工會人數使得他們難以延續。M.Van der Linden 和 W. Thorpe 兩位歷史學家對於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的衰退做出了這樣的解釋：「對於工團主義做為一個群眾運動的消失最好的解釋，不只是一要考慮到無常的因素，包括國家壓迫，除此之外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改變」⁸⁴。雖然在 IWA 的討論不乏對資本主義轉型的認識，並分析可能的行動策略上的改變，但在實際上似乎無法真正的有足夠的力氣做出對應的行動。另外，M.Van der Linden 和 W. Thorpe 也提出安那其工團主義的三個可能，然而每個可能中都暗藏著災難性的結果。

「運動可能可以：1.持續並保持他們自己的原則 – 這個情況下他們很可能遭受被忽視命運； 2.全然的改變路線去使自己順應新的條件 – 這樣的話他們可能要放棄工團主義原則； 3.若是前兩個可能都被否定，他們只能面對 - 自己解散或是，加入其他的非工團主義工會之中。」⁸⁵而這三個可能，對於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都是不樂觀的。實際的選擇了第二條路的瑞典 SAC 工團主義工會，一方面表示將延續它們「解放工會」身分，但同樣的也接受在「近代化」的主導下，**修正**他們的安那其原則。德國移民工團主義者 Rüdiger 是影響這個選擇路線的主要人物，他在西班牙革命期間就宣布修正幾個傳統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原則，他提議放棄建立一個安那其共產社會的抗爭，接受「過渡期」等的概念，並主張放棄安那其「正統派」的堅持，以修正國家來加以取代消滅國家。他指出人們不應該只是等著「社會革命」的到來，而「應該在現存的國家和經濟架構中行動，來革

⁸⁴ Ibid., p. 193.

⁸⁵ Ibid., p. 195.

新代表制的(民主)系統」⁸⁶，並且也同意參與地方代表選舉，和加入政治同盟。安那其工團主義最初搖著「對抗國家介入勞資問題」的反對大旗，並反對參與一切由國家補助的社會合夥的機構。但現在「修正主義」派的 SAC 卻尋求在私人公司企業中的工人代表身分，並且意圖介入參與福利國家的系統制度，這是安那其工團主義在一百年前從未預想過的情形。

表 三、工團主義工會 1987 年會員人數 (總人數 82.000 人)⁸⁷

工會	國家	會員人數
CNT-AIT	西班牙	63,000
CNT-U	西班牙	11,000
SAC	瑞典	15,000
IWW	美國	500
COB	巴西	500
OVb	荷蘭	10,000
CNT-F	法國	500

到了 70-80 年代的經濟慘況再次的加深了安那其工團主義運動的消沉。許多工會在這個期間不斷的「自我修正」，或是「拋棄」安那其原則。已經微弱不振的工會在內部又面對了派系的分裂。但即使如此，安那其主義運動的一些概念包括「全體大會」、「自我管理(*autogestion*)」、「直接行動」等的深刻民主實踐仍然深刻的影響社會運動直到 21 世紀的今天。

⁸⁶ Ibid., p.196

⁸⁷ Larry Gambone, "Syndicalism in Myth and Reality", p.10.

但事實上，不管是 CNT 在西班牙內戰中對於加入政府「以行動式」的接受「過渡期」，或是 SAC 在近代所接受的「介入現有體系」的做法都是直接與安那其主義思想原則背離的。但是就如同 M. Van der Linden 和 W. Thorpe 所指出的三條路的選項一般，安那其工團主義在面對近代資本主義轉型的影響，不管是政治上的新「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體系，意圖去「納入」一切群眾組織與反抗，將其合法化；或是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聯絡網中，古典的安那其工團主義，事實上已經無法抵抗、面對這些問題，加上歐洲全面「清洗」了他們自有的傳統革命文化特質。安那其勢必面臨一個新的調整，但這個「調整」必然就安那其原則來修正嗎？而失去安那其原則的組織與行動，是否還是安那其主義呢？

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在進行式，並且在現今的現實情況下似乎並不存在一個尋求答案的意圖 — 安那其主義運動太過於支離破碎，分裂與內嵌到不同的運動中，極度的自治(Autonomy)的天性，使得問題更加棘手。另外，派系鬥爭仍在發生，導致我們還無法釐清所有的問題。目前的情況，我們散落在各自的組織團體，必須在自己的地方上先找到使力處，並找到屬於我們自己心中的答案 — 從行動中將其完成。

第三部 實踐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與不實踐的安那其主義

十三、西班牙 CNT

之一、工會的建立

西班牙的第一個安那其工會於 1870 年在馬德里成立，是第一國際西班牙區的聯盟分部(Worker's federation of Spanish Region)，之後這個組織消失，由安那其組織西班牙分部(Anarchist Organization of the Spanish Region)取代，最後在受到政府對安那其主義的打壓之下，組織分部被迫解散分裂成幾個不同的自治工人團體社群，在 1907 年受到安那其影響的巴塞隆納自治工人社會，建立了一個「工人團結」(Solidaridad Obrera)聯盟，它們的目標是以工人的組織來取代資本主義系統，轉換進入一個工人的社會系統，它們正是 CNT 的前身。⁸⁸

這個安那其主義的工人聯盟很快的在西班牙最大的工業區加特隆尼亞區散布開來。到了 1909 年他就已經發展到有足夠的能力引導癱瘓巴塞隆納的總罷工，他們以罷工反對西班牙對摩洛哥所發動的殖民戰爭，這個罷工最後導致了殘忍的軍隊鎮壓⁸⁹。受到法國 CGT 的影響，在 1910 年西班牙的工人在巴塞隆納舉辦全國工人大會，CNT 就在這個會議中建立了，追隨法國革命工團主義工會法國 CGT 的模型架構，伴隨著由工人團結聯盟所傳承下來的安那其主義思想，並且反對所有的政治和政黨政策。在 1911 年的初期共有 30,000 會員，並且擁有發動在馬德里、畢爾包、賽維維亞等各個城市罷工的能力。CNT 在各個城市中活躍的引導罷工行動，很快的就受到西班牙政府的還擊，在 1911-1914 年間 CNT 被迫打入

⁸⁸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anarchosyndicalism. <http://iwa-ait.org/archive/significance.html>

⁸⁹ 參考註 64。

地下活動。⁹⁰

之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 CNT

即使在戰爭中保持著中立的西班牙，仍在經濟層面被深刻得捲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在這個非常時刻 CNT 與社會主義工人工會西班牙工人總工會 *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後簡稱 UGT) 簽署了「革命同盟」⁹¹，並在 1917 年發起一個總罷工，工人的武裝抗爭隨罷工而起。CNT 在西班牙各處很快的發展起來，不只包括了北部的工業區，工會更深入南方的安達盧西農村小鎮中，工人農人自發的組織起地方會所，在其中政治與經濟、革命與安那其思想的資訊被傳送開來。人們聚在會所開會討論工作、策動行動。

1910 年代的末期，CNT 在內部與外部都出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首先是 1918 年在巴塞隆納召開的安那其團體大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Anarchist Groups)中，近全數的安那其主義者決議加入 CNT 之中，幫助工會內部政治的發展。這一反過去西班牙安那其主義者刻意的選擇不加入 CNT，或是加入 CNT 但盡量的避免責任位置的情況。同年，在加泰隆尼亞所舉辦的區域大會⁹²中，CNT 也再次的加深其安那其工團主義的路線，「…大會中出席了大概 74,000 個工人代表(大約加泰隆尼亞 30%的勞動力)，他們決定了要以產業工會來取代過去的工匠工會…以產業的方式組織，他們的新計畫就是建立一個新社會的基底…CNT 委員會辦公室不再只是做為工會辦公之處，它們成為了社區的社會、文化中心，並組成 Ferrer⁹³模式的自由學校來教導如國際語、素食主義、草藥學、生育控制和女性解放等的題目」⁹⁴。另外，大會考慮到會費可能產生的官僚系統，因而決議廢除。

⁹⁰ "Prefigurando futuro": 75° aniversario de la CNT. 1910-1995, (Madrid, 1985), pp. 4-8.

⁹¹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45.

⁹² 區域大會與全國大會是不同範圍的聯盟會議。區域會議是獨立在全國聯盟之外的。

⁹³ Francesc Ferrer i Guàrdia,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區的安那其主義者、思想家，推行一套解放教育學。

⁹⁴ Stuart Christie, 2008,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FAI)*

在年底之前，CNT 擁有 345,000 個會員，這個快速的發展又引起了政府一連串的打壓，工會再次走入地下。

1919 年 1 月一個由加拿大人掌控的電力公司在無預警之下縮減了一群工人的薪資，8 個工人為此而群起抗議，最後馬上受到資方解雇，CNT 因而號召其會員在 2 月 4 日展開罷工行動，「La Canadiense」罷工因而展開，這場罷工在巴塞隆納持續了 44 天，整個巴塞隆納電力全面癱瘓，這對加泰隆尼亞工業區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最終，行動迫使西班牙政府接受了第一個限制工時的法案(Decreto de la jornada de ocho horas de trabajo 八小時工時法)⁹⁵。接續在之後發生的罷工持續為 CNT 帶來了極大的成功。面對 CNT 快速的成長與基進的罷工行動，西班牙政府與資本家們同樣的祭出對應的方針，包括建立黃色工會與其對抗，其中最具有影響的是由資方支助組成的「槍手隊(Pistoleros)」恐怖組織，他們的工作就是負責殺害工人運動的組織與行動者。而同時 CNT 的領導行動者也面對著持續的逮捕行動，1923 年知名的工人行動者 Salvador Seguí⁹⁶和 F.Comas⁹⁷被殺害，安那其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以罷工和武裝行動回應反革命的恐怖行動。之後獨裁者 Primo de Rivera 上台，獨立工會運動被全面禁止。

之三、CNT 走向安那其工團主義

1919 年在馬德里的大會上 CNT 第一次官方式的提出它們「安那其主義」的傾向，「消滅國家和建立一個解放(安那其)共產主義」⁹⁸，並且他們宣布追尋第一國際巴枯寧時代的傳統。然而，在這期間整個歐洲正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CNT 內部也出現了一些搖擺不定的政治傾向，「俄國革命給予我們極深刻的印

1927-1937, p.11.

⁹⁵ Stuart Christie, 2008,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FAI)*

1927-1937, pp.11-2.

⁹⁶ Salvador Seguí, 加泰隆尼亞安那其主義者。

⁹⁷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54.

⁹⁸ Ibid.

象，我們在其中看到了那個我們所夢想的革命。」⁹⁹觀察者 Buenacasa 在提到 CNT 會員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態度時說到，而初期 CNT 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也存在著微妙的關係。當時，俄國共產主義者急切的希望讓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加入他們的行列，極力邀請 CNT 加入紅色國際工會(profintern)，與其組成同盟，另外一方面俄國政權又在 1921 年的 3 月鎮壓擁有安那其思想的 Kronstadt 船員起義行動，造成兩方關係的緊張。在 1921 年的 4 月間，兩個 Lérida 地方工會的會員 Andrés Nin 和 Joaquín Maurint 出現在莫斯科，表示自己代表 CNT 身分並要求加入共產國際，然而這個行動很快的在 8 月一個全體大會中被否決。最後 Andrés Nin 和 Joaquín Maurint 離開了 CNT，並在稍後成立了托洛斯基派團體馬克斯團結工人黨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¹⁰⁰

1922 年 6 月在 CNT Zaragoza 的全體大會上，工會一方面確定了退出共產國際的決議，一方面派出代表出席當時正在籌辦的國際工團主義會議。這個會議延伸出現了之後的國際工人協會(IWA)，這個名稱是由義大利安那其主義者 Alibrando Giovanetti 提議，作為一個象徵性延續歷史上第一國際的名稱。IWA 宣布了他們的原則(革命工團主義原則)，他精要的重複了 1922 年六月柏林宣言的基本立場：反對政治黨派、議會、軍國主義、國家主義、集權主義。他積極的計畫包括了經濟組織全然的自治，包括體力或是智力勞動，直接行動還有總罷工是最高的表現，作為「社會革命的序曲」¹⁰¹。革命的目標設定出一個新的經濟、社會生活，消除所有的國家架構，建立一個自由共產主義體系，它們明白的拒絕了無產階級專政，或是布爾什維克政府。

1931 年 Primo de Rivera 與君主制一起在西班牙結束，共和政府上台。而 CNT 也再次的回到工人運動的社會舞台上。「1931 年他們召開第一個合法的工人聯盟大會，超過五十萬人會員被代表出席，一年之後會員人數更超過百萬。在共和國

⁹⁹ 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167.

¹⁰⁰ Ibid.

¹⁰¹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83.

的前 15 個月，共有 30 個總罷工和 3,600 個地方罷工，大部分都是由 CNT 組織的。農人由安那其工團主義者組織，從地主手中占領土地，要求廣泛的社會主義化。」¹⁰²在 1932-33 年一個地方革命起義的熱潮四起席捲全國，統治者以暴力鎮壓了運動。數以千計的人們被殺和被逮捕，但安那其工團主義在西班牙的影響力，並沒有被中斷，它們持續的深入西班牙的心臟。

1936 年 5 月在 Zaragoza 全國大會建立了一份具體社會革命的安那其計畫 - 他們以「自由共產」做為原則。「他強調了革命是一個精神現象上的問題，必且對權威表示極度的厭惡，這將他們導向了一個嚴謹的安那其路線」¹⁰³，會議的內容從性權談到一般的組織問題中，CNT 在這次的大會中真正的釐清，並且確定了組織的方向，「…(廢除)私有財產、國家、權威的原則，還有最終那個將人們區隔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在經濟上「生產者，個人就是一個單元，他是所有社會、經濟和道德的一切基石，…」¹⁰⁴。各盡所能的，在經濟許可的架構下各取所需，並且不能存在著任何的「過渡時期」，即刻的在社會革命之後實踐。在未來自由社會的基礎必須要遵照著兩個組織的方式：土地的(自由社群和聯盟)工業的(聯合會做為生產和社群經濟機構的協會)，從下而上計畫。錢幣廢除，以生產者和消費者卡片(card)來代替 - 這個卡片只說明擁有者真正的在工作¹⁰⁵。「一旦革命的暴力階段結束，私有財、國家、和獨裁原則還有階級都將被廢除... 財富會被社會主義化，自由生產者的組織將會接收生產和消費的管理。在每一個地方上，都會有 Free Commune(自由公社)建立出來，他們將

¹⁰² Prefigurando futuro: 75º aniversario de la CNT. 1910-1985, pp. 10-18.

¹⁰³ Murray Bookchin, 1998,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269.

¹⁰⁴ Ibid.

¹⁰⁵ 這個卡片的實際使用，可以在上海平明書店所編列的西班牙問題小叢書的《一個國際志願兵的日記》，A.米寧，中看到 p.416，「…我便走到一個小孩子的身邊，請他把他的簿子借給我看一下。封面上寫著一個人家的姓名，以及家裡大人和小孩的數目。裡面有許多頁已經寫滿了字，還蓋上管理的圖記。每天領取的物品除了那些可以自由取用的以外，全都詳細地記錄在上面。我把那小冊還給小孩，他頭上領著籃子，滿滿地盛著一籃的東西，這樣安閒的去了。」

開始一個新的社會機構。生產者在自己工業和職業的工會裡團結起來，他們可以自由決策與組織在工作場所的形式。」¹⁰⁶

之四、西班牙革命

1936 年 7 月法西斯右派軍人展開軍事攻擊，西班牙內戰展開。突發的戰爭使得第二共和幾乎無法有效的抵抗，但是在革命後新上任的 José Giral 馬上宣布將武器交給人民做自我武裝，而安那其主義者奮勇的抵抗也避免了西班牙最重要工業大城巴塞隆納的陷落，這個事件最後甚至演變為一場工人起義，CNT 的武裝會員引導總罷工控制了整個巴塞隆納。在軍隊叛變的鎮壓之後，工人們積極的自發策動社會革命的發生：他們佔領了企業並行使工人自我管理；他們接收了供應、運輸和社會服務的控制權。CNT 更在各處設立社區食物中心，人們可以在那裡獲得免費的餐點。

社會革命快速的散播在受到安那其啟發的城市中，工人接收生產、分配的管理，將一個新的社會解放實踐到他們日常生活之中。人們甚至於吃驚巴塞隆納等城市在「失控」之後的「井然有序」，被工人接收的部門與企業很快的恢復營運，社會生活不僅一如往常，甚至變得更加的活躍。CNT 紡織工人會員 Andre Capdevilla 說到「…受到安那其工團主義革命宣傳的影響很深。經過幾十年間，安那其的概念在工人之間生根，他們認為只要機會一出現，馬上就要實行(社會)革命。所以他們一見到機會來臨之時馬上行動」¹⁰⁷。

¹⁰⁶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117.

¹⁰⁷ Ibid., p.121.

不只是在巴塞隆納或是加泰隆尼亞區，南部的安達盧西亞與瓦連西亞，安那其的農人也在其村庄內活動，他們將土地公有化，自行在地方的會議上做工作與食物的分配。「人們被派到那些落後的田野中」Gaston Leval 目擊了這一切的發生「我們的同志加入田野的工作，使得他們能有更進一步技術思想上的溝通，他們教會了小孩子讀書。結果安那其主義(anarchism)滲入到最落後的社會中」¹⁰⁸。在 Jerome R. Mintz 的《舊厝的安那其主義者》中，同樣的描述了安達盧西亞卡蒂斯(Cadiz)區域的舊厝(Casas Viejas)安那其化的情況，這個在 30 年代只是幾戶住家的小村裡，他們的安那其市民中心(Centro)總是充滿著各種不同的思想讀物，而任何有想法的人總是願意在那裡與他人交換或是為不識字的人們解釋安那其主義的思想¹⁰⁹。

共和政府在軍事叛變中大大的失去了它們控制西班牙的權力。許多的共和政府辦事處甚至遭到移除或是被中立化。Abel Paz 在談到巴塞隆納的情況時提到「...權力躺在街上，這是由武裝人民具體掙出來的」¹¹⁰。但是，在這個現實的情況下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 CNT 也面臨了一個最大的挑戰，他們手中握有大權 - 雖然人民是自主的，但是他們同樣的受到工會深刻的影響；另外叛變尚未結束，而國外軍團更是肆無忌憚的進入到西班牙的領土中，威脅著這個剛起頭的解放。

之五、自我的叛變 - 反法西斯聯合陣線

CNT 在革命之後出現很多無法理解的行動，他們在 1936 年確定出其革命的方向，但在面對革命的當下，這個方向卻又無法堅持下去；反觀這時期的西班牙

¹⁰⁸ Gaston Leval, 1975,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Vernon Richards, p. 56.

¹⁰⁹ Jerome R. Mintz, 2004,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¹¹⁰ Abel Paz, 2004,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工人，他們反而到了這個時刻，對於社會革命的信念變的更加深刻，這可以從許多地方上工人、農人與居民自行沒收私有企業，實踐社會共產的行動上看到。做為思想前線的CNT卻在這個時候躊躇著，不知是否該直接宣布共產主義的實現。這個問題的主要癥結可能還是落在於工會對於「群眾」在革命中身分的界定，人們擔心群眾的自發性是否會在這樣的革命情境中被抽離，而使得革命不是一個「眾望所歸」之事，這類的爭論在工會不斷被提起，卻沒有任何的答案。

這些「不確定」也開始浮現在在工會與外部結盟的問題上面，與社會民主黨控制的 UGT 的結盟是否背叛了安那其的政治獨立原則？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CNT 顯得毫無準備，因而浪費了不少重要關鍵的時間。期間，CNT 這個做為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工會也再次面對了自己的身分問題。1931-32 年「三十人派」¹¹¹的事件導致了 CNT 的內部分裂，三十人派在當時被當作改革派的叛變者而開除，在 1936 年又再次加入 CNT。除了這個三十人派之外，工會聯合會中還存在著大批的「純」工團主義者，和那些僅是傾向「實用性」的會員。確切的說法，這是來自於西班牙安那其工團主義組織內部意識形態的自我矛盾，他們一方面將安那其的目標和社會思想，與革命工團主義工會原則結合，而開放成一個「讓所有工人」都可以加入的組織，在面對會員思想上的差異問題又無力解決¹¹²。

1936 年 7 月 Generalitat 的領導人 Companys 和加泰隆尼亞的 CNT 聯絡，表示要見面討論在法西斯軍隊叛變受到鎮壓之後的情況，而實際上暗示著結盟的意圖。這次會面的提議案將 CNT 工會陷入了一個西班牙革命中重要的決議之上。會面之前，CNT 在內部的會議對於這個提案討論，兩個主要的意見在會議中出現，Garcias Oliver 做為 Nosotros¹¹³代表反對這個提案，並要求立即宣布自由共產

¹¹¹ CNT 的內部分為工會派(unionist)和革命派(revolutionary)，三十人派正是工會派的主要人物集結起來共同起草來壓制孤立革命主義派(多半為 FAI 的成員)的行動。

¹¹² Stuart Christie, 2008,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FAI) 1927-1937*, pp.101-122.

¹¹³ 原名 Los Solidarios，一支西班牙安那其武裝抗爭團體，做為對資本家與政府打壓工人運動與工會的回應，最後在 30 年代加入 FAI 之中改名為 Nosotros(我們)。

主義；另外的 Abad de Santillan 則是傾向與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結盟，爭執一度僵持不下，直到最終達到一個暫時的同意：送出一個武裝代表與 Companys 會面，主要的目的是去做訊息的交換。在與 CNT、FAI 會議中，Companys 竭力的說服 CNT 加入反法西斯陣線中，他向他們表示戰勝法西斯的戰爭還沒有結束，並且邀請 CNT 一同加入「國民軍委員會 committee of militias」來共同對付法西斯。在 1936 年 7 月 21 日的 CNT 加泰隆尼亞區域大會上，反對的聲音來自於 Baja Llobregat，與代表 Nosotros 的 Garcias Oliver，但最終還是在幾乎一面倒的投票情況下，而選擇「反法西斯合作(co-operation)」的工會方針。之後當安那其主義者再次回想當時的情況時，認為這樣「不合組織路線」的錯誤選擇來自於時勢的壓迫而無法有效的估算行動的結果¹¹⁴。研究 CNT 的安那其主義歷史學家 Abel Paz 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我們相信權力的問題起因於決策時間太急促，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導致了『整個革命的重點』受到忽視，如 CNT 的報導所說的。若是接受了 Garcia Oliver 的提案，革命的問題就無疑可以在草根的階級受到釐清。」

115

事實上，做出這個決策的是加泰隆尼亞的區域工會，似乎不能真的決定了 CNT 的絕對路線。但是，其他城市的 CNT 仍是猶豫不決，無法在這個情勢中表現出魄力的行動。「**第一個錯誤**」，Paz 寫道「發生在 7 月 19 和 20 號，當一群行動者自己幫他們的會員決策時。在這個時刻，一個分水嶺出現了，劃過了基層跟高層的水平：基層的人們要求革命的擴散，上層階級意圖控制和限制它...」

¹¹⁶CNT 又再次回到傳統工會的束縛中無法自拔，一個**代表**工人的「工會」，而不是「工人的工會」。

在這個起點開始，CNT 就在加入反法西斯的聯盟上一路丟棄自己的原則，

¹¹⁴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p.126-7.

¹¹⁵ Abel Paz, 2004,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¹¹⁶ Ibid.

包括 1936 年八月，CNT 同意由 Generalitat 和反法西斯國民軍中心委員會(CCMA) 執行部分徵兵，這是和他們的基礎原則所相背道而馳得。CNT 和 FAI¹¹⁷的領導不斷的和反法西斯政黨及運動妥協，並且對他們讓步，以「情勢發展」¹¹⁸還有內戰勝利的必要性做為藉口。而另外一方面，CNT 的妥協並無法停止群眾對於自由共產主義實踐的追求，人們仍然接續的沒收公司與展開自行管理，積極有效的做出社會分配的工作。然而，CNT 政治上的妥協很快的轉變成草根主動權的絆腳石。在自由共產主義還沒有被宣布實施，廢除金錢，還有依需求來分配的概念就會被視為非法行動而制止。

馬德里和加泰隆尼亞的政府也展開對安那其工團主義三方面的壓迫：阻止供應民軍武器和火藥，並且限制了自發的工業和農業經濟集體化的範圍和影響，並企圖強迫以一般正規軍取代民軍。跟著，CNT 考慮到「革命同盟」的需求，因而決策與 UGT 一起創造一個軍事政治領導的全國防禦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f Defense¹¹⁹。在 Paz 的書中談到基進的少數人們在這個時候開始屈服，他們將「解決這個死路唯一的方法與『行動者的責任感』分裂，除去了他們自己組織的同意，將革命的問題帶到街頭上。但沒有一個行動者覺得他們有能力可以做到...」

120。

之六、CNT 加入政府

戰爭成敗最主要的問題在 1936 年開始浮現出來，就是經濟上的資源，馬德里的政府很快的掌握住了整個對抗勢力的經濟命脈，即使整個加泰隆尼亞都控制在 CNT 的手中，仍要面對沒有原物料甚至最基本的食物問題。「…(馬德里政府)

¹¹⁷ 1927 年成立於瓦連西亞，為了保持住 CNT 的安那其路線的純粹安那其組織，也是工會中重要的「政治」主導。

¹¹⁸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134.

¹¹⁹ Ibid., p.139.

¹²⁰ Abel Paz, 2004,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90.

不願給予任何金融或是經濟上的資源，他們不對加泰隆尼亞裡工人的工作有任何認同感…雖然政府已經換人了，但我們面臨到的問題仍然一樣…」¹²¹。

1936 年 9 月份的 CNT 加泰隆尼亞大會在 26 日結束，隔日新聞公布 CNT 將加入加泰隆尼亞區域「政府」的消息，CNT 反對這個「政府」的說法，他們指出他們加入的是一個「區域防衛委員會(Regional Defence Council)」。然而，這個問題未曾在區域大會中受到討論，到底是誰做了這樣的決策？無人願意回答。但稍早 20 日的全國會議上曾經出現了對於「合作」態度上的軟化。而這個「加入政府的行動」一方面為中央政府解除了 CNT 在加泰隆尼亞區與馬德里政府對立的「雙頭權力」，另外一方面也暗示了 11 月份 CNT 再次進入中央政府的行動。這個委員會的現實，就如 Peirats 所說的，只是換了個名稱的政府機構¹²²。然而，當時 CNT 仍堅持在文件中，將區域防衛委員會中的(政府)部門(ministry)一致的修改為(行政)部門(department)。

面對這樣的改變，Santillan 曾提出這樣的「辯解」：「若這只是個革命的問題，政府的存在就不僅會讓人無法接受，也會是個必須要被摧毀的阻礙物；但我們面對的是一場殘酷的戰爭，…並且(我們的經濟命脈也)與國際市場綁在一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認識到，我們還沒有取代舊政府機構的手段(能力)。」¹²³

到了 1936 年 11 月 4 日 CNT 和 FAI 的會員更驚訝的在報紙上獲得 Largo Caballero 政府新加入的四個來自於他們組織的成員：司法部長 Garcia Oliver，工業部長 J. Peiro，商業部長 Lopez Sanchez，還有公共健康部長 Fedrica Montseny。CNT 的領導向他們的成員保證這些部長們，將不會以自己的觀點做事，而會依照他們的組織，「團結的辛勞群眾多數的集體意願，這是在之前的全體大會上計畫出來的。」在「CNT 加入中央政府」的文章中更宣告，「是我們國家的政治歷

¹²¹ Vernon Richards, 1995,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62.

¹²² Ibid., pp.68-9.

¹²³ Ibid., p.64.

史中最重要的事件。」¹²⁴現在「國家的作用，和工人組織一致，將會嚴謹的限制去管理經濟和國家的社會生活方向。而政府將只會執行適當引導戰爭的工作，並依造共同計畫來協調革命工作。」¹²⁵在 CNT 全國委員會的宣言中，解釋他們同意加入政府是因為考量「我們軍隊前線脆弱的情況。」聯盟是為了「伊比利的無產革命的勝利而努力，」「從未拋棄也永遠不會拋棄他們的主義，」¹²⁶口口聲聲糖塞了許多的理由來合法化他們的行為，但是他們在這個行動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只在於他們背離了安那其的思想原則，而他們也背離了工人。在 CNT 加入政府當天，Durruti 這個一直在前線打仗的安那其主義者，憤怒的說道「讓他們(為 CNT 和 FAI 負責的人們)害怕的顫抖，以格外嚴厲的方式宣稱這些人尚未以他們可憐的反法西斯主義藉口成功的扼殺革命...」¹²⁷。

之七、失敗

CNT 的代表在政府裡待到 1937 年 5 月。「通過進入權力」的結果對於安那其工團主義是悲慘的¹²⁸。加入政府的行動，不但沒有解決 CNT 在軍事¹²⁹與財務上的問題，並且對整個內部組織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危機，「參與政府」的行動是與工會思想原則根本上的破裂。

1937 年 5 月，一個警察攻擊(工人控制)巴塞隆納電信局(Telephone exchange)，的內部戰爭，使得巴塞隆納安那其工團主義工人群眾的起義爆發：安那其工團主義群眾成功的佔領了城市的大部分，一個真正社會革命的可能出現了。然而 CNT 和 FAI 的領導們，因為害怕「反法西斯團結」的失敗，便勸導工人放棄他們所築起的「自由共產主義」路障。之後 Cabellero 政府失勢，大量的農業公社被移

¹²⁴ Ibid., p.69.

¹²⁵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155.

¹²⁶ Ibid.

¹²⁷ Ibid.

¹²⁸ Ibid., p.156.

¹²⁹ Garcia Oliver 的司法改革雖然一部分的為社會帶來了一些更公平的法令，同樣的之後也被用來對付他自己的安那其主義盟友(如，私藏武器和爆裂物判超過 20 年的牢獄判決)。

除。數以千計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者以「無紀律」¹³⁰之名遭受逮捕。期間，CNT 和 FAI 的領導者持續宣稱「首先，先打贏對抗法西斯的戰爭」的重要性。到了 1938 年 4 月 CNT 又一次參與了政府位置 - 教育部和公共健康部門。在資本共和者和法西斯的對抗賽中，所有為了打贏內戰去加以「延後」或是「約束」社會革命手段，最後只是使得革命失敗，更使得運動失去了正當性。Vadim Damier 寫到，只有那些在 1936 年 7 月充滿著希望的西班牙工人才可能打敗佛朗哥主義，就像 Durruti 說的，在保衛他們的革命戰鬥時，「一個新的世界在我們的心中展開」¹³¹。「我們知道」，D. Abad de Santillan 在革命失敗之後說到，「若是戰爭沒有打勝，我們的路線是不可能贏的。我們犧牲了革命，而沒有了解到，這個犧牲伴隨著必要對戰爭真正目的的犧牲。」¹³²

十四、CNT 現在

Jeff Stein 這個屬於 IWW 工會的會員翻譯了由西班牙塞爾維亞 CNT 工會所出版的《安那其工團主義基礎》小冊。在翻譯者的導言中 Jeff 指出他翻譯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給予 IWW 一個借鏡學習的機會，在當時 IWW 面對了工會在經濟短缺的危機，工會即刻需要重新反省這個工會架構上的問題。

IWW 不同於 CNT 並不是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架構的工會組織，他們在內部存在著一個票選出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而不是 CNT 的聯盟制(Federalism)，清楚的把權力分散開到地方上，聯盟中的地方工會擁有各自的自治權(autonomy)，並且組成了 CNT 最基礎的決策單位。很自然的 Jeff 面對 IWW 的組織架構問題時，很容易就投射到 CNT 上面找答案，一來兩方都是深受安那其主義思想影響的工會，另外他們也同樣的都是存在這個現代資本主義下小而強

¹³⁰ *Le Combat syndicaliste*, 19.12.1937, no. 235.

¹³¹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160.

¹³² Ibid.

悍的工會。¹³³

就目前的理解 CNT 在西班牙的的發展的確看似穩定，許多的工會在地方上擁有從西班牙政府「歸還」的歷史性工會建築物¹³⁴，而地方上的工會也似乎持續在不同的爭議案上行動，我們常常可以在工會報紙上讀到成功的爭議案，許多安那其思想網路論壇上更是絡繹不絕的有 CNT 會員積極參與發言與向人們報導工會的最新行動消息。但，如同其他工會內部一般，我們一直以來面臨著不同派系的鬥爭所苦除了 80 年代與 CGT 殘酷的分裂外，CGT 與 CNT 在之後也面臨幾次分裂，比較有名的包括一支類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 Solidaridad Obrera¹³⁵（團結工人）。而在今日工會內仍存在著兩個主要的派系鬥爭，包括被稱為「泛安那其主義」的傳統派，和「泛工團主義」異教派，即使這個區分法並不是全然正確的。

其實，我們不只該向外部的人們再次的提醒，1930 年代的 CNT 與 1979 年或 2011 年今天工會的長相都是不一樣的，我們自己也必須承認這樣的現實。只是在這個紅黑大旗之下不管是外部的人們或是身在組織內的我們都很難真的探頭進入了解「自己」工會，與 CNT 的面貌。如同 Jeff Stein 所說的，不管甚麼樣的架構他都不會是最完美的保證，這一切必須要靠著所有會員的警覺心而不去濫用我們架構的優勢與劣勢。

之一、CNT 現在與過去

我必須再次的提醒，CNT 是成立 1910 年的工會，開始於 20 世紀初全球工

¹³³ CNT-AIT Sevilla, Translated by Jeff Stein, *Basic Anarcho-Syndicalism*, p.23.

¹³⁴ 在西班牙內戰之前，CNT 工會擁有許多工會大樓等建築，在內戰後全都受到佛朗哥政府的沒收，部分被賣出，在佛朗哥死後的 1975-77 年「過渡期」部分建築已歸還工會，已賣出的建築，再交由西班牙政府設置專款歸還。

¹³⁵ 在 1990 年從 CGT 分裂出來的工會，CGT 也同樣是從 CNT 內部分裂出來的工會。在某些工會規定上仍然堅持安那其原則。

人運動發展高峰的歷史背景上，當時西班牙與現在的政治經濟背景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同時在其成立之後急切投入革命之中。CNT 受到當時的安那其主義思想深刻啟發，它的長相與行動都是在反映了當時的工人運動情況。而且更有趣的是，就算經過一百年，十次全國大會之後的 CNT 在許多的地方仍然都是堅持著過去 70 年前所定出來的規則，包括最重要的「自由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

當人們談到它與其它工會在現在最大的差異，總是指出他們基進的目標「期待一個社會的改變，以社會革命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社會的改變，除去了這個最終的目標，安那其工團主義就不存在」¹³⁶。工會延續著安那其工團主義的組織方式包括「直接行動」，「直接民主」去鼓勵工人去深刻的了解統治階級的問題與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與控制，最終由工人來發起運動以推翻這一切。

雖然最終的目標不變，但在現在他們對於「革命的過程」似乎出現了一些改變。就《安那其工團主義基礎》這本由塞爾維亞 CNT 出本的小冊中在最後一部分提到「社會的改變」(transform society)時，他說「這必然是要有一個革命，以一個突然的改變將威權架構廢除。這就是一個過程的結束與一個新的開始。…革命會發生在人們集體得起義，當人們認識到道德和哲學還有經濟基礎都已毀壞…」¹³⁷。在對於革命的描述失去了過去古典安那其工團所提的「革命總罷工」，而轉向是一個「以準備」的行動來等待革命來到的「模糊」說法。這個轉變不知道是否是面對 21 世紀的工會的發展現實影響，而因而將革命的發動再次寄託到「群眾的自發性」。這樣的革命概念，似乎是混合了一些馬拉特斯拉的起義主義概念。不過，不管這只是來自《安那其工團主義基礎》或是一些工會會員說法上的差異，這都不能做為 CNT 的官方說法。然而，我們還是要注意到這些說法對於組織內部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 CNT 會員們對「革命」想像上的差異。

¹³⁶ Federación Local CNT-AIT Sevilla, *Anarchosindicalismo básico*, p.12

¹³⁷ CNT-AIT Sevilla, translated by Jeff Stein, *Basic Anarcho-Syndicalism*, p.18

之二、面對社會的改變

面對資本主義的轉型，工人運動的挑戰是與過去不相同的。包括工作內容以機械化與破碎的分工使得工人失去過去在工作中可能擁有的技術與經驗等專業技能，與不可取代性；同時工人文化的衰敗，使得工人也喪失了做為工人階級的尊嚴。

另外，過去那些福特形式的大型工廠已經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工作外派，就業市場充斥著工作契約彈性化與各種不同形式的短期契約，也或「地下經濟」等更泛濫的加深了工人在勞資對立上談判的困難。而工人也面臨被分為短期、外派、臨時或移民工等的身分，許多年輕的工人或是長期失業等處於劣勢的工人也被迫接受 3K「骯髒」、「危險」，和「辛苦」的工作，並且常常面對一家公司換過一家公司的情況。同時，他們面對不同的工作情況被分為臨時工、移民工等接受不利的工作條件外，也受到資方策略性的操作使得工人常常被迫為了保住工作而相互對立，當爭議發生時也總是受到資方的威脅與騷擾。

在西班牙對於工人運動近年最重的事件之一，就是 1977 年的「Moncloa Pact」¹³⁸，這是一個由資方所發明的「公司委員會」工會選舉法案，作為管理在 1976 年之後重生的勞工運動，當時西班牙受到了幾個大罷工和群眾運動抗議的影響，資方與國家為了因應這個情況而將工會制度化的手段。

西班牙工會，除了 CNT 以外全都簽署了這項「公司委員會」的協商系統。在公司委員會被選出來之後，他們就成了資方唯一需要對話的勞方團體，他們任職年限一般是 3-4 年，而那些全國得票率超過 10% 的工會，便可以出席與政府的協商。之後政府將以投票結果來評估給予這些工會「經濟補助」，並且給予這些

¹³⁸ Beltrán Roca Martínez, Translated by Sharif Gemie, "Anarchism, anthropology and Andalusia - An Analysis of the CNT and the 'New Capitalism'"

工會人員專職的工作，在某些企業裡，委員會還可以得到企業的補助，並且入席董事會。CNT 因為從一開始就拒絕了工會選舉，因而也失去了這一切「工會權利」。¹³⁹

之三、分裂

不接受工會選舉的 CNT 不只因而被排除在整個主流的「工會」運動之外，同時也讓他們面臨最大的內部危機。70's 年代尾巴 CNT 內部的一群會員建議工會必須就現實做調整，提議讓工會加入工會選舉之中，他們表示唯有接受這個規定，工會才不會持續的抽離在「工人運動」之外，去堅持「安那其工團主義」的純粹性。這些人開始在 CNT 內部施加壓力要求改變。第五屆大會就發生在這個情況之下，人們在會議中談到工會選舉、將安那其思想從工會原則移除，還有退出 IWA 等不同議題。許多 CNT 工會的年長會員，在之後談到這個分裂的描述中常常提到對於「滲入者」的這套說法，據某些工會的人說，當那些「意圖在體制內打擊體制」派的 CNT 會員們召開第五屆大會的時候，大會當天的門口由警方派人戒備管理，真正的「安那其主義者」只能被檔在門外不得其門而入，便而成立了另外一個雙行運作的 CNT。直到在 80 年代，這樁分裂事件延燒到西班牙法庭，由 IWA 在法庭上出席作證，「不參加體制內選舉」的工會，才是「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這些人被迫改名為 CGT。雖然如此，直到現在他們仍自稱為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每年為著不同的 CNT 活動而大肆慶祝。

面對於這個「體制內活動」，CNT 的會員認為加入工會選舉的動作，不單只是與其原則背離，同時也是「將自己合併到現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之中，去控制工人抗爭。」其他參與工會選舉的人所做的，就是在爭取工人的代表權，把自己放入這個「代表民主」制裡。

¹³⁹ Ibid.

在與 CGT 分裂之後，CNT 還遭遇過幾次分裂，雖然不全然是與工會選舉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他們其他工會在分裂之後都加入了工會選舉之中，將工會選舉也納入了其「行動策略」之一。

之四、修正的必要性

CNT 聖馬利亞港口工會的 Roca 在他的《Anarchism, Anthropology and Andalusia》中討論了關於 CNT 在新資本主義中的研究提到，他認為工會急需要一個新的「修正」，他引用 Panebianco(1990)的研究指出「所有的組織都必須要修正進入他們所處的環境中找尋平衡(seek a balance)，並且掌握這一切：若是不這麼作的話，他們就永遠無法達到他們的目標。」¹⁴⁰而他指出，CNT 的方法卻是相反的，它們意圖去革命化(revolutionize it)環境，將它的續存仰賴環境的修正。對於他的說法我感到質疑，一方面 CNT 意識到他們在這個新資本主義環境下的問題，雖然在口頭上承認了改變的重要性，他們在實際的「追尋改變」的行動上還是很難見到的。所以這個「意圖去革命化環境」的說法在沒有提出任何例證的情況下，似乎站不住腳。

在面對「修正」的這個題目，我可以提出在我所參與的第十屆全國大會中所討論的主要觀察來加以舉證，2010 年的十屆大會中，主要的討論題目多半還是落工會章程的調整上面，會議上很少出現將整個 CNT 視為一體「共同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討論，多半只是工會在實際的日常操作上的問題與章程修正提案，而且多半是爭對兩個對立的「派系」鬥爭下的拉扯。大會中並沒有意圖討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也或工會在這個危機下的力量與可能。

工會在「革命化」環境的說法似乎還給了工會太多的積極性，不如說，在現況應該是他們困惑，並且無法認識到他們的修正可以是甚麼，這個矛盾反映在內

¹⁴⁰ Ibid.

部派系的拉扯上，他們更傾向把精力放在談論另外一個工會的叛變或守舊，而不是去思考他們自我的守舊或是與原則矛盾，他們積極的採取極端的手段反對對方的行動¹⁴¹。另外，將問題僅僅放至在「整體」的修正上似乎是不足夠的。CNT 並須要先做為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認識他們「並不是處於一個正在(或將要)革命的時代」中可以怎麼做，讓他們可以在一個即使知道革命道路長遠的情況下，我們能怎麼意識到我們是真確的往著那個方向前進，這可以使工會在修正的過程中維持革命性，並且累積去修正的問題的能力。修正與原則的牴觸不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

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一點，當我們在革命之中，我們很容易成為革命分子，或是叛變者，但當我們與革命的距離拉遠，這個判定就變得很模糊，這個模糊點會讓我們浪費很多時間去懷疑，或是針對「所謂的不革命」加以撻伐以表現自己「革命」的純粹。而最終只能加深內部的分裂，破壞原有的團結。

之五、派系

在 CNT 之中的派系問題是一個存在工會政治核心本質的一個矛盾點，CNT 所選擇的安那其工團主義的是由安那其主義與革命工團主義的概念結合而成：將安那其作為運動最重要的目標，完成「安那其共產主義」，「工會」作為組織策略與革命手段；另外一方面，革命工團主義將工會作為革命運動最重要的核心，從準備革命、發起革命到革命之後的社會都是圍繞著工會發展的。兩個思想體系對於工會在政治角色上的認識本質上的差異，使得 CNT 不斷在這樣的矛盾中互相衝突，工團主義將運動核心重點放置在工會上，積極的發展工會；另外一方面安那其主義派更重於工會中政治意識的發展而不是工會的發展本身，這樣的思想直接反應在行動的選擇上，對立與衝突在本質差異上開始而無法化解。

¹⁴¹ 2009 年 12 月工會內部會議。

另外，《安那其工團主義基礎》在最後一章節提到「CNT 不是安那其組織，是安那其工團組織。」¹⁴²他將安那其與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差別以法律、組織方式、行動理念和工會組成區分出兩者，安那其主義是「非法、不承認國家、以 Affinity group¹⁴³作為基礎的組織單位、具有更革命的行動理念，並純粹的由安那其主義者組成、專注在意識形態，包括教育、宣傳、訊息和文化行動等」；另一方面，安那其工團主義是「合法的工會、以工會作為組織單位、行動理念是在立即的要求下抗爭，他們的行動更加的改革派(reformist)、只要是工人都可加入的組織、他們的行動包括任何與工作有關的範圍」，「安那其比較是一個思想。而安那其工團主義是一個架構，對於參與者他們只要求工人們尊重他的架構」。從上面的區別可以看的出來，作為一個真正「安那其」的組織或團體的是由安那其主義者所組成的，而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工會雖然承襲著安那其的思想，但他們並不要求參與者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或認同，反而使用了「尊重」(respect)這個抽象又不太具有政治化參與過程的字眼。這個原因造成了安那其工團主義在歷史上不斷的面對著兩著主要的派別的分裂，一方面是根基在這些「安那其工團主義原則」下吸引而來的安那其主義者，一方面是那些帶著基進想法的「工會派 unionism」。在 Roca 的研究他將這兩派稱為「安那其派」(anarchist)，和「工團主義派」(Syndicalist)¹⁴⁴。

「安那其派的主要目的是：保持 CNT 的純粹。對於他們，對組織最大的威脅就是改革主義，那就是另外一派(工團主義)的路線。他們認為工團主義的目的是要重新結合 CGT-CNT，引導組織合併到社會系統中而放棄他們的基進革命性。」跟著 Roca 引用了一個安那其派會員的文章，並指出他們相信存在著一個 CGT-CNT 的陰謀 – 目的是把 CNT 送入工會選舉中。另外「工團主義派」則是

¹⁴² CNT-AIT Sevilla, translated by Jeff Stein, *Basic Anarcho-Syndicalism*, p.21.

¹⁴³ 由一小群人以安那其思想為原則所組成的小型行動團體，組織與行動方式依不同的組成理由而有所差異，但主要以直接行動來達成行動目的。

¹⁴⁴ Beltrán Roca Martínez, translated by Sharif Gemie, "Anarchism, anthropology and Andalusia - An Analysis of the CNT and the 'New Capitalism'".

「憂慮因為內部的誤導使得工會在勞動力的位置受到了侷限。他們認為主要的問題在於工會沒有能力去以一個工會的身分來抗爭。在 21 世紀的現在工會必須要去重新定義甚麼是安那其工團主義，為了要贏得車間的抗爭，暫時的結盟也許是需要的。」而這個「暫時的結盟」，讓安那其主義派感到很不安¹⁴⁵。

之後 Roca 又提到幾個關於安那其派的對於工團主義派陰謀論的指控，包括 Granada 工會在(做為主要的安那其派工會代表之一)當時作為區域聯盟秘書處的「桌下協議」- 排票¹⁴⁶。這裡面的指控不乏工團主義派的偏見，「他們都有些瘋狂。」當我到西班牙的第一個星期人們就提醒我，當時賽城工會還籠罩在一片「河蟹」¹⁴⁷之中，在之後的半年間我不斷聽到關於安那其主義派的傳言，「他們的瘋狂甚至表現到他們的行動中，他們有極度的暴力傾向」，工會許多人不斷的告誡我要小心安那其主義派的荼毒，不只在他們對於工會爭論爭的瘋狂行徑與精神錯亂的文章指控，「事實上，他們都患有精神疾病」到了最後這些攻擊甚至是直接的人身攻擊，「真的，XX 工會的 xxx 他一直以來都有精神病，他現在正在長期接受治療，這是真的！」人們挺有一回事的告訴我，只是在這整個「賽城 CNT VS. 那些瘋狂的安那其主義」的對抗賽中我很難確定到底甚麼是真實，甚麼是謊言，因為人們總是一付「物證確鑿」的非難他人。

一些人爭執著這個對立來自於「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另外一些人堅持這一切的對抗只是「私人恩怨」，傾向於工團主義派的 Roca 在他的研究中提出這一些對抗只是雙方在「權力」的拉扯，他並且承認「一個好的組織領導是一個好的工會的重點」，這表示他一方面承認領導主義在工會中的現實，同時他也認同於

¹⁴⁵ Ibid.

¹⁴⁶ 工會的投票可以參見本文的第 81-83 頁。這裡所指的排票是指當工會在區域會的決議前會議 Plenaria 先討論要決議的事情與交換消息後(決議的內容可能是選擇新的區域秘書長，區域行動，或是解散某一工會等的問題)，各個工會在私下相互聯絡討論他們想要在會議中投出甚麼樣的票來做安排票數的工作。

¹⁴⁷ 中國大陸的網路用語，是「和諧」的諧音，出自於中國共產黨言論控制的政治脈絡之下，一方面國家意圖推行「和諧社會」政策，以「壓制社會暴力」，另外一方面卻以強行清除不符合官方認同的言論的方式來加以執行官方政策。在某些中國的論壇「和諧」一詞已被禁制。

領導存在與其重要性，他甚至認為這是「攸關」於工會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好組織的重點。Roca 在這邊的分析有其偏向性，因為他與工團主義派有著長久的淵源，或甚至說他是工團主義派中重要的其中一個角色。而我雖然在短短不過三年的參與，也被迫從原來處在的「工團主義派」鬥爭中被迫進入那個被笑稱為「塔利班」(taliban)¹⁴⁸的「安那其主義派」，但與其說我在其中存在選擇，不如說我部分順著情勢的曲折而接受。我更傾向相信工會不是單純得可以以兩個派別來加以區別的，這個區別的主因來自於「安那其主義原則」外在的評鑑標準，事實上，就在我對於不同派別的工會訪談中，其實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在對於安那其主義的認識上似乎是一致的(奉行理論)。

Roca 指出「在安那其工團主義中是存在著某種權力架構的(a certain type of power structure)」，但他卻沒跟著說定義這個所謂的某個權力架構是怎麼樣的組成，跟著便提到他對於工會中領導的認同，這似乎指的是他所認定的權力指的就是領導，而那所謂的權力架構，可能指的就是那個「領導者所組織起來的組織內部鋼架」。但以我在工會的經驗中卻無法同意他的這套說法，他似乎傾向於將「領導者」的位置確立起來，之後以領導者為核心組織起一個「權力架構」來加以指導工會走向正確的行動與方向(這點他並無在其文章中討論到，但似乎可以在他目前在聖馬利亞港的行動中看到)。主要是他將「權力」很快的就放置到「領導者」這一個唯一的位置上，這是以一般組織的形式去做認定。事實上，如同非組織架構暴政中所提的，如同這樣「非」組織的組織形式中，所存在的權力形式是更難去認清的，這個權力可能來自於長期的經驗、有魅力的人格或是漂亮的交際手腕。「安那其主義派」中更是充斥這樣的權力，他們許多人來自於「解放安那其青年聯盟」在更早之前就擁有行動與理論的經驗與知識，對立於工會中存在許多純粹的「爭議案」工人而顯得令人難以理解，不管是在語言上，或是在行動上

¹⁴⁸ 塔利班的稱號同樣的來自於工團主義對於安那其主義派的揶揄名稱。這在一些論壇網站中甚至變成了他們直接的代號。而某些安那其主義派也常自稱為安那其塔利班，這似乎很能夠詮釋她們的「純粹性」。

的基進程度都有認知上的落差，而進到組織運動當中，他們的「權力」就積極的顯現出來，不管在政治語言或是行動策略上他們輕易的掌握了主導的身分。而這部分，在 Roca 的討論上卻加以忽略，這主要來自於工團主義派更傾向盡快的將他們「領袖派」的論述置入工會中，在工會承認之後便可以馬上開始其統領的工作。這個動作可以在他們於第十屆大會中積極主導工會章程「導正方向」中看到，他們積極以「桌下排票動作」確保他們的提案一一通過，包括工會計票規則的修改，保證大工會的「統治」位置。

工團主義派只願認識、承認並積極捍衛其工會「領導」的權力位置，雖然 Roca 仍在文中提到安那其主義派的「會議外操作」，但對於這個部分他更像是在討論一個「惡鬥的形式」而不是將這樣的行動以一個「權力形式」的方式來加以探究。所以遇到在討論權力的問題上，他們更傾向去給予這個領導位置的正當性，而不是更全面的分析這之間的權力關係，他甚至將「鬥爭」這個權力全都化約為一個「安那其主義派」的小動作，他們「無法」服從於工團主義的命令，「恣意」的在工會從事他們的「社會運動」行動，參與「佔屋」運動、並且組織文化行動那些與「工人不相干的愚蠢事情」¹⁴⁹，去鬥爭工會的「位置」，並且以他們的好惡影響工會的「方向」。他們狂放不羈與基進的政治態度使得工團主義派無法接受。這可以從在 21 世紀中的前十年裡，賽城工會中一個接著一個開除的「青年安那其主義」者的情況中看到，她們被指控為「太嬉皮」、「太龐克」而讓人無法接受，一些工人也不滿她們的安那其行動太過「極端」。而 Roca 只是急忙的再次宣稱「若是這個權力是被有效組織起來的，它就不會是反民主或有害的：正好相反，它可以生產積極的組織影響力。」持續的遺忘這些另類權力的存在。因而他對於工會權力鬥爭問題的評論幾乎毫無批判性，甚至一方面像是在歌頌權力的重要性。

¹⁴⁹ 這個談話發生在鬥爭之前。

另外，由於游移於兩派之間，使我更有機會面對並加入到這個工會中不同派系的脈絡之中。這使我相信，派系鬥爭的問題不僅如檯面般「兩對立」的單純局面，並且這個對立與「權力」有著深刻的關聯性。要了解這一切的重點就是要將「權力」與「解放」的概念放至在一起，如同 Roca 說的「對於安那其主義(派)，權力就只是壓迫。」「確切的說：權力對於 CNT 來說就是禁忌。」權力如同他所言，在 CNT 是個禁忌問題，因此甚至他也無法觀其全貌，而我認為他歌頌權力的方向應該做個調整，回到安那其的原則上思考解放：「若是解放的認識能夠被有組織的建構起來，那麼這不會是與民主相對立的，也不會對自主性造成傷害：正好相反，他可以生產出正向的權力，對組織造成良好的影響。」

之六、怎麼辦

最終 Roca 在文章後段，幫工會做了一個 SWOT 的分析，他在這個部分，提出了幾個不乏重要的觀察。包括工會的過度官僚化，「要在一個極度民主的架構中…去決議一些極度瑣碎的事是很累的，…這可能花上一輩子的時間，並且有時候這個原因是這些行動者(militante)並沒有確切的知識而致，而使的人們失去熱情(burn out)。」還有，工會對於理論反映上是缺乏的，他指出 CNT 從過去到現在幾乎都沒有任何的改變：他們仍然使用同樣的理論模型來做分析。他舉 CNT 的會報(Solidaridad Obreros)來做例子，報紙裡面持續的使用巴枯寧、克魯泡特金、馬拉特斯塔的理論來作分析，卻極度的缺乏對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解。作為少數存在的安那其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也曾在他的《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做出這樣的抱怨，安那其似乎被拒於學術殿堂之外。而他們也不意圖找到在現在社會科學分析上的接續點。

在面對工會所缺乏「宣傳」的問題部分，他提到工會的刊物與宣傳常常是過

份沉浸在 CNT 過去的歷史當中，這的確是工會另外一個的嚴重長期性的問題。不僅如此，我們常喜歡在抗爭現場唱起 30 年代的安那其抗爭歌曲，這些行為對於現代的西班牙人來說似乎是怪異的，也造成部分沒有安那其背景的人與其他工會會員存在很深的代溝。不過，與其如 Roca 消極的去指稱工會的人無法理解這些他們意圖共同爭取權力的人的興趣所在，不如說這些人長期在工會的鬥爭，與政治取向使得他們的生活範圍出現了侷限性。許多工會的人仍然有非常豐富個人生活，而其他一部分加入工會的人最終也都成為良好的革命同志。而他另又提到，工會必須面對一個「Social-marketing 社會銷售」問題，則似乎與工會運動有所矛盾。在近年來許多的社會運動為了達到更多人的接受，紛紛走向資本主義化的「市場取向」，如同他們銷售一項更高貴的「道德」「正義」甚至是「革命」，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掉入資本主義的漩渦中無法自拔，當我們把一個所謂的社會運動包裝成一個商品的過程，似乎很可能的消除了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性，在去掉政治性的運動變成了純粹情感取向的道德魔咒，人們只貪圖在這個過程中享受它所帶來的自我滿足與自我實現，而忘記了行動背後的本質。因而，我們面對永遠在處理許多層出不窮的重覆事件，提供感動、激動、激情與刺激與滿足感，在情感疲乏之後再推出另外一套新的「銷售手法」。只是，當這些外來的東西都去掉之時，我們在這條行動道路上還剩下甚麼，我們身旁的同志是否也還會是我們的同志？不管是社會運動或是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發展的目的都不是成就一個最成功盛大的「運動場」，而是一個深刻的個人和社會啟發，這個工作只有回到最草根與日常的行動上才能發生，我們必須要做的是盡快的進入人群、街頭找尋對話的空間，重新進入鄉間，如同 100 年前的安那其主義者，她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徒步一個個村落與人對話，這些鄉間最後成了 1930 年之後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地方行動單位。在 Vadim Damier 的書中提到，一個德國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者 Augustin Souchy 講了一個 Aragonese Village of Munesa 的故事，他在巴塞隆納工作很久之後回到他家鄉的村莊，結識了那些擁有解放思想的農民。在他的影響之

下，那些鄉村同志們組織了一個集體 – 一個自由公社。「一本由克魯泡特金所著的西班牙文版麵包攻略放在桌上，在晚上，集體團(collective)的會員們聚在一起，他們其中之一會念書給所有的人聽。」¹⁵⁰

除此之外，工會面臨著上述新自由主義經濟系統的威脅而面臨轉型的困境、工作本身形式價值的衰退，還有長久以來對安那其工團主義汙名化與政治的壓迫。但是同樣的代表民主制出現了動搖的可能與批判精神的高漲，這使得使用「直接民主」、「直接行動」原則的安那其工團主義的工會也出現了新的可能。

十五、以《受壓迫者教育學》做為教戰指導參考書

「那些劃地自限的門戶之見會造成神祕化與疏離化；而基進化則進行批判與解放。基進化會促進個人對於所選擇立場的投入程度。因而會使得他能更加努力去改變外再具體的現實。」¹⁵¹Freire 在受壓迫者教學中的研究，很深刻的探討了行動與解放的問題，面對 CNT 內部極度缺乏的自省與對內組織來說，我認為 Freire 的「解放(人性化)」過程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模型，不僅是對於組織方面，同時也是一個組織內部會員可以學習的「自我解放」過程。在當我們面對目前的工會「內部爭議」與組織僵化，他可能是一個重新自省的開始。如同 Freire 提到的，只有當我們能夠越基進的覺察與行動時，我們所進入的現實與認識到的問題也就會更加的完整，並且更能去改造它。

「解放是一種實踐，是人們對於他們的世界進行行動與反省，以進一步改造世界。」¹⁵²人們一般很少去意識到壓迫的存在，常常都是需要經過一個事件的發生，人們才會開始驚覺或是感知道自己受到了「不公義」的威脅，然而這個對於「不公義」的反應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其中壓迫社會教導我們的主要方式通常是

¹⁵⁰ Vadim Damier, 2009, *Anarcho-syndic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p.70.

¹⁵¹ Paulo Freire, 方永泉譯, 2003, 《受壓迫者教育學》, p.69.

¹⁵² 同上註, p.116。

去「合理化」這一些問題，去接受「不公義」做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教育馴化之下，被壓迫者的解放行動被壓抑了下來。最後，人們甚至在面臨到覺醒的可能之時都加以排斥。在 Freire 的觀察中，他提到人們普遍存在著對於自由的恐懼，人們害怕在覺察的過程中陷入「毀滅性的狂亂」，而可能導致進入一個「他們世界的全面崩解。¹⁵³」但事實上，「覺醒並不會導致人們『毀滅性的狂亂』。相反的，它使人們以負責任之主體的身分進入歷史過程中。覺醒可以幫助人們尋求自我的肯定和避免盲從。¹⁵⁴」就如黑格爾所說的：「唯有藉著生命的冒險，才能獲得自由…那些未將自己生命做為賭注的人，也許仍然無疑地可以被認定為一個人(a person)，但他並沒有獲得作為一個獨立自我意識時所認定得真理。¹⁵⁵」

Freire 相信「追尋人性」是對於所有人類來說生命的最終目的，壓迫者雖然一直不斷的以壓迫、剝削或是強暴的方式在生命中脅迫受壓迫者，最終的目的都是要從權力的抒發中達到他「自我認定」的滿足感與力量，但這個行動並不會在最後幫他找到真正的人性。在 Freire 多年的研究中發現，「追求人性」的解放行動，唯由來自於受壓迫者一方的「弱勢力量，才足以強大到使壓迫者及受壓迫者都獲得解放。¹⁵⁶」然而，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身分，在現實上其實有著很複雜的關係，一個人可能同時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因為長期處在壓迫環境中的生活已經潛移默化的將「壓迫者」的行動模式內化到受壓迫者身上，他們以重覆壓迫者的行為而達到即刻的「解放」，以暴力、威脅或是不同形式的行動方式使自己感覺到自身的力量，而不再是一個受壓迫者。

因而這樣的解放過程是困難的，而覺察的工作也就更重要，覺察不僅是作為「行動前的前導」，他必須要持續的發生在解放行動的過程中，我們才不至於重

¹⁵³ 同上註，p.67。

¹⁵⁴ 同上註，p.68。

¹⁵⁵ 同上註，p.233。

¹⁵⁶ 同上註，p.74。

復過去壓迫環境中的問題或是陷入到行動的「迷思」之中¹⁵⁷。

覺察必須要伴隨深刻的批判能力。解放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因為違反了過去壓迫的環境而受到來自於外在的攻擊，可能的情況包括像是壓迫者的介入，而以其身分中存有的偏見與缺陷而窒礙了我們在解放行動的發展。不然就是壓迫者會將我們形塑成這一個「和諧社會」的叛亂者，將我們意圖打破他們建立起來控制社會與受壓迫者的宰制體制，作為影響他們在其中絕對權力位置的攻擊，而對這些解放行動大肆的打壓。除此之外，解放中所遭遇到的問題也可能是出自於受壓迫者自身。Freire 在他的研究中就觀察到了幾個主要的問題，包括，人們在初期的行動中總是傾向使自己成為另一個壓迫者，或是「小壓迫者」(Sub-oppressors)¹⁵⁸」，他們所追求的解放，變成是個人對於壓迫者的行動再複製，因為在壓迫環境中的生活已經潛移默化的將「壓迫者」形塑成他們心中的人性楷模。另外，在解放行動的中程，人們也可能發生「走回頭路」的情況，如在推翻霸權體制之後，建立出的新的政權成了行動的終點，而不求解放的延續，最後新的體制再製了宰制的「科層體制」¹⁵⁹，而使得過去的解放行動中所獲得的人性化消失殆盡。Freire 指出解放(人性化)過程只有在「鬥爭」中才可能發生，而不需要那一方的「協助」，並且透過行動實踐解放才完成。¹⁶⁰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書中，Freire 提出一個「革命領導者」的角色，雖然在安那其思想原則上這個角色似乎存有「權力」的爭議性，但是 Freire 在這個角色的設定上似乎意圖小心的避免「領導」的發生。然而，一方面我也必須在此承認「革命領導」的角色在現實上也存在於安那其主義運動者身上。而且，他們也一樣的犯上了 Freire 提醒的問題，包括在解放的行動中儼然成為一個「壓迫者」的再現，或是與「受壓迫者」的關係上的不平等，也或是革命領導利用了群眾的

¹⁵⁷ 同上註，p.84。

¹⁵⁸ 同上註，p.75。

¹⁵⁹ 同上註，p.89。

¹⁶⁰ 同上註，p.75。

依賴感，從中獲取某些利益，並且從依賴性創造出更多的依賴。Freire 因而就這些問題中提出解放行動中除了「覺醒」「實踐」外另外一門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對話」。

「解放任務中，革命領導不是去進行『解放的宣傳』，也不是僅在受壓迫者心中『植入 implant in』自由的信念，正確的方式是在於對話。因為解放不是一個賞賜，而是受壓迫者覺醒的結果。¹⁶¹」在行動過程中，人們常常會忘記「解放」的重點在於行動的過程。若是在一個沒有全然自覺、自決和批判的過程解放就失去了可能性，他所達到的最終結果也不會是一個真正的解放。所以當我們面對在做組織的過程之中，我們不僅要提醒受壓迫者去不停的反省行動，我們也要自我反省我們在相互交往的過程是否是平等的，而不只是一個單一的「教化」過程。

人們絕對無法學習的「比較人性化」，只有當他真正的認識到了問題與壓迫的本質，並且意圖以實踐的行動去改變的時候，他的人性化過程也才完成。所以「對話」與提問在這個行動中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對話是平等的而不是「教化」的，另外「提問」是批判、反省的而不是「指導」，並且在這個過程之中提問人與對話雙方也在成就自我的解放。這些都是在組織群眾運動中重要的思考點，而也是 CNT 內部正缺少的組織教育。

第四部 介入

十六、CNT 初探

2010 年 2 月我從馬德里搭飛機離開西班牙的前幾天，在 1 月 30 日，我最後一次以賽城 SOV 工會會員的身分參與了當日在馬德里召開的全國聯盟 Pleno¹⁶²，

¹⁶¹ 同上註，p.102。

¹⁶² Pleno 在 CNT 是一個決議會議，存在於地方、區域、全國聯盟中，參與者是由各地方或聯盟

當天如同往常參與的有來自各個區域聯盟的代表，他們就 2010 年底將舉辦 CNT 百年大會的相關事物討論。

當天的會議比我想像中還快結束，當我才正開始試圖了解發生了甚麼事後，似乎也就結束了，人們很快的把區域的決議提出，不像過去我所參與過的區域或是地方 Pleno 中仍常有(本來應該是發生在 Plenaria 的)討論與爭論。2010 年百年大會的場所將會改到其他的工會，本來的會議主辦工會賽城，但在面臨工會可能破裂的局面，賽城中的幾個地方工會就自行提案在失去了工會內部團結的情況下，無法組織百年大會，雖然賽城地方聯盟中的運輸工會還是一直堅持擁有主辦權，但這個轉移是必然的結果，就算賽城在年底不分裂，我們仍就會是支離破碎的走下去，百年大會可不能毀在我們的手裡。很快的賽城無法接應大會的提案受到了一致的同意，接下來就是提議誰該接受這個會議的主辦權。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安省其它的幾個工會很有意思爭取這個機會，特別是 C 工會，他們一開始在區域會議上就積極的表現出他們的興趣。果然，會議的結果由 C 工會以 20 票打敗 A 工會的 8 票接收了百年大會的主辦權。當天安省的代表正是來自 C 工會與 L 工會的秘書，他們看來似乎很滿意會議結果。當時賽城工會的分裂與情況都還不明朗，工會對立情況也還沒在台面上出現，L 工會的代表 Miquel 仍向我們有點偽善的親切道了再見，就帶著他們的好消息回到安省。

會議結束之後的下午，在馬德里有一個對德國辦事處的抗議活動，目的是抗議德國政府對我們姊妹工會聯盟 FAU-AIT 工會的打壓。我與另外一個賽城公務員工會朋友也加入他們的行動，一行來自西班牙各處的人們就肩上扛著紅黑的會期向德國辦事處出發，在到達前我們與幾個不同的工會的人隨意聊了一下，人們都向我們打聽著賽城的消息。當時我與朋友因為都未曾見過這些其他地區工會的

所推出的臨時代表。在 Pleno 會議前有一個 Plenaria 準備會議，出席 Plenaria 會議上的是各地方工會或聯盟的秘書長，他們就當次決議題目的資訊作一個交流，帶著這些訊息的秘書回到工會會議中報告並且在會議上達成決議。之後在 Pleno 會上提出他們工會或聯盟的決議，並以工會規定的方式計算票數，決定最後的結果。

人，實在無法分辨誰到底是來自哪一個工會，那一個「派系」，但隨行的朋友似乎對此不太在乎，他向每個詢問的人發表了他對於賽城地方聯盟與各工會間的意見。幾個來自於加泰隆尼亞區域的人似乎很有興趣的問了一大堆的問題，不表意見的只以點頭回應，或偶而回幾句無關要緊的話。人們多半都認的出我是來自於賽城的那個亞洲人，這得歸功於賽城運輸工會與服務業工會對我「厚愛」有加，他們不只一次得在文件中提到我，服務員工會稱呼我是一個，不知哪來的「匿名者」，甚至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名，誰知道她在隱藏些甚麼？」

這個抗議大概有 50 多人，我們一群人塞在德國辦事處對街的人行道上，拉起了布條向德國政府抗議，當天也有德國的移民會員在現場以德語念出抗議聲明稿。在之後人們甚至激憤的唱起「在那路障上」來自於西班牙內戰有名安那其反抗歌曲，歌聲高昂的散佈在 1 月底陰冷的馬德里街道上。

之一、2009 年初

就我一開始的計劃是在 2008 年的秋天到西班牙的 CNT 工會實習，但因為一些申請文件的錯誤計算，這個行程往後延了半年，直到 2009 年初我才成行。這一年，我在西班牙居留證的背後，寫著「居留目的：研究西班牙 CNT 工會」。申請證件的那一天，我與一個工會朋友到賽城的外國人辦事處申請我的居留身分證明，辦事員拿著我申請資料看了半天，瞥了我與朋友一眼，「這裡說的 CNT 是那個安那其主義者嗎？」朋友點點頭「正是」，他抿嘴一笑「所以你是 CNT 的人？」「正是，我是他的負責人」跟著辦事員點點頭，喃喃的說「安那其主義者，真有意思。」「你來西班牙研究安那其主義者？」辦事員一邊處理手上的資料，一邊看著我問。「正是，我來研究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者。」

每當人們聽到我在 2009-2011 年兩年多的時間都住在西班牙南方安省小鎮時，

總是感到很羨慕。他們為我想像出一個西班牙歌舞昇天的生活：其中有數不完的美酒佳餚，西班牙金黃色的海鮮飯和 Tapas，還有便宜又大杯的當地葡萄酒、鬥牛賽和西班牙南方文化饗宴，似乎真的有人的生活可以每天就是飲酒、跳舞和歡笑。事實上，我在西班牙的生活與這一切想像出來的「觀光客天堂」有著天壤地別的差異。2009 年初期我住在一個城市邊緣的佔屋¹⁶³之中，這個佔屋當時正面臨爭議案，每個星期我們都有佔屋居民會議，其間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這個佔屋運動同時與整個賽城區的「戰鬥中區域」聯盟連結在一起，聯盟連結了幾個在賽城區域中面臨「將要被迫遷」、「租屋爭議」、「佔屋社會中心¹⁶⁴」等問題的居民行動、與街坊團體。「戰鬥中區域」每個月還有不定期的會議與抗爭行動。選擇住在這樣一個佔屋裡，倒也不是我活得太過爽快而想體驗「la vida loca(瘋狂生活)」，一方面是經濟的考量，我實在沒有經濟能力負擔在西班牙租屋，我一心期待的打工機會，在失業率幾乎破半的安省少的可憐；另外一方面，我也期待可以加入當地的佔屋運動之中，住在裡面似乎就成了最基進的行動可能，也何樂不為。直到 10 月，社會運動在賽城出現更強烈的打壓，佔屋首當其衝，不少住在佔屋裡的朋友被警察盯上，而那棟樓的所有權人也開始頻頻的派人到樓間巡邏，每當屋主派來的「樓房管理員」在樓間走動時，我們都緊張的互相聯絡，深怕樓房管理員進到忘了鎖門的房子中，那麼我們的佔領就被迫要即刻放棄了，出入與行動變得更加的緊張，幾個人也注意到開始有秘密警察頻繁的大樓周邊走動，

¹⁶³ 佔屋指的是在沒有合法取的使用權之下進入到空無人的空間中暫時的以使用權加以佔有。在歐洲擁有長久的佔領文化，在一戰前西班牙存有不少的佔村(整個村莊建立在佔領的土地上)。佔領出來的空間可能有許多不同的用途：一般住屋、公共空間，還有許多有名的安那其社會中心(Social Center, 西文 Casa Okupa Central Social)都是佔領的整棟建築物。這樣的行動策略特別在西班牙與德國等西歐國家受到歡迎，主要的目的是對抗地產、屋產企業的炒作，並以行動廢除土地與空間的私有權。當佔屋發生之後的前 48 小時，屋主可以強盜罪現行犯將佔領者逮捕，但是這類空屋多半棄置已久，佔領的行動若是沒有受到屋主的發現超過 48 小時後，屋主就必須訴請司法程序對佔領者(其中一人)提出侵佔的告訴，這樣的司法程序大概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而若是遇到拉高政治性的抗爭時，這些爭議案可能拖上更久的時間。

¹⁶⁴ 安那其社會中心就不同地區有所差異，有些社會中心純粹目的是政治中心，在其中只辦與政治議題相關的活動，有些中心混合著一般社區中心的元素，有舉辦音樂表演的空間、會議中心與不同的社會課程，包括女子防身術、移民語言課程、電腦課程，有些中心固定在某些時間舉行「團結餐會」由不同的行動團體在某一天舉辦餐點的提供，將當日的所得做為行動基金，或目的性籌款，包括罷工經費、政治犯聲援等。

在安全的考量之下，幾個工會的朋友建議，我這個「外國人」最好遷移出來，幾經考慮之後我搬到一個工會友人的租屋處。

另外一方面，我的生活幾乎都是圍繞著工會打轉，周間每個傍晚都到工會報到，幫忙工會的一些雜事、或是旁聽工會會議、與會員們聊關於工會的大小事、某幾天固定的抗爭活動、制作活動道具，不然就是在讀書室裡發呆翻書。到了周末就參與工會的抗爭活動，一開始是在 L 鎮，之後在 U 鎮、再之後又是 T 鎮，其中 U 鎮的集會抗爭更是持續了幾個月的周末不停歇。從 2 月到 6 月為止整整 5 個月的時間，我每個星期都在賽城區域或是安省的某個城市度過。當時，佔屋的朋友常常都戲稱，我每個周末都「回家」(如同那些在城市工作的移工們，到了周末就會回到自己的鄉鎮)。周末的抗議行程通常是一個早上與之後的酒吧會員交際。在 U 鎮一次的抗議中，工會人們看到我與佔屋室友英國友人到達的時候也戲稱我們是「國際縱隊」。當時在安省的 CNT，幾乎沒有人不認識我的存在，畢竟我是 CNT 百年來少有的東方臉孔。

到了六月底開始幾乎所有的活動都遇到了夏天的來臨而停擺，一方面天氣實在過熱(中午到下午，大概有 45 度高溫)，人們不願意上街活動，而情願在家午休(siesta)；另外一方面，歐洲的「避暑」文化，使得整個城市少了近大半數的人，街上空無一人外，許多酒吧更選擇在夏天歇業，開門的酒吧也只剩下寥寥無幾的客人。我與一個工會友人，便計劃在這個炎熱沉悶的夏天，以一整個七月的時間，開了一台二手車走遍了法國、德國、荷蘭直到波蘭，我們拜訪了法國 Toulous 這個曾為西班牙安那其在西班牙內戰後最重要的移居地，也是法國南方重要的行動重鎮，當時我們寄住 CNT Toulous 會員屋外的公共電話亭就是 2007 年在街頭抗爭行動被燒毀的遺物之一，到了巴黎我們也偕同 CNT 巴黎的會員參與了黑人移民工在 CGT 廢棄辦公室的抗爭靜坐，並且與 CNT 巴黎的朋友討論了關於整個 IWA 的情況；在德國我們拜訪了漢堡港的 FAU，參與了他們當時舉辦的一個會所內的文化活動；之後在德國柏林我們加入 Babylon 戲院，工人抗爭工作條件壓

縮的行動，一起在路上發傳單向人們解釋爭議案；之後在波蘭的停留相當短暫，但我們也參與了當天坡思那安那其聯盟，在當地最重要的佔屋中心羅斯布瑞的開會。這個跨越西歐的旅程讓我有機會更全面的看到了不同國家中，安那其工團主義發展的情況與問題，同樣的也包括了我所關心的內部組織問題。在當時賽城工會還沒有分裂，但是內部對立的情況已經處處浮現。而面對這些各國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者們，每個人對此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說法來解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之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2010 年 2 月 6 日傍晚，我剛回到台灣幾天的時間還在調適時差，線上傳來了一個來自西班牙的訊息，「我們成功的開除了 Mario」，「太痛快了！」SOV 會員 Justo 跟我解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2 月 5 日賽城 SOV 召開會議的時候，整個會議廳裡塞滿了人，Justo 說到：

「你可以想見那個情況。你記得 12 月的會議嗎，那時我們有三十多個人會議廳就已經擠的水洩不通了。這次塞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一些我一輩子沒見過『會員』。但是最主要的是公務員工會解散了，我們全回到 SOV 工會裡面。」

當天的會議最重要是要討論幾個 SOV 工會會員的開除案。其中包括 Mario 作為工會律師，以「『暗示性』的對會員表示提告、協助其他工會擬定文件反對 SOV 工會與協助參與外部工會的工會選舉嫌疑」為由被提議開除；另外 Julia 因「電話威脅兩名工會成員」之由被提議開除。會議結束 Mario 以一票之差被開除，Julia 則是四票之差開除。結果出爐 Mario 與一票會員憤而離席，他在投票之前發言說到：你們可以拿走我的會員證，但是你們無法拿走那個思想(ideals)。「我不知道這是否還是作為一個工會，我們已經很久都不談工人的問題了」Darío 在投票之前發言時提到他的看法。

Justo 所稱的這個「成功」很顯然不是 CNT 一致的認識，在開除案後不久便

上訴到地方聯盟，地方聯盟駁回 Mario 的開除案，並且將 SOV 地方工會解散，SOV 地方工會解散之後上訴到區域聯盟，在區域聯盟要求我們「收回對 Mario」的開除就可以回歸地方聯盟，SOV 反對了這項要求而被迫出走。而之後重組的 SOV 秘書長正是 Mario，看來，2010 月 2 月的 SOV 似乎將問題看得太單純了。Mario 當時被開除時，早已經請辭了賽城工會律師的職位成為一名普通會員，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他指稱我在一次會議中「攻擊他」，因為我「認為在工會中同身有律師職的會員，會出現權力壟斷的可能」——像是在特別針對他發言。但是在那個同時，他還擁有 CNT 中央 S 委員會的律師身分。這暗示他的開除案將不會只成為一個「地方」上的問題，勢必會延伸至全國聯盟層級的關切。

之三、雖然民主

Santos 是一個年約 40-50 上下的安那其工團主義者，最初曾協助過我在工會內的研究，他曾向我提醒「應該要盡可能的對工會的問題保持距離」，他說「因為你身為一個研究者必須保持中立」，雖然當時我向他爭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很難保有中立，「我作為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並且這是我的工會。…我無法洋裝這一切對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沒法面對某些錯誤的發生而無動於衷」，他還是堅持作為研究者超然的必要性。然而，直到我與他這次的會面過後不久，我才知道原來他甚至不是工會的會員。Santos 在早些年即受到工會兩派「安那其主義者 VS. 工團主義者」的鬥爭之中被開除¹⁶⁵，他直到現在都受到「安那其主義派」恨之入骨，人們指稱他是個間諜和背叛者，某些攻擊甚至非常個人層面(personal)。

¹⁶⁵ Santos 曾經寫了不少關於 CNT 內部恩怨情仇的小說類書籍，雖然書中沒有指名道姓但卻有指桑罵槐的意思，他與「安那其主義派」便因此結了不少的仇恨。在幾年前 Santos 因為研究一個西班牙「黃色工會」的內部組織而離開 CNT 幾年加入這個黃色工會組織中做田野蒐集，這個行動給了「安那其主義派」對他「根本就是個間諜」的攻擊藉口，加上 Santos 與過去「安那其主義派」結怨的情況下更是將他的一切問題都放置到「間諜」、「背叛者」的身分。在這個情況下賽城的「工團主義派」便馬上展開雙手接納他。然而以與我 Santos 的交往並不認為他可以在這樣一個權力鬥爭的工團主義派中存活。

Santos 經過這些無情的打擊之後，還是「偷偷」留在賽城的工會中，雖然說他的存在是「地下的」，但是他的工作卻是包括重新編修賽城 CNT 重要的出版物。Santos 不僅對於 CNT 的歷史相當清楚，他也出版過不少關於安那其主義等的書籍，他在跟我解釋 CNT 的架構的時候在我的筆記本上簡單的畫出了整個工會的內部架構圖，並解釋決策與組織的相互關聯性。他說「這是一個相當民主的系統」，在解釋到決策的投票方式時他更難掩熱情的告訴我，「這個機制使得一個工會不管多大，他的票數最高限制都只有 8 票，這保障了其中的少數聲音不會被完全的吞噬」跟著他又說「你知道嗎，這個計算方式是從內戰延續到現在的，就是說當時我們一個擁有十萬人的工會，他們在進入全國的決議中也只不過是 8 票。」(只是這個規定在 2010 年的全國大會上被更改了)而從 60 年代即便開始參與地下安那其運動，到之後 CNT 的 Pablo 也在我與他訪談中對 CNT 民主的架構深信不疑，「當然，它的架構是非常民主的。現在的問題只是對立的兩派使它無法正常的運作(function)」。

即使就在發生過那麼多的問題之後，當我再次去審視過我參與 CNT 的過程，我也不免驚嘆於工會組織架構的民主程度：每個地方的產業工會(industrial union)都是獨立的，當一個地方出現了幾個不同的產業工會之後會再一起組成地方聯盟(Federacion Local)，幾個地方聯盟可以再以地域性組成區域聯盟(Federacion regional)，最後延伸到全國聯盟(Federacion nacional)。從最基礎的單元工會到各層次的聯盟都存在不同的委員會(comite)。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大致相同，主要是包括一個祕書長加上包括財務、工會行動、組織等不同名目的祕書，這些祕書擁有的唯一工作就是「執行」工會會議(Assembly)的決策，等於說他是單純的「聽命令辦事」人員，沒有任何「行政權」或其他任何可能的權力使其位置高於工會裡的其他會員。這些祕書人員雖然有 2-3 年的任職時間限制且被要求是「輪替」，他們也隨時可以被替換而不需要受到年限的限制，年限目的唯一只在控制在位期間不過長，而這些祕書職也是完全不支薪的。另外最重要的一點，這些祕書在任

職期間「不可以向會議提案(propose)」，這是為了確保祕書不因職務之便，就此控制了工會的方向與行動，秘書職的權力很小心地被限制住。除此之外，工會的最高且唯一存在的決策權就是在地方工會會議(Assembly)，決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共識制」。當工會面對要做出聯合性或是某個地區性的集體行動的決策方式，也是要回到最基礎單位的工會來決議，派出「可替換」的臨時代表進入到聯盟來傳送決議結果，這個代表沒有任何權職，只能且唯一可以就地方工會的決議發言，「當他說話的時候他說的就是地方工會會議說的話，他沒有個人意見(opinion)」，並且隨時可以被替換。這個組織架構的民主性是積極的，但有時也因為過度的民主而讓人感覺到疲憊，就像 Roca 就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過度瑣碎的事，造成了會員得熱情燃燒殆盡(burn out)。」我記得在一次區域的會議上人們就組織一個研究塞城工會內部爭議的「研究委員會」的具體事件討論了半天，「那麼：我們現在決定誰要加入委員會中…跟著下面討論誰不要…還有，一個工會有幾個人可以參與…現在討論地點…(一個人向主席問到)那個參與的人是可以替換的嗎？…好接下來討論是否那個參與的人可以替換…現在，我們討論若是那個人有緊急的事物臨時缺席該怎麼辦…這個人可以向人談論他的參與嗎？…」。這個討論從一早經過午餐時間，直到傍晚都還沒有結束。

Tierra 在開除 Mario 當天的會議，曾經提到「有兩種做事的方法，一個具有建設性的，另外一個具有破壞性」¹⁶⁶。的確，儘管 CNT 的架構設計的很是民主，它仍要承受參與者在其中運作的積極態度，如同 Paulo Freire 所說的，在解放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有絕對的覺察性(如同自我解放的動作)，並且拋棄過去對統治階級的行動複製，參與者與行動者一致平等，以對話與提問的模式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一個「覺醒」的組織，只有在這個情況之下，民主的組織架構才有其效用¹⁶⁷。

對於工會「分裂」的局面有很多的說法，一些人在爭執「意識形態的差異」

¹⁶⁶ 工會內部文件。

¹⁶⁷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

— 這是「安那其主義派」的說法，「個人恩怨」是「工團主義派」的說法。而就我對幾個分散在不同派系的工會的研究訪談中，人們對於「安那其」的想像並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麼不一致。「它(CNT)是一個安那其工會，互助和這些想法。」¹⁶⁸，「一個使用安那其主義如會議主義、聯盟主義、水平架構和工人自治原則的工會。」不管哪一派對於 CNT 的定位都是「安那其主義」，在基礎原則上沒有牴觸。同時，對於工會的目標上也是「照本宣科」的如同組織章程中所提的「自由共產主義」的想像很一致的說法：「喔我不會說，自由共產主義。我們想要有這個大的革命發生，社會全部的改變。」¹⁶⁹

就是說，這兩派的說法都不是完全正確的，安那其主義派「意識形態」的說法看似並不精確，因為他們對於工團主義派的指責常常是在於他們「某某行動違反安那其主義原則」等，這個指控一方面來說是確實的，但是這並不表示工團主義派對於「安那其想像」必然的不同，Juama 一名在出版安那其主義思想等基進書籍的「工團主義派」就曾經在聊天時說道「在西班牙內戰時，CNT 的祕書職是給薪的」，從他的觀點中，他也在承襲過去 CNT 對革命的想像，只是他們認為在其「作法上有必要對現代社會做出正確的修正」，如同 Roca 的文中積極提倡的。而另外一方面「工團主義派」就正是持著這個「我們期待的社會是一樣」概念將所有的對立都歸咎為「個人恩怨」，而不去探究這個「個人恩怨」中的政治性，或去反省他們「修正」的問題，「難到一個安那主義的來臨是可以在霸權或是統治下得來的嗎？」「難到一個解放不是所有人共同參與的成果嗎？」即使如此，工團主義派更堅持他們的行動「更有效」「更合適於現在的社會」。雙方並沒有真正的交集點，只是針對自己認定的問題窮追猛打。

¹⁶⁸ 工會訪談稿。

¹⁶⁹ 工會訪談稿。

之四、我的觀點

1. 「Militante(好戰分子，積極者)」

Militante 幾乎是工會組成的主要元素。但是這個 Militante 本身的意思似乎就不是那麼的符合「安那其原則」，他的角色在現實上有點像是馬克思主義裡的「前鋒隊員」，他們策劃好行動的一切(主導工會會議)，走在行動的最前線等，領導革命，當提到 Militante 時，一個工會會員甚至將「一般會員」稱之為「付費者」(payer)，「Militante 就是工會，他們就是在那裡，他們去開會，他們給與他們的看法，並且提案，他們不只是付會費，他們的自覺不只是在自己身上的。在這裡我們沒有那些只付會費的人(payer)，我們的 Militante 是多於只付會費的人」；這個與巴枯寧「思想領袖」的煽動者(agitator)角色是有實質差異的。但是實際的應用上幾乎被混為一談。最重要的是，人們一般對於「Militante」在工會中的角色似乎也沒有任何的反省，在研究 CNT 的歷史早已經出現在西班牙內戰時的 CNT 裡。

「Assembly」作為工會的最主要決策權主體基本上是「控制」在 Militante 的手上的，一般的工會往往只有不到幾成比例的人會去開會(比如說當時的 SOV 有近百人會員，一般會來開會的不到 20 人)，而這些人大半就是工會的 Militante。這些人多半熱衷工會事務，有不同派系的取向、和對於革命的想像，但其中也不乏一些「跟隨者 follower」，一些加入 CNT 而在其工作爭議上獲勝的會員，如同 Paulo Freire 所說的，對於領導者因感激而出現的崇拜或依附之情，便在之後死忠追尋這些 Militante 如領導者，這些「領導者」也同 Paulo Freire 所說的為了自己地位的安穩，他們可能給與受壓迫者行動上(服從)的幻覺，跟隨者他們自稱同樣為安那其主義者，並且活在一個「領導者」為他們打造的世界觀中「虛假的行動」。而這些跟隨者身分分辯，幾乎可以從其行動中探知，他們第一、很少在

會議上發表意見、第二總是默默的投票支持他們的領導者，第三、他們很少成為新的爭議案的組織者，除非受到領導者的特別指派，第四、他們幾乎不參與不是他們領導者組織的爭議案。除了這些基本的組成人員之外，工會存在著很多的「幽靈」會員(Payer)，他們只按時銀行扣款會費，幾本上不參與會議也很少出席抗爭事件。所以幾乎可以說是這些「Militante」代表了這些從未出席的幽靈會員，因為即使不出席他們仍是工會的一份子，所以工會的決議也成了他們的決議。然而在上述的現實中 Assembly 已經無法真正的「代表」工人或是全體會員了(The assembly isn't the worker, it is the militant.)。另外一方面，也常因為這些 Militante 的派系取向，造成一些工會甚至是「脫離」整個工人運動的，因為他們的組成 Militante 可能是傾向傳統安那其政治宣傳的路線，他能可能一開始就選擇程度性的與工人運動抽離，這也是工團主義派常常指控安那其主義派的問題之一，「他們常常指控我們不在街上鬥爭」，但這個指控多半只是「工團主義派」，意圖塑造的對立點，並不全然屬實¹⁷⁰。

2. 官僚與工會秘書

另外，這個 Militante 近同等於 Assembly 的情況也發生在秘書職的問題上面。一方面參與工會的 Militante 就大概是那些人，所以秘書職通常也就會是其中的幾人，這些人本來就是對著工會充滿著許多的期待與熱情，「不可以向會議提案(propose)」的這個規定就很難加以遵守了，況且有時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他們不提案誰還來提案呢？這個規定在現實上就常常受到忽略。

這些組成秘書的人因為長期的投身在工會，常常不經意的架構出一個「管理階級」出現，畢竟出席會議、參與行動、任職秘書或是提案的都是同一群人。另外，秘書職務雖然在其職位的「權利」上有所限制，但他們在職務行使上的確還是擁有如工會聯絡、內部資料管理等不同行政事務，這都可能造成秘書與會員在

¹⁷⁰ 安省工會內部文件。

訊息上的落差而導致「權力」的發生。我甚至耳聞在一些工會裡，工會的資料都是由秘書全權掌控的(在賽城的 SOV 所有的人都有直接閱讀資料的權力)，一些會員只就秘書提供的「單方面」資料來判斷一些內部爭議案。¹⁷¹

同樣的，常常也發生地區或是全國秘書「無意識」的介入到許多的內部糾紛之中，他們在對立雙方的要求下行使「仲裁權」，「權力」也就這麼發生，甚至在之後養成了秘書「介入」與「協調」的絕對權力。不管甚麼樣的民主限制或是安那其原則都無法敵過現實給他們的「馴化調整」，我曾經在與一個三十年參與工會「領導者」Carlos 的兒子 Diego 有過著麼一段對話

「我不想這麼說，但我想你父親是擁有權力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在 CNT 這個架構下？」他搖搖頭反對我的說法，並認為我的話聽起來可笑。

「這麼說吧，我不說你父親強得來這個權力，但我想許多工人給與他這個領導的位置，而他沒有反對。」

「工人們相信他，他很可信賴。」¹⁷²

除此之外，這個「管理階級」特別常出現在工團主義派主導的工會之中，賽城一名工團主義派就曾經表示過「工人很忙，他們沒有空來開會。」來回應那些詢問為什麼他的工會會議沒有照規定召開的問題。另外一名工團主義派在跟人們辯論工會會議的問題時則說「在西班牙內戰的時候，會員也是不來開會的，辦公室裡就只有秘書們，他們幾個人就可以做好全部的事了。」¹⁷³另外，在賽城地方工會分裂案中甚至出現 SOV 財務秘書 Diego 一人任三個工會的財務秘書職問題，當分裂案發生時，人們不覺得驚訝於這個事實「為什麼？」「我們只是在幫助他們…他們人手不夠」，其中一個工會正是清潔工會，她們的秘書長憤怒的對我們說「清潔工們不懂這個！」而當時人們質疑的問題只是「若是這三個工會沒有人

¹⁷¹ 其他城市會員往來信件。

¹⁷²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202。

¹⁷³ 同上註，p.204「…他們認為民眾是如此地無知，所以他們相信民眾只適合接受專家的教導」。

手，或是無法處理最基本的兩個工會職務，包括秘書長與財務，那麼為何不合併到 SOV 工會裡面呢？是誰決議工會事務的呢？」

「我得說，我們是很官僚的，因為有時候一個決議，我們要花上很長的時間，從地方上討論，再進到區域上，最後在全國聯盟。若是這份決議被否決可能又被打了下來，我們又要從新來過，這之間書信往來得時間很冗長…」一個工會會員在訪問中這麼表示。這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工會解散或是會員開除的問題上，有時一個工會的解散問題必須花上大半年來來往往而無法結束，辯論與證明文件推滿了文件夾，人們也開始懷疑誰真的會去仔細的讀完那一些資料，會議無限延長，「直到有個決議之前」一切都無法定案。

3. 「工團主義派」VS. 「安那其主義派」

如同上述所說，這兩派的對立對於安那其的認知上不必然擁有絕對的衝突性，但是在雙方多年來的交惡之下。兩派幾乎沒有任何的對話空間。我在參與賽城工會之初不停聽到工會的人們告訴我「安那其主義派都是瘋子」，另外，我身在賽城工會也因而永遠無法接觸到安那其派工會的任何人，在分裂之後我們其中的一些人被快速丟到作為「安那其主義派」的指控當中，而另外一方面「安那其主義派」的工會也不全然的張開雙臂接受我們這些「前工團主義派」。直到我離開西班牙之前，沒有一個人問過我，或與我討論我對於安那其與工會的「想法」，人們只是一昧將人們丟到派系的論戰之中，而不去思考這兩方的衝突點在那裡，怎麼可能被解決。對立的兩派便成了工會中最嚴重的「假問題」，蠱惑著所有的人在其中無法自拔，Roca 在他的研究中也直指人們都是屬於其中一方的¹⁷⁴。

然而，就我的觀察，兩個派別「檯面上」最大的衝突點來自於過程中對「妥協」的認定。比如說在「法律」的問題上，許多的安那其主義者相當排斥以「司

¹⁷⁴ Beltrán Roca Martínez, "Anarchism, anthropology and Andalusia - An Analysis of the CNT and the 'New Capitalism'".

法正義」來贏得爭議案，並且認為那是「給了國家權力」的丟棄了安那其的原則；但另外一派則認為法律削減了很多行動上的需要，特別是對於一個以「工團主義派」為主的工會之中，因為 **Militante** 人數相對的少(通常就是 1-2 個領導者)，並且在他們接受「領導」的情況下，組織成員大多數為一些跟隨者，這樣的組織雖然一方面可能可以組織一個大型的遊行，但在工會行動原則中的「直接行動」——這個可能迫使會員面對「牢獄之災」、或是「非法」的憂慮——就相對的無力。

而我們該怎麼去思考這個「妥協」程度的問題。一個願意在很大的程度上對安那其原則讓步，「而讓安那其主義可能」的說法真的存在嗎？一個不需要「解放的行動」，來達成「解放的未來」是可能的嗎？「工團主義派」相當沉浸於這一套「新資本主義」下的戰略守則，他們無所不盡其用的意圖壯大工會，「一個越大的工會，越有戰鬥力與鬥爭的力量」，「我們要贏」「我們要有很多的會員」¹⁷⁵，只是他們在建造這個工會的過程中忘記了，一個強大的工會不是在於他們贏得爭議案的次數，而是在充滿戰鬥力且源源不絕的基進會員增長，如同被壓迫者教育學中所說的，他們贏得了民眾，但是也(再次)複製壓迫者的模型。並且，CNT 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失敗難道不就是最好的借鏡嗎？當時 D. Abad de Santillan 在革命失敗之後反省到她們一連串的讓步所說的：「…若是戰爭沒有打勝，我們的路線是不可能贏的。我們犧牲了革命，而沒有了解到，這個犧牲伴隨著必要對戰爭真正目的得犧牲…」似乎也可用在今日的情況中。

另外一方面「安那其主義派」堅守著安那其的主要原則同樣也是可議的，一般民眾並不懂得這些複雜的政治語言，就算因為爭議案來到了工會之中，也無法被過度充滿「政治」語言的工會氛圍所吸引。並且「政治化」是需要空間與時間的，安那其主義派並沒有在這點上更加努力，所以許多工會在經過十年之後會員人數幾乎沒有任何增長，而她們卻將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對抗「改革派的」工團主

¹⁷⁵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136。

義派工會。

面對兩派系無法在革命的方法上有甚麼交集，並對互相存在著一個「惡意」的態度，「共識制」根本在許多的工會中消失，「(共識制)一點都不容易，通常我們都是投票，因為我們沒有共識，所以一般我們就是投票。」另外一個工會則說「因為以前的工會秘書，使得我們過去根本無法達成共識。現在工會秘書換了人之後，共識變得簡單的多，但你知道，人們也總是有些不同的意見」。在這裡還有一個潛在的問題：工會會員幾乎忘記了「共識制」除了民主的實踐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想像工會存有兩個不同的立場，共識不但只是決策他也是使「磨合」發生的過程，它幫助人們在其中更能夠互相了解對方的立場，並且以積極的方式找到一個可以共同接受的最好決議，這是一個民主組織很重要的元素。因為忽視了共識制在這之中的重要性，而一味將無法決策的事情交由多數決定的方式，對立的其中一方被壓抑下來之後，因為不諒解而發生惡鬥的可能性就越高，破壞了工會原有的團結。

索性，工團主義派轉而致力在不斷的在「賺取」會員人數上「買票」，在 Roca 的研究中他指出賽城工會在面對對立工會的票數優勢上「奮而」加入投票遊戲中，「這個建立新分工會的過程確是比想像還長：『雖然有一些新會員很快的加入了』，但是地方聯盟仍然決定去給(allow)他們時間學習 CNT 的原則和實踐。」他對於這個過程的形容顯得極度的狂妄 — 會員人數戰在他的研究中成了一個「行動」的手段，會員不但被「物化」成數字，並且在對安那其思想的學習上，變成了一個要由「領導者」恩賜的可能。對於這些行動，安那其主義派憤怒的加以抨擊但卻也只是重覆的陷落在「派系對抗」的泥沼中，到了 2010 年的全國大會上，工團主義派更是使盡全力的「控制」了大會方向。他們為了一勞永逸乾脆更改了幾十年在民主機制思考下定出來的投票制(表四、表五)，新的投票制(表六)保障了「大工會」的絕對統治權，而本來就只擁有小聲音的小工會與少數也就全面的失掉了任何可能的「聲音」與機會。一個工團主義派在 2010 年全國

大會上說「我們實在受夠了那些少數，他們老是要爭取代表些甚麼，我們受夠少數了！」

表 四、CNT 第三屆大會，1931 年 7 月 11-16 日，馬德里¹⁷⁶

會員數	票數
500 人以下	1 票
1,000 人以下	2 票
3,000 人以下	3 票
6,000 人以下	4 票
10,000 人以下	5 票
15,000 人以下	6 票
25,000 人以下	7 票
25,000 人以上	8 票

表 五、CNT 第五屆大會，1979 年 12 月 8-16 日，馬德里¹⁷⁷

會員數	票數
1-50 人	1 票
51-100 人	2 票
101-300 人	3 票

¹⁷⁶ III CONGRESO DE LA C.N.T., p.38.

¹⁷⁷ V CONGRESO DE LA C.N.T., pp.1-2.

301-600 人	4 票
601-1000 人	5 票
1001-1500 人	6 票
1501-2500 人	7 票
2501 人以上	8 票

表 六、CNT 第十屆大會，2001 年 12 月 4-8 日，科爾多瓦¹⁷⁸

地方工會在地方聯盟、區域聯盟、全體大會中的投票記法		區域聯盟在全國聯盟中的投票記法	
會員數	票數	會員數	票數
5-10 人	1 票	5-100 人	1 票
11-20 人	2 票	101-200 人	2 票
21-30 人	3 票	201-300 人	3 票
31-40 人	4 票	301-400 人	4 票
41-50 人	5 票	401-500 人	5 票
51-60 人	6 票	501-600 人	6 票
61-70 人	7 票	601-700 人	7 票
71-80 人	8 票	701-800 人	8 票
81-90 人	9 票	801-900 人	9 票
91-100 人	10 票	901-1000 人	10 票
101-150 人	11 票	1001-1250 人	11 票

¹⁷⁸ Acords del X Congrés Confederal., p.16 在表左半部所列為地方工會在區域投票上的計票方式，右半部為區域聯盟總人數(所有在同一區域內的地方工會人數總合)在全國投票上的計票方式。

151-250 人	12 票	1251-1500 人	12 票
251-500 人	13 票	1501-2000 人	13 票
501-1000 人	14 票	2001-3000 人	14 票
1000 人以上	15 票	3001-5000 人	15 票
		5001-10,000 人	16 票
		10,000 以上	17 票

4.認識「權力」，而後「解放」

「解放」「革命性」似乎都是在工會很常使用的字詞，但並不代表我們都有一樣的定義或是理解。一般在工會中也很少真的對這些問題作出甚麼樣的討論，除了當我們幾個安那其主義者聚在酒吧一起聊天的時候，這個時候旁邊的一些非安那其主義會員通常就會在酒吧裡摸著鼻子轉到其他的圈子裡加入談話。

不僅這些政治思想在常民社會中是一種政治權力，或「政治霸權」之外，其他還包括了很多「行動或思想上的權力」，初來工會中的許多人並沒有任何政治意識，他們純粹只是想要解決自己的爭議案，有些人甚至真的誤以為「直接行動」唯一個目的就是製造「恐怖」，而不明白他最重要的目的是消除「中介」、「代表」；他們也同樣的在工會中「行使」直接民主的會議操作模式，但這個「行使」在很多的情況下只是「複製」的行動，有時候「共識制」其實都是在人們不自知的情況下政治操作的結果。他們很多人就像我一樣，當我剛到 CNT 時賽城工會就馬上送了我一本《安那其工團主義基礎》小冊。這本小冊直到過了些日子我才開始閱讀，在我讀到「誰可以加入工會的時候」，上面提到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工會，只要他們可以「尊重」工會的原則。但在現實，從我申請進入工會來的這些日子從沒有誰跟我說過「工會的原則」是甚麼，並且也沒人告訴過我應該要尊重甚麼些事。隔一天四個女孩因為爭議案加入了工會，過程中我也沒有看到任何「尊

重」工會原則的事發生，沒人解釋會旗為什麼是紅黑色，「直接民主」是甚麼，我們怎麼展望一個「自由共產主義」的未來。他們只被提醒要來參加之後的會議解釋她們的爭議案，而過了一陣子這些人根本不再出現。這之中不但絲毫沒有些「啟發」或「提問」的行動來幫助人們盡快的認識到自己在行動與思想上的權力。一方面即使出現了這些「思想與行動」他也不是一種「授權」的形式顯現出來，讓人們知覺她們也可以參與在其中。權力沒有被喚醒，並且其中的人們還加深了「奪權」的行動。工會會議還是主導在 Militante 的身上，他們盡情的發表他們的經驗談、給予建議，提出看法，許多人只是一昧的點頭和認同，在這個複製出來的宰制模型中的對話是無效的，人們只是被操作，並還自認務實。革命是無法在誰為著誰去實現而發生的，不然我們就如同在壓迫民眾進入革命之中。¹⁷⁹

「權力就像一個禁忌」如同 Roca 所說的，即使對於他「權力」不必然為惡。然而工會裡的許多人無法理解「權力」可能以很多的方式出現，不管是在語言上、行動上或是經驗上，或是更善於、熟悉組織的操作模式上，這都是必須要被轉移與授予的過程才可能發展開來的，他就是一個「解放」的過程。當人們受到解放之時也就是他可以認識到「權力」並且知道怎麼去公平使用他。而在經過「解放」的過程中，這些本來擁有權力的人也才可以真正的「使用」權力，並且轉移權力，使我們不再只是獨佔權力的「霸權者」。工會的建設唯有在與「個人解放」的同步進行之下，才可能發生。

十七、故事的開端

之一、環境介紹

2009 年 2 月初我到達賽城 CNT，當時賽城區的 L 小鎮的市政府工作調度所

¹⁷⁹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

爭議案¹⁸⁰已經醞釀成熟，18F(18Febrero 二月十八日)的總罷工的行動勢在必行，每個人都難掩興奮，當時與我同行的馬德里朋友也很快的受到感染。我們在賽城的第一天行程就是參與小鎮總罷工前的準備遊行，塞滿了幾千個人的街道與廣場上，口號響徹雲霄，馬德里朋友在喧鬧中大聲的在我耳邊說，「幫我拍一張照吧！」他拿著紅黑色的 CNT 會旗面帶微笑，背後是滿滿的人群，紅黑色的旗幟幾乎遮蓋了灰色的天空。

我所參與的賽城工會在我剛到達之時，正是做為「工團主義派」的南方大本營所在，這一方面為他們賺來了最有行動力的稱號之外，也伴隨「安那其主義派」譏諷的「改革者(reformist)」稱號。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動搖賽城 CNT 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在上一個(2008 年)五一的遊行上，賽城地方工會拒絕與當地的其他



圖 一、18F 總罷工當天情況

¹⁸⁰ L 小鎮是位於賽城大概 45 分鐘車程的一個小城鎮，過去小鎮裡是種植棉花為主的農業，但在近幾十年遇到農業蕭條，人們紛紛轉到建築業行業中，然而面對經濟的不景氣，西班牙的房地產產業與建築業都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本來常常隨著建築工作而遷徙的工人們便回到自己的家鄉，但小鎮的同樣也面臨高失業的問題。小鎮的市政府中心擁有一個職業分配所(job exchange)，它的目的是將工作機會有效的分配給在市政府裡登記失業的人們，然而這個政府單位卻持續的圖利自家人，把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分配給自己相關的親友與支持執政黨的人。總罷工的目的就是要求市長將職業分配所的管理控制權讓渡出來交由工會共管，來真正有效的把工作分配給失業的人們。當天的罷工相當的成功，大概有超過 90%以上的店家與工人都停工、停業，然而罷工之後現實並沒有太多的改善，工作分配所的情況如同過往，即使少部分工作被分配出來都顯得雜亂無章，一名當地 CNT 會員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到，一個掃落葉的工作甚至有三個人在做，而人們還是陷在長期失業的煎熬中。

工會共組五一遊行隊，自成一隊的出現在賽城的大街上，安省各地的地方工會趕來助陣，鑼鼓喧天的同時他們將宣傳單一把灑上天，整個街道散落一地的紅黑宣傳單上寫著「唯一的工會」(意旨唯一個不參與工會選舉的正格工會)，他們的行動早於另外一隊遊行隊伍，當另外一個遊行隊伍走到同樣的大街上時，滿地寫著「唯一的工會」宣傳正像是在嘲笑他們在加入工會選舉後，對工人運動的背叛。當時賽城 SOV 工會擁有 103 個會員、運輸工會 30 多人、公務員工會 70 多人、服務業工會 30 多人、清潔工會 20 多人，加起來總共有大概近 300 人的賽城地方聯盟，對於僅擁有全國幾千會員的 CNT 是相對多數的大工會，同時我們在安省區域工會佔有至少 7 個投票權，比起擁有 40 個會員的馬城(一票)的或是 20 多人的胡城(一票)，賽城必然成了安省區最重要的工會，多次的區域活動都選定了賽城為區域性大型活動的行動中心。

在當時賽城地方聯盟中最積極的工會正是擁有最多會員人數的 SOV 工會，擁有大概 20 多人以上的 Militante，其他在運輸工會有 3 個 Militante、公務員工會 7 人、服務業工會 4 人、清潔工會 1 人。SOV 工會每個星期五固定開會，平時固定參與開會的會員介於 10-15 人之間。服務員工會因為之前的 Militante 太少，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會議運作，直到 2008 年底之後才開始恢復固定的開會，除此之外固定開會的還包括公務員工會，偶爾召開的運輸業工會與幾乎沒有開會的清潔員工會。工會在每個星期一、四都有開放工人諮詢時間，過去這些諮詢時間都是與工會的律師會面諮商，但之後考量過多的諮詢問題，在地方會議討論之後達成共識，將工人諮詢時間改由各工會的工會行動秘書與其他會員負責，經過諮詢後若是工人還有問題且希望 CNT 工會介入處理，工人就必須先加入工會後才能與工會律師 Mario 會面，並參與工會會議向工會呈交爭議案件討論。當時組成工人諮詢的除了身為服務員工會行動秘書 Sergio，還有 SOV 工會行動秘書 Justo 與 SOV 工會財務秘書 Diego 與 SOV 工會裡一名正在研讀工人關係法對勞動相關法案相當了解的 Annie。另外星期一到五都會有負責到工會開門處理日常雜事的工

會會員，五個工會一會一天，從晚上七點到九點。



圖二、賽城區的小鎮遊行

賽城的工會辦公室大概是我所見過最小的 CNT 工會會所，雖然坐落在商業鬧區中心的印象大街，但相較於港口城、佩德鎮或是蒂城 CNT 的整棟大樓會所，它僅僅是一個小型辦公室大小。而樓下的工會紅黑旗壓克力板甚至都退了色，變成了黑黃色。當時，我常常取笑那根本成了安那其資本主義的旗子¹⁸¹。會所裡總共有 5 的房間，包括一個大概塞得下 20 多人的長型會議廳、一個律師房(在爭議後期由運輸業工會與律師配鎖，成了只有律師可以使用的私人辦公室)、一個電腦跟資料房，還有一個塞滿了老舊書籍同兼地方聯盟工作室的讀書館，另外一個小小的收藏室其實也稱不了房間，僅是一坪大小的空間裡塞滿了會旗、大小鼓具、大型的外燴鍋具等。會議廳就是一般工會開會的場地、還有製做工會會旗與行動道具的地方，電腦室與資料室中擁有五台電腦，各屬於不同工會的工會財產。平常我的活動地點大半都是在會議廳裡參與 SOV 工會的開會或是旁聽公務員工會

¹⁸¹ 一群極度相信自由市場的右翼分子，他們因為極度的相信自由市場而反對國家在經濟上的干預，最終他們更極端的反對國家的存在，相信社會只需要有自由市場的存在便可以達到最完美的平衡。以「反對國家」、「最自由的市場」兩個概念他們也自稱為資本「安那其」主義，這個說法受到安那其主義所有派流的反對。

的開會(每個星期四)，不是開會時間我就與地方聯盟的人待在圖書館裡，而地方聯盟的人就在旁邊的電腦上工作，也或我與其他來工會辦事的人就一起呆在資料室裡上網聊天。在整個二月我幾乎每天都到工會報到，當時正在處理 L 小鎮的總罷工行動，Sergio 有時從一早就到辦公室發新聞稿給媒體，或是打電話與不同工會的人連絡。這幾天我便跟著他跑東跑西的處理這一些事，當時，我感覺真是來對了，賽城工會非常基進！

之二、潛藏的危機 - 「邊緣分子」「流氓」¹⁸²

二月份我剛到達塞爾維亞 CNT 的時候，工會所有的人都在忙著處理總罷工的問題，到了罷工的前幾天，工會更是進入忙碌的時刻，總是有人拿著會員名單一個一個電話的播打「喂，你是 XXX 嗎？這個星期在 L 小鎮的總罷工…」。

但在這同時，另外一件事也正在賽城的地方工會上慢慢醞釀爆發。

就在一個月前，Carlos 在區域 Pleno 上被指派為區域聯盟參與全國 Pleno 的代表，他與其他三個來自賽城 SOV 與服務員工會會員在當天乘著快速火車前往馬德理，四個人在車上討論了一下當天要報告的區域決議，也私下的談了一些區域 Pleno 決議上之外的事，討論的重點主要是關於漫城地方工會的會員作為瓦省區域代表的問題：漫城地方工會在幾年前爆發過嚴重的內部衝突，衝突最後演變成一場兩個派系的大型鬥爭，最後結果在雙方長期的對峙與不滿之下模糊的了結，對此 Carlos 與安省的「工團主義派」對於他們做為「代表」身分非常的不滿。賽城因此在區域會議上提議，在全國會議之前就漫城工會的身分做一個「會前」的發言與提問。但這個提議在區域 Pleno 的兩派角力之下決議上被壓下來決定不對此事發言，但是，這並不使 Carlos 放棄，他在快速火車上向其他人表示他將在全國會議上對此發言，他並不在乎區域會議上的決定。

¹⁸²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194。

當天，在馬德里的CNT會議廳裡，會議尚未正式開始，Carlos就著全部的人面前發言「我們想要在開頭前先詢問為什麼漫城工會會出現在這個全國Pleno上面，難道他們不是已經被開除了嗎？」事後，Carlos的個人擅自發言行為傳回區域聯盟中，各個工會表示極度的不滿，「安那其主義派」的葛城工會更是馬上提案要求對Carlos以「終生免職權(不可任秘書職)」作為懲罰，因為過去幾個「安那其主義派」工會老是犯了這條規定因而被「工團主義派」窮追猛打，今天換成「工會主義派」違規，給了他們非常好的打擊機會。對於這個提案，賽城地方聯盟馬上召開會議討論解決方案，最終決定由賽城公務員工會提案「兩年免職權」，但在同一份文件上他們要求這個提案必須與其他條件並進「唯有其他的工會也對其他犯規會員做出同樣的懲戒，這份提案中的懲戒才會生效。」意圖將其他的「安那其主義派」綁進同一個問題中。這個提案在與Carlos談過之後決定做為最終解決方案。本來這份提議要先交到賽城地方聯盟同意後由地方聯盟提案，但Carlos提出兩項建議，第一是將兩年的免職權改為一年，另外這份提案可以直接由公務員工會自行向區域提案，同時Carlos也在會中表示將會自己發出一份聲明文件向區域聯盟解釋他的行為。

之後，Carlos的聲明文件從未出現，提案發出之後在一次的賽城地方聯盟Plenaria上，Carlos與幾個工會會員意外的出現，並且就不是當天的會議內容發言，他們攻擊賽城地方聯盟與公務員工會在這份提案上「背叛」了他們自己的會員，指責地方聯盟的秘書作為「背叛者」。這項攻擊頓時把整個賽城地方聯盟外的鬥爭引入到工會內部，一個與Carlos來往頻繁的公務員工會中的拖吊公司工會分部(syndical section)也發出聲明稿表示他們對此「背叛」行動的憤怒，並將從公務員工會轉離至運輸工會，賽城地方聯盟秘書長因為此次的攻擊痛心之餘憤而退出地方聯盟。最終這個提案在區域聯盟中不了了之，犯規的工會太多，因而沒有人想要為此事再繼續大做文章而連累自己。

這次的打擊使得賽城工會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許多人憤怒於Carlos對

地方聯盟與公務員工會的指控與謊言而使得秘書長出走，但另外一方面，Carlos 與他的支持者則不斷的堅持 Carlos 是受到背叛的「工會英雄」——一個在工會打拼二十多年的人，居然因為一個「仗義執言」的行動而受到自己工會內部的攻擊。而不管在遊行、活動上，我們也總是看到 Carlos 與一批工人獨立於其他 Militantes 的聚在一邊，他總是可以講上幾個充滿性別歧視的笑話，逗得其他會員們合不攏嘴，工人們普遍的愛戴他，因為他的確是個「勤奮」的工會組織者，即使對他有所怨尤的其它會員也無法否定他在「領導」上的努力，然而他至高無上的「權力」阻礙了任何可能來自於其他會員、與爭議中工人的自發性與行動力，況且在這樣一個以安那其思想做為原則的工會，他的行為更是無法讓人理解。

自此事件之後，我也開始聽到工會中許多人的不滿意見，Carlos 與一群多半來自爭議案的會員支持者自成一派，他幾乎不與任何工人在工會中會面，Carlos 「不持勞苦」的——親臨爭議案的公司、現場與工人會面，而不願意這些人來到會所，我們除了在抗爭現場見到他們(爭議主)外，幾乎無法得到 Carlos 手中爭議案的任何訊息，再加上 Carlos 與工會律師關係友好，幾乎所有的爭議案在工人一入會進到律師諮詢的時候就越過「產業工會別的分配」，直接轉給運輸工會的 Carlos，為此原因一群 Militantes 意圖組織工會內部的訊息與會員通訊錄，但都被 Carlos 以塘塞、推緩的理由拒絕交出他擁有的會員資料，Carlos 幾乎成了賽城工會唯一的窗口；而處於他的對立面的幾個工會 Militante，是幾個來自不同政治背景(前托洛斯基派)的會員、有著長久在其他地方參與 CNT 工會的安那其主義者，另外還包括一些不屬於 Carlos 派的賽城老會員。特別的一點是，其中的前托洛斯基派與安那其主義者都是在 2007-2008 年之間加入賽城工會，他們這些人不受管於賽城 CNT 的「(Carlos)工會文化」，傾向發展他們自己的「安那其」行動，並且更積極的擔任工會中的秘書職與策劃、組織行動。這些人的行動處處都在挑戰 Carlos 的權力，他便常常向人們指責這些人「不負責認」、「太過自我」，並且像老練的工會組織者一樣說「這些人太過衝動」所以不該與工人接觸，並且

指責老會員「沒有行動力」，但是當人們行動之時，他又老愛發號施令，不滿人們沒有以他為行動中心，我們和他在外地與其他人會面時，他總是坐在圓桌的最中心指導人們方向，成為整場討論會中的主講者；多次在我與其他會員也曾目擊他與其他地方工會的「支持者」坐在工會辦公室下方的酒吧在為那因應該在工會會議(Assembly)中討論的問題「自行決議」。「去把這地給我掃乾淨」在五一的遊行上，他秉著一貫作風，毫不客氣的指著其中的一個會員說。

之三、電話銷售員爭議案

2009 年二月底，四個女孩來到工會，她們是一家出版商的電話銷售員，面臨包括拖欠、不給付加班的薪水，並且無故開除之後沒有給與資遣費的勞資爭議案。這幾個女孩來到了由工會行動秘書所組成的諮詢團隊中討論了她們的問題，最後決定加入 CNT 由工會來介入這起爭議案，因為工作區別這些女孩而被分配到了服務員工會之中，當時服務員工會的 Militante 包括了 Lily、Macos 兩夫妻、Jorge、Fidel 這四人屬於 Carlos 的支持者，還有由其他 CNT 轉來的 Sergio，Sergio 當時為服務員工會的行動秘書，並一手接起了爭議主要的組織工作。



圖 三電話銷售員女孩爭議案中的三位女孩

Sergio 與 SOV 工會的行動秘書 Justo 一開始代表工人與公司談判，第一次會談結果良好，資方同意工會的所有要求：停止對女孩的叫罵、支付欠薪，並且與

工會達成一個協議書，這個協議書一方面也承認了工會在公司的分部合法性 (Sindico Section)，然而在第二次會面公司與其律師連絡過後，反駁了所有的協議，並且開除了這些女孩。在整個三月，我們每個星期固定的以「直接行動」到出版社的大門口前抗議，給予公司壓力。直接行動的效果相當的好，一開始資方並不理睬我們，但是到了四月份，工會有效的在全國的幾個大城中對各個分公司以直接行動抗爭施壓之後，資方終於願意談判。這期間參與爭議案的是服務員工會會員包括 Lily、Macos 兩夫妻、Jorge，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SOV 工會，與 6-7 名來自於公務員工會的會員。

組織這起爭議案的 Sergio 一直是整個主要爭議案中介入最深的工會成員。他與工人直接討論爭議情況並且與公司協商，並且策動整個抗爭行動。在最初工人都會一起參與抗爭，並來工會會所開會，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這些女孩變的很少參與抗議，並且也不再出現在工會辦公室，其中唯一積極參與的就是當初被選為公司工會分部代表的 Lucia，在五月過後都是她與 Sergio 討論情況再一一的回報到其他的女孩那裡，並詢問她們的意見與回應。五月之後，Lucia 在一天收到服務員工會的告知「Sergio 已經被工會開除，新的秘書長 Fidel 將會接續他的爭議案。」但，Sergio 事實上並沒有真正的被開除，而是因為過長時間的失業而積欠了幾個月的會費，服務員工會打算以此作為原因將他開除，他便趕在開除發生前離開了服務員工會，順而加入我們的 SOV 工會裡來。

從來沒有在這場爭議案中現身的 Fidel 在之後與 Lucia 面談，並指稱「Sergio」是個最差勁的組織者，「他在這個爭議案中已經危害到了工人的利益」，罪不可赦。這在 Lucia 聽起來想當可笑，她在一份工會的文件中提到 Sergio「他是唯一一個與我們從開始就在一起的人，…他總是要問我們(爭議主)的意見…」。然而這個時候 Carlos 也開始出現介入爭議案中，他同樣的向工人抱怨 Sergio 的失敗，並表示自己將會一手將爭議案完成，工人大可放一百個心「等待」好消息。就在 Fidel 與 Carlos 接手爭議案之後，他們幾乎很少跟這些女孩們連絡，Lucia 更不滿

的說，她不瞭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整個七月她只收到 Fidel 的一通電話，而在之後甚至無法聯絡到 Fidel 與 Carlos 兩人。而另一方面，在對 Sergio 的指控與怪罪中也使得 Lucia 感到困惑與不滿，最後她選擇自行離開服務員工會，加入 SOV 工會。

爭議案在這個時候已經與工人完全脫離，而是由律師雙方還有服務員工會的秘書長 Fidel 與運輸工會的 Carlo 共同掌控。到了九月 Sergio 與 Lucia 聯絡告知一個關於她們爭議案的會議討論時間，當時出席的除了這些爭議案主的女孩們，還有她們的家人與朋友、Sergio 還有 Fidel、律師一同坐在會議室中，一些女孩的家人看起來十分的憤怒，他們對於工會的處理「不甚滿意」，因而要求 Sergio 「給一個交代」，Fidel 在一旁不相干的觀察這一切的發生，他們首先指控 Sergio 不負責任，並且「搞糟」了這個爭議案，同時要求 Sergio 要對一切的問題付出全責，而 Sergio 則只能耐心的解釋整個問題，直到最後對方家長接受了 Sergio 的說法，「你的女兒早已經找到工作，開始工作好幾個月了。我從二月爭議案開始，就在處理她們的問題，我當時已經失業快一年，但我一直持續的在幫忙…」。

最後他們談到將在幾天之後簽署與資方的協議書。

工人最後收到來自公司的薪水遠不及他實際的欠薪與原先的想像，Fidel 首先告知 Lucia 「這是 Sergio 與公司的談判協議金額」。另外，他表示這是公司唯一願意提供的金額；服務員工會將會解決「Sergio」的錯誤，並且從工會支付之前與女孩們「談好的金額」。Fidel 再次強調「公司給的金額正是 Sergio 所協議的金額」，意指 Sergio 欺騙了工人，給她們看好的協商要求，另外一方面又與資方談不同的條件，但事實並上，直到 Sergio 面臨服務員工會要將他開出的前幾天都還在意圖與資方協商要求達到對女孩們欠薪的所有賠償。最終協議的條件，在 Fidel 等人的考量下決定，並沒有經過工人同意簽署。而律師與 Sergio 又告訴 Lucia 「這個訊息我們只告訴妳，這個協商與公司同意負擔的金額等問題，其他的女孩們都不知道」，但這個爭議案已經拖了太久，律師與服務員工會都認為這是最好

的結果，Lucia 在這個壓力之下只得接受，而其他的女孩也收到了工會「允諾」的公司薪資。

之四、無法被瓜分的權力

Sergio 參與工會運動有 15 年的時間，他常說當他還是小鬼頭他就在工會裡混了，我們則笑稱他根本是「在工會裡出生的男孩」。他跟其他一些相仿年紀的年輕一群人在這幾十年間出現在 CNT 裡，他們多半來自於勞工階級家庭，在最初因為擁有某些程度的安那其或是其他左派的政治思想而進入 CNT，最後在工會裡第一次學習與見識到工會組織的模式，並讓這一切組織的薰陶內化進入他們之後的政治生涯，我們將這些人稱為「CeNeTista」¹⁸³，這些人們非常的崇拜並且以工會感到極度的驕傲，他們奉行一套工會的組織原則，並且加以在生命中實踐。這個政治取向常常使得這些人很難與其他人行動，因為他們承襲並接受了工會為一切，並且在自身延續這個文化的「正統性」，以至於當他們遇到不同文化或是形式之人顯得很難以合作，或是達到相互的理解，最後常常就是導致團結的破裂。

然而這個「CeNeTista」並不完全只有一個特殊的形式，Carlos 的行為也正是在製造另外一種「CeNeTista」的文化，雖然行事作風上有所差異，但他們這些人存在一個共同點，就是堅貞的相信 CNT 作為革命運動的核心，與革命的一切。「我只相信三個東西：我母親、我自己和 CNT」Carlos 在一次與一個朋友的談話中說到，他為 CNT 感到無限的驕傲，更驕傲於工會在他的成就下變得更加的輝煌成功。Carlos 他所呈現的情況正是在創造一個「CNT 救世主」¹⁸⁴般的角色，他相信工會中需要這些「指點迷津」具有洞察力與行動力的領導者，將 CNT 引

¹⁸³ 字面上指的意思是：CNT 工會的會員，然而，在 CNT 長久的工會文化影響之下，便成了一套 CNT 文化下所出產的特有人格，除了存在內文中所提的以 CNT 做為一切中心的信念外，會依據不同地方與不同派系有所差異，無法從一而論的界定出所為的 CNT 文化為何。

<http://www.alasbarricadas.org/forums/viewtopic.php?f=36&t=28488>

¹⁸⁴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p.215。

向正確的方向，再次創造 30 年代的工會強大景況。而這些奉行著另外一套 CNT 模式的青年人只是將 CNT 導向毀滅。他將 Federica Montseny 這個在西班牙內戰中加入政府的一名有名的 CNT「領導者」照片裱了起來放在塞城工會辦公室裡。

因為承襲了工會的文化，Sergio 與一些與他相仿的青年從來不會對工會中「**Militante VS. 一般會員**」的情況有任何質疑，對於這些人來說，存在 CNT 的很多文化都是一個「事實」，而事實是不需要去思考的，我們只要「實踐」。

不管是如 Calros 還是 Sergio 一派的行動者，或是「安那其主義派」的其他人，他們總是指稱一般會員為「工人(los trabajadores)」、「會員(los afiliados)」、「他們」，如同 Paulo Freire 在書中所說壓迫者會對其他人建立出一個稱號，而不將其視為與他們自己相同的地位。當然，在此並不表示 Sergio 與其一千人對「工人」有什麼真正貶低的意思，他們只是在「承襲」CNT 的這一套文化。所以人們無法意識到，當這些說法出現的時候，他也內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很多時候他們並不把這些人視為「有意識」的對象，而當討論內容出現了一些爭議或是不認同時，「工人」的字眼就更有負面的意味。另外一方面這些 CeNeTista 事實上也受到安那其思想的薰陶，本該對一般人給予更多的「個體」主體性，但是工會文化對他們的影響更深刻，他們堅貞的相信「**Militante**」的一套文化，因而忽略了「工人」與 **Militante** 是可以經過轉化而發生的「個體化」過程，也或使用 Paulo Freire 的說法「人性化」過程。

因為這個「**Militante VS. 工人會員**」的認知沒有發生，自然 **Militante** 也不會意圖去打破這之間的關係。所以，即使當人們談論「解放教育」等的「人性化」工作，他們常常談的是「對外」的教育與宣傳而不是「對內」。在一次活動之後的酒吧交際上我與 Issac 當時的文化秘書談了這樣的事，「到底工會裡的人是怎麼想這些工會裡的事，他們對工會的想像或是對行動的概念是什麼？」Issac 是一個社工相關行動者，他在工會外的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推廣 Paulo Freire 的受壓迫

者教育學、與安那其解放教育等，即使如此他對於工會內部的這些問題都是與他的思想所矛盾的，他表示「對於工會在入會十幾年前給了他的那本《安那其工團主義基礎》，他甚至都沒讀完，甚至他也搞不太清楚到底工會的組織是怎麼回事…」。

這個情況，呈現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僅工會中的那些他們所稱的「工人」不了解工會的本質與行動方向，工會內部的 **Militante** 也沒有所謂的工會共識，他們只是在表面上的接受這一切「文化」指導，**Militante** 完成 **Militante** 的本分，本不需去考慮 **Militante** 在工會中角色的意義，我們就照著「實踐」直接行動、直接民主。整個工會內部成員關係之間的矛盾，還有同樣本來處心積慮要限制的「秘書職」的權力問題，也在「已經受過限制」後而無法真正的就「權力」的本質加以認識，「秘書」不需要思考他的「權力」問題，「因為！早就已經去了權力還有哪來的權力呢？」，而如果任何人想要對這個「權力」提出質疑，反而像是在對「CNT 整個概念」的攻擊。人們忘記了他們除了是一個工會成員外，也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尋求解放的個體，尋求社會解放的個體。

當 Carlos 在工會內部所掀起的這場惡性權力鬥爭撼動了整個安省，甚至全國區域架構的平衡時，他呈現的不只是一個嚴重的「派系鬥爭」問題，也是一個「權力」鬥爭的問題，而這一切與過去一直以來的「**Militante**」文化存在著深刻的關聯性。

然而，這些問題的不斷的發生，也無法引發工會會員們對於其問題本質的認識，反而各派系、與工會們乾脆在這場鬥爭中無所不用其極地，直接在台面上爭奪「票數」，或是對人們公開的惡意中傷。在之後一次區域討論會針對「賽城地方工會」中的「假票」問題討論時，一個「安那其主義派」工會直接的在大會上念出他們的發言稿攻擊區域秘書長，「…著實了背叛了 CNT，…說謊…不正直的人…不可信賴…過度掌控權力…這些人們討厭我們的地方工會…」，「非常好，因為我們不需要受到改革派的喜愛。」這份宣言在當天使得這個地方工會被直接開

除，接著，如同 CNT 文化中的固定回應方式「人們憤怒的離席」¹⁸⁵，在這些人的缺席之中，區域會議仍繼續進行。然而，在一個討論地方工會「假票」這個做為「整個工會中最核心的決策單位－會議(assembly)」的「做假」問題居然還不及一個「情緒性的指控」問題嚴重，這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你怎麼可以質疑秘書長」，一些人在事後說到，「罪不可赦！叛徒！」

另外在這場爭議中更是呈現了很多工會與工人之間關係的問題。首先，工會反對「代表」這個「非直接」的「假民主機制」，但是不管是由 Sergio 或是最後 Carlos 與 Fidel 的交涉過程中，工人都是缺席的。當我問到為什麼工人沒有參與與資方的協商過程，一些工會的人顯得很不耐煩的回應我「工人們害怕老闆，他們老是對她們責罵」，「一般都是這樣的」，這些回應的態度與內容像是在「責難」我對工人的不加體諒。然而這些回應只能說是工會 Militante 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在事後，Lucia 曾在一份公開說明書中提到他對於「工人缺席」許多「協商」會議的不滿，她在說明書中表示她多次「被告知情況」，即使 Sergio 在事後常常表示「我想要詢問妳們的意見再向資方回應」，但是他不了解到爭議事主除了不該只是「被告知」外，也不應該單純的只是「詢問意見或聽看看回應」這個程度的參與，「直接民主」最直接的實踐，指的是「工人就應該在現場」，參與所有討論，做出所有的決策，因為這就是她們切身的問題。

做為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我們的目的應該是要在處理問題的當中，讓人們學習掌握「自己的權力」並且「自我決策」。若是這一切能夠被有效的發生，可能在事後就不會出現女孩家人們來工會，要求工會做出解決並負責到底的問題。畢竟積欠薪資、欺騙與剝削工人的事主可是「資本家」，這個關係怎麼會轉移到

¹⁸⁵ 在我所參與到現在所有的 CNT 會議中，只要發生兩派人鬥爭或是為問題爭執不休的而選擇投票決議的情況，另外一群在投票或在爭執中失利的人幾乎都是以「出走(walk out)」的行動來加以抵制這個結果。我多次向不同人們提問這個「行動的目的」為何，有兩個主要的回應包括「出走」行動會紀錄在會議記錄上，這樣子人們就可以理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另外一個回答是說，這是要表達我們在當下不接受結果的行動。然而，我很少真正看到這個出走能夠對會議決議的結果有些甚麼樣的改變。對於某些人來說，似乎他所展現出來「象徵性」的「氣概」多於實質意義。

「工會」的身上呢？**Militante** 在這個過程中是不是無意的複製了「壓迫者的角色」在「指導」的過程之中，自己將問題「轉嫁」到自身上成為「壓迫者」，這是一個所有工會都必須要面臨的問題，對於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尤是。「協商」本來就是一個勞資雙方最終必須「妥協」的過程，工人怎麼學習到「這個妥協不是恩賜」或是單純的作為一個「討價還價」的行動，之間可以存在甚麼樣的「革命性」呢？

第五部 終曲

之一、轉換新工會，前進 2010 年百年全國大會

2009 年初當我剛到達 CNT 之時，人們告訴我，我很幸運，在這個時機來到 CNT，剛好可以參與 CNT 在 2010 年底的百年全國大會。在當時我也感到無比榮幸，就算我們錯過工會的開頭，但是我們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站在同一塊土地中，我們經過光榮的時期、我們失敗、自我出賣、出賣別人、拋棄原則、最後我們又回到安那其的懷抱中，然而又再次從頭開始挑戰新時代，「抵抗」是一個持續不停的生存任務。到了 2009 年 5 月，我加入賽城百年大會策劃小組，我與幾個人分配到打聽會議旅館住宿的安排。任務還沒有完成，賽城的分裂，使的我們整個內部工會四分五裂，準備行動無限期延長，直到百年大會的地點轉到其他地方。



圖 四、卡城工會在五一勞動節放假日在各個周邊小鎮的公共空間講述節日歷史

2010 年初我回台灣幾個月，再回到西班牙的時候，我的工會賽城 SOV 工會已經被地方聯盟解散，我選擇加入到卡城 CNT 工會中繼續參與 CNT 的工會活動，一方面持續我的研究、一方面當時也心想著，無論如何都要進入百年的全國大會中參與，這個選擇讓當時那些離開 CNT 的朋友對我有些不諒解，但我一直以「研究」做為藉口，而不至於陷入一場沒有盡頭的「政治問題」辯論中。我想當時雖然我見識到總總工會的問題，但我不相信這就是全部 CNT，「所以我要去全國大會上見識真正的 CNT」。

而這些離開 CNT 的人們在這幾個月中也經歷過人生重大的變化，他們其中一些人奉行了 CeNeTista 的思想超過三十年的時間，這份情感與信念不是可以輕易被丟棄的，所以他們同時面對工會的分裂之外也接受著個人層面「信念」的動搖。當人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可以很輕易的查覺到這些情況，今天某一個人他可能會告訴你「你知道嗎，我們本來就不該相信組織」，隔了一個星期他說「你知道嗎，我很感謝 CNT 的失敗，他讓我發現我有自己的人生」，在隔了一星期他又改

口「都是人的問題，組織沒有錯，CNT 是好的，是我們都錯了」，另外一天「我們一定要親手毀了 CNT，因為他欺騙了所有人」。而我記得，當我第一次在這個爭議案的會議上發言時，我居然在發言中間激動的無法繼續下去。

另外一方面，當 CNT 跟 SOV 面臨了這些內部分裂的危機的時候，我相信當時在 SOV 中的大部分人不是想著「讓 CNT 或是 SOV 依照我的方式走就對了」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所有的人都盡力的「解救」CNT 與地方聯盟免於瓦解的情況，只是這條路在不同的思考下，朝向著不同的方向，最終無法達到一個相會點，就因為如此，他使得這一切更折磨所有的人。

卡城地方工會就是在這個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工會，成員多半來自於前賽城公務員工會的會員。這些人歷經賽城的分裂而心裡痛苦不堪，面對 CNT 整個組織的態度更是矛盾。而其中最主要的幾個人在受到賽城「工團主義派」無情的攻擊後，自然的轉向了「安那其主義派」尋求慰藉，然而這個轉向是情感取向多於政治取向的。同時這些人在這個時刻情感上的脆弱，更使得他們很容易受到派系抗爭的催眠而改變其政治傾向。最終卡城地方工會成了「安那其主義派」傾向的工會之一，不管在面對甚麼樣的內部問題與爭論，我們都與「安那其主義派」一鼻子出氣。

但除了這些派系爭議的問題之外，回到工會組織的外部情況來看，卡城地方工會仍然承接了過去賽城 SOV 與公務員工會的問題。我們在 2010 年 7-9 月之間處理了兩個爭議案，包括一個旅館移民工服務生 Alicia，和提供學校、公司外包餐食的餐點服務公司服務員 Maria 的爭議案。兩者都是面對了「經濟不景氣」下，資方對勞方藉口打壓開除、壓縮工作條件的問題。在旅館的爭議案中，Alicia 只參與了工會二次的工會會議，一次是針對她爭議案的報告，另外一次也是差不多的目的，並且在第二次參與會議一半 Alicia 表示要先行離開，因為當時我們正受到「工團主義派」在 CNT 內部攻擊所苦，而花了會議的後半段時間討論這個 CNT

組織的內部問題。

我在現場觀察到 Alicia 大半的時間發呆得出神，這些問題與她的世界完全八竿子打不著，而另外一方面工會的其他 5 位 Militantes 卻沉浸在這個討論之中爭執半天。Alicia 離開之後，一個會員抱怨「**工人們**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最終爭議案得到了很好的處理，我們連續幾個星期門外直接行動使得這個小鎮裡旅館的老闆不得不妥協，他向 Alicia 說「我真是怕透了 CNT，只要他們不再來，我會每個月付給妳薪資」。Alicia 在電話中向工會會員報告這個好消息，期間她從未介入與資方協商的過程，也從未參與任何直接行動，並且在爭議案後，她成了整個旅館裡唯一一個每月照領薪資的服務員，然而卡城 CNT 似乎並不覺這一切有何不妥。每當我向工會會員詢問 Alicia 是否有被告知開會時間的時候，她們說「她的工作現在很好」，僅只如此。

Maria 的先生擁有左傾的政治背景，並且她常常提到她們「在地方政府裡有人可以喬一喬」她所面臨的這些問題。雖是這麼說，Maria 還是來到卡城地方工會，因為她們知道西班牙現存唯一處理個人或是小型爭議案的工會只有 CNT。在一開始 Maria 常常來工會參與兩星期一次的開會，而且她對自己的爭議案也有些想法，我們在會議中與她討論這些問題。除了面對她工作上的爭議，Maria 也向我們提出整個公司在學校的「供食」上幾個大問題：食物安排極差，不能給孩子們有營養的午餐；食物量也常常不足，對於發育期的孩子來說根本就是不夠；最後烹煮技術其差，有時讓人無法下嚥。Maria 曾經為了這些事情與公司有所抱怨，最後公司告知她「只要閉上嘴，作完成她的工作就可」。Maria 因而轉向孩童的家長說明了這些問題，這引發了一些家長聯署要求公司改善，因此這把 Maria 送入了黑名單。當公司遇到經濟考量之時，第一個就想到要開除 Maria，「她們告訴我，我是冗員。天啊，你能相信嗎，在我工作的時候，幾個人要服務上百個學生，這個工作根本就是應接不暇的，他們怎麼能說出這樣的理由。」Maria 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對此感到不滿，公司對她的打壓是刻意的，並且希望以對她的處

分做為殺雞儆猴的作用，其他的人也會在之後跟著服從公司的命令。

工會向 Maria 建議直接行動的方法，她顯得有些猶豫，一開始我們只是每星期固定兩天在不同的小學下課時間到們口發傳單，向家長們告知這些問題與 Maria 的爭議案。這其間工會的開會 Maria 幾乎都參與其中，然而她也像 Alicia 一樣在中途離席 — 每當我們回到 CNT 的內部爭議案上。到了九月底，Maria 的爭議案陷入困境，因為她被資方欺騙的簽下了自願離職書，這一切情況變的更加棘手。而在此同時，十月初整個卡城 CNT 瘋狂的陷入了全國大會的「準備」之中，Maria 也不再出席工會會議，自此我們沒了她的消息。

面臨 2010 年底百年大會的時間趨近，卡城工會提出申請進入參與會議被拒絕。區域委員會告知我們，我們尚未達到全國大會規定的「工會必須成立一年」的最低時間限制，卡城爭論著我們是在 2009 年的 11 月份準備工會的成立案，到 2010 年 1 月的正式成立，若是將 11 月份的準備期算入，我們到達 12 月份的全國大會正好一整年，但區域委員會回應我們準備期無法算入這個時間之中，只有「確實付費」的月份才能算入，就是說從 2010 年 1 月開始到達隔一年的 1 月結束之後，我們才擁有 12 個月的工會時間，而大會發生在 12 月初。然而這個規定條目寫得很模糊，讓人覺得似乎有迴轉的空間，卡城工會因此更加緊爭取進入會議。但是，卡城工會進入會議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安那其主義派」多了一票。在這個「政治的角力」最後的結果，我們只得旁列觀察席。

2010 年的全國大會(congress)大會上，除了針對了投票規定做了大幅修改之外，還包括工會在與其他組織結盟上更開放的合作可能；另外一方面，雖然會上沒有更動秘書職只能執行會議決議的規則，但另外一方面給與秘書在文件的呈交上擁有部分的決策權力，尤其當文件涉及攻擊或污辱的言語，然而這些「官方上的規定」聽起來很抽象，事實上則是交與了秘書某種程度的「仲裁權」，當工會面對爭議的時候，這樣的權力似乎特別有其危險性；另外，就內部爭議的部分，

大會上更改了一些細微的部分，包括當會員被開除時，只能上訴上一層級提請一次駁回調查申請，另外當一個地方工會被要求解散之時，其工會的成員也同時面臨全部開除，並且不得在之後加入任何的工會。

這些更改若是放在不同的時期上來看，似乎並沒有絕對的政治性，但是若是將其延伸到近幾年內工會內部所發生的嚴重內部爭議，並不難看出這些更改是一些過去「行動」障礙上的調整。我們想見，工會在之後會出現一波的「清掃」行動，握有絕大部分投票權的大工會，除了以票數杯葛小工會外，開除也將使得這些本來可以以不同方式回到工會(如卡城工會的成立)中的可能全面消失，也就是說，這可能導致「少數」的消失。

之二、尚未結束的尾聲

從最初建立論文計畫書到最後論文成書，我的論文題目做了幾次不同的更動，主要是因為在工會的內部經驗使我在參與研究的方向上做了很大規模的更動。原來設想的題目從「安那其主義在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中的實踐」——一個先肯定工會內部安那其主義的實踐事實，而後去探討這個實踐怎麼發生在外部的組織行動上，轉為回到工會的內部組織中探索安那其主義在工會組織中的實踐與反省，還有作為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內部組織中所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這個改變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最初題目設想時，對 CNT 過去歷史還有近年來所接觸的工會相關的認識，讓我滿懷信心的對 CNT 抱持著一個在工會組織中安那其實踐上的正面肯定，然而在直接參與工會經驗的過程中，我才開始對這個最初的設定出現質疑，並且重新再去檢視我的設定與工會現實是否一致，就在這時工會嚴重的內部分裂與權力鬥爭的問題將我無情的拉回到最真實的鬥爭現場，在這個經驗中，我拋棄了這個對組織內部先設定的安那其主義實踐的肯定，而重新做出我的提問並修正我的研究方向。

我將我自己在 CNT 內部參與的過程分成兩個部份，包括第一個和平時期到後面的分裂時期。和平時期事實上並不和平，就在我到工會的前一個月工會內部發生一個嚴重的分裂起點，但當時我仍自我陶醉在「進入 CNT 這個百年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的熱情中無法察覺於工會內部出現的問題，我積極的參與工會所有的大小事務與開會，沉浸在「積極的行動」之中而失去「批判」的能力。直到工會內部的問題轉為檯面上的直接衝突我才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而在這個時候工會的分裂已經成為了必然的結果，我也開始意識到過去在和平時期我所接受並且積極參與的一切工會行動與組織運動似乎也存在著與我原先所設定對「安那其主義實踐完成」的矛盾。我開始思考我所接受工會的一切是否真的是如同我設定那麼「安那其」，研究的重心從工會在做組織的行動拉回到工會本身內部組織之中。

CNT 身上背負著的並不是一個由純粹安那其主義脈絡下出產的工會，他一方面意圖保有安那其主義做為其組織最重要的核心原則外，其架構模型是參考革命工團主義工會所建立出來的，組織對象放置在群眾跟工人身上使得他們不作為一個純粹的安那其主義者的組織，而是一個群眾組織。這些組成使得 CNT 存在著內部的本質上的矛盾，這個矛盾我將它分為兩個部份，包括安那其主義與工人的矛盾，還有安那其主義與工團主義之間的矛盾。安那其主義與工人之間的矛盾就如同本文在一開始提到的一個做為「工人的工會」本身就該是反應工人的思想、工人的意圖與工人的目標，但是做為一個安那其工團主義工會 CNT 在工會運動最終的目標是設定在自由共產主義的實現之上。然而工人的目標與意圖並不必然的會完成自由共產主義的達成，這之中必須也必然要存在一個「轉換」的過程，這個轉換過程在 CNT 的歷史上或是我參與的經驗中幾乎並不存在，我更擔心的是這個轉換過程甚至都還沒有被意識到。CNT 似乎堅信只要整個組織搭建在安那其的原則之下，以安那其作為內部組織的主要原則實踐「直接民主」；在外部鬥爭上實踐「直接行動」，並與其他團體與聯盟保持者互助的團結概念，安那其

主義就已經在工會的內部組織中完成了。工人被置放在一個由「安那其主義原則」設定出來的行動原則、環境中，工人就會自己轉化成安那其主義者。然而，規定出來的章程、行動與組織方法，在現實上只是被去政治化的執行在組織內部與日常組織工作之中，聯盟制與工人會議本該是直接民主的展現，但在現實上只是「組織的方法」僅使如此，而沒有「民主」實踐的政治意識；「直接行動」——因為它好用，它使資方懼怕而屈服，而不是具有政治性積極的將工人與受壓迫者「放置在鬥爭的現場中直接面對、對抗」資方的壓迫。另外一方面，在安那其主義派與工團主義派之間的矛盾更是如同本文前面提到的，作為工會組織內部本質上的矛盾而深刻的影響組織的整個歷史過程，因而使得工會在這一百年之中都不斷的背負著這個矛盾對工會內部最嚴重的打擊與分裂。

這些矛盾與在安那其主義實踐上的不完全不僅使得賽城工會分裂，同樣的在分裂之後分散的群體就在離開工會之後重覆的承襲工會過去一貫的組織模式與行動方法。直到我在著手撰寫論文的時候，CNT 工會的內部情況都還在派系鬥爭的情況之中，我所提出的 *Militante* 在工會中的身分角色認定也沒有出現過甚麼樣的討論，秘書職務更是在第十屆大會的修改中更趨向擁抱「潛在權力」的位置。那麼，我們就更不用說「權力」在工會中是否還是一個被遺忘的重要課題。而面對這些問題，對於我一個身在運動中的人到底可以做出甚麼樣的干涉，或是改變呢？當我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開始理解這些派系鬥爭裡的人的想法，在賽城地方工會還沒有完全絕裂的時期，我與賽城分裂的兩方都是友好的，當我開始意識到分裂的情況時，他們總是告訴我「我正在處理」或是說「我在修正工會的問題」。我曾與一個英國友人討論，若是每個人都抱著這樣「正面」的心態，工會怎麼在最終還是走向分裂？而當時，我還尚未意識到這個「我」與之外世界的衝突問題。

進到安那其主義運動中的很多人，與其說真正的要搞些甚麼了不起的運動，其實真正的目地還是回到個人在找一個生命的歸屬感，安那其主義提供的是一個

不受限的自由，我們可以成為任何的樣貌，因為這個解放是來自自身，而不是受到教條或是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可以干涉我們的，因此人們在這些信念中學習到相信自己，這個生命的最要的泉源。而不管安那其主義在個人層次上所談的解放與自由，或是到社會層次的結盟與互助，這些東西並不是一個死的概念，也不是「結尾(end)」，個人層次的解放與自由並不是在達到個人滿足或安心立命的生活就結束了，反而這是一個開頭，因為我們將帶著這個解放的概念衝撞一個不解放的世界，其中我們怎麼交涉、生存、對話才是真正「革命」的開始；另外，社會層次團結與互助也絕不是「照本宣科」的行動方針，它如同一個有機體般受到參與者、所在時空的影響，會有不同的樣貌與形式。就像人們常問起「所以到底安那其是怎麼樣一個世界？若是它不只是一個烏托邦？」對於不同的人就會有一不同的回答，而這就是安那其主義，它不是一個提問與正確解答的世界，而是一個充滿探索與創造的世界，當然一切並不容易，這是需要一個踏出去的勇氣。

所以即使我的研究到了這麼一個段落，它都不會是一個結束，運動還在發生，改變還在發生，這不僅是現實上的社會情況，在於我的個人也是一樣的在同步的進行中。我常常想，當我還沒有進來世新社發所的時候是一個自由的個體，我有一個完整的個體身分參與在社會之中，然而我選擇來到社發所想要學習一套更有系統的論辯方法的時候，我卻開始將所有的事情一般化，想要學習學者們使用艱澀的文字來對事件做出「更有價值」的分析與辯論。這一方面證明了我過去自我解放仍是不足的，透過社發所的學習加上我在西班牙進入到的CNT安那其運動，或說勞工運動中，我自身學習到的絕對比起我能給與組織或運動的回饋還大，然而這卻不是我最擔心的問題，因為我期待帶著這一些新的思考與經驗回到運動之中繼續衝撞出新的可能與改變。

這就是安那其主義最讓人醉心的地方，它並不是一個單純可以剝離於參與者自身外的「社會運動」，像某些行動者可以選擇向工會「請假」，回歸到「正常」生活中。安那其主義是生活本身，包括我怎麼選擇工作、生命道路或是選擇要不

要屈服在這個學術體制之下聽命辦事，「自由是要靠征服得到的，而不是靠恩賜，他必須持之以恆地追尋。」¹⁸⁶。因為如此，我感覺到生命的確是充滿挑戰的，因為我們時時刻刻的在選擇與對抗！

¹⁸⁶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 p.77。

參考書目：

英文類

Albert, Michael. 2006. *Remembering Tomorrow*.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Antonioli, Maurizio. Translated by McNab, Nestor. 2009.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gress Amsterdam of 1907*. Edmonton: Black Cat Press.

Berkman, Alexander, Avrich, Paul and Goldman, Emma. 2005. *The ABC of Anarchi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Bookchin, Murray. 1998. *The Spanish Anarchists – The Heroic Years 1868-1936*. Edinburgh: AK Press.

Cahm, Caroline. 1989.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mbone, Larry. N.d., *Syndicalism in Myth and Reality*. Red Lion Press.

Christie, Stuart. 2008.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 (FAI) 1927-1937*. Edinburgh: AK Press.

Guillamón, Agustin. Translated by Sharkey, Paul. 1996. *The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 1937-1939*. Edinburgh: AK Press.

Leval, Gastón. 1975.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Mintz, Jerome R. 2004.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ataud, Emile and Pouget, Emile. 1990. *How we shall bring about the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Paz, Abel. 2007.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Edinburgh: AK Press.

Pouget, Emile. 2003. *Direct Action*. Kate Sharpley Library.

Rocker, Rudolf. 1988.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London: Freedom Press.

Richards, Vernon. 1995.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Shorter, Edward and Tilly, Charles. 1974. *Strikes in France, 1830-196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irner, Max. 1982. *The ego and its own*. Wellington: Rebel Press.

Schmidt, Michael and Lucien van der Walt. 2009. *Black Flame – The Revolutionary
Class Politics of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Edinburgh: AK Press.

Various Authors: Freedom Press Centenary Series. 1990. *Spain: Social Revolution –
Counter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Ventura Calderón, Fernando and Roca Martínez, Beltrán. 2010. “The Sword of
Damocles Democratic Governmentality and State Trade Unionism in Spain”.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Ethnography. New York :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西文類

Gómez, Freddy. 1979. CNT, ser o no ser: la crisis de 1976-1979. Paris: Ruedo ibérico.

Federación Local CNT-AIT Sevilla. 2001. Anarcosindicalism Básico.

中文類

Argyris, Chris etc. 夏林清譯，2000，《行動科學》，台北：遠流。

A.米寧，巴金譯，1939，《一個國際志願兵的日記》，上海：上海平明書店。

Kropotkin, Peter，天均等譯，1987，《無政府主義》，台北：帕米爾。

Kropotkin, Peter，巴克譯，1981，《麵包與自由》，台北：帕米爾。

Kropotkin, Peter，帕米爾書店編輯部譯，1980，《互助論》，台北：帕米爾。

Kropotkin, Peter，畢修勻譯，1984，《一個反抗者的話》，台北：帕米爾。

Paulo Freire，方永泉譯，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台北：巨流。

網站

CNT. May 2011. 《Qué es la CNT》. “Libcom.org” <http://libcom.org/library/what-cnt>

Dielo Truda. 26, July, 2006.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of the General Union of Anarchists (Draft)'. "Anarkismo.net".

http://www.anarkismo.net/newswire.php?story_id=1000

Felipe I. 27, March, 2010.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ook’. “infoshop.org” .

<http://www.infoshop.org/page/Review-Revolutionary-Syndicalism>

Goldman, Emma. 1936. Durruti Is Dead, Yet Living.

<http://sunsite.berkeley.edu/goldman/Writings/Essays/durruti.html>

Rocker, Rudolf. *The methods of Anarcho-Syndicalism*. Zabalaza Books.

<http://www.anarchosyndicalism.net/rocker/as5-methods.htm>

Roca Martíñez, Beltrán. Translated by Sharif Gemie. 2006. “Anarchism,

anthropology and Andalusia - An Analysis of the CNT and the 'New Capitalism'".

<http://www.lwbooks.co.uk/journals/anarchiststudies/articles/Mart%EDnez.pdf>

Solidarity Federation Collective with 24 unit correspondence course. 2001. "A history of Anarcho-syndicalism". <http://www.selfed.org.uk/docs/units/2001/index.htm>

陳信行，2007 年 12 月 26 日，〈無架構的暴政〉，《丘上行路》。

<http://blog.roodo.com/dkchen10/archives/4728841.html>Libcom

余源培、付暢，2010 年 12 月 29 日，〈马克思与蒲鲁东关系之历史演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 年第 7 期。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5684>

孫鳳武，2011 年 07 月 20 日，〈重評馬克思主義反對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的鬥爭〉，《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news/382869.htm>